

忆我和父亲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亲历记……李秀元口述（139）
王玉魁 赵兴业整理

原绥远省图书馆史略……吴秉孝 吴敬贤（154）

绥远省体育往事回顾……赵允迪（161）

昙花一现的“西北实业促进社”……张万仁（170）

从瑞兴泰看旅蒙商……陈福义（182）

内蒙西部戏曲史话拾零……刘映元（190）

晋剧名伶趣闻琐谈……蔡凤歧（205）

回忆晋剧名伶水上漂……刘明山（246）

张家口战役回忆

孙兰峰

(一)

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败局已定。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已成夹击之势，处于进退维谷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心情极为矛盾。记得当时我到北平开会时，他曾数次向我发问：“曦九（我的字），你说我们为什么而战？”作为他的患难与共几十年的老部下，其困难处境和极其矛盾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在平津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是蒋的嫡系，在指挥上是棘手的。而傅的嫡系部队，又分散于察绥各地，鞭长莫及，顾此失彼。为了集中兵力，甩掉包袱，缩回拳头，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曾定过一个“甩掉保定、唐山、张家口等地包袱，集中兵力，坚守平津，以观大局变化”的方案。但出乎意料的是，东北解放军于辽沈战役后，未予休整，即神速挥师入关，横越长城，分路从冷口、喜峰口隐蔽地进入北平以东蓟县、石门地区待命，而我们还在五里雾中，认为时局的发展还不会如此之速。

(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张家口的防守部队为第十一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副司令官朱矩林）所属之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下辖二一〇师（师长李恩温），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独立三一八师（师长张进修）；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骑兵第十一旅（旅长胡逢泰）；察省保安第三、四、五团；独立野炮营；独立铁甲车大队；侦察总队第一大队；辎汽兵第一团第一营。此外，驻防张北的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暂编骑兵第二旅（旅长陈秉义）；骑兵第二总队（总队长安恩达）等部，亦归第十一兵团的战斗序列。

十一月底，解放军杨成武兵团突然从绥远回师，在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先后攻占了怀安、万全及孔家庄等外围据点，张家口顿时吃紧。我感到局势严重，立即主持召开了有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参加的各师、旅长及省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的军事会议，决定在十一兵团领导下，所有部队分为两部分：一〇五军的二一〇师、二五九师、二五一师、骑兵第五旅、骑兵第十一旅、野炮营为野战部队，由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省保安第三、四、五各团，侦察总队，铁甲车大队为城防部队，归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指挥。二五一师配备辎汽一团之一个营作为机动部队。野战部队，除二五一师派一个团在市区西南巨赐儿山之线担任警戒外，其余分别集结于上、下堡、东山坡、大境门、平门及七里茶房一带。省保安部队三个团布置在东山坡、飞机场、元宝山、大境门之线。电请华北“剿总”任命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为察

北、绥东总指挥，指挥骑兵暂二旅和骑兵第二总队，在张北县以南地区活动，以策应张家口部队之作战，并负责确保张家口至张北县公路之畅通。还派第十一兵团高级参谋阎家琦住张北县为联络官。与此同时，还电请傅作义速派部队增援。傅即命令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一〇一师（师长冯粹）和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从丰台、长辛店乘汽车昼夜驰援张家口，并命一〇四军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从怀来乘火车开抵张家口，归郭景云军长指挥。企图在张家口外围捕捉战机，歼灭解放军之有生力量。三十五军于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开抵张家口后，随即命一〇一师向占据万全县城之解放军发起攻击。一经接触，解放军即主动撤离万全县城。翌日，张家口东南之宁远堡告急，郭景云军长命令二六七师前往迎击。激战终日，解放军又主动撤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傅作义偕随员刘庸笙等飞抵张家口。旋即在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军长郭景云、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兵团参谋长贾璜，军参谋长成於念、田士吉和所有师、旅长，以及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参加了会议。傅首先听取了军情汇报，然后就张家口撤、守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惟二一〇师师长李思温发言，向傅作义请缨守城。他建议主力部队应出敌不意，迅即撤往北平。为了服从战略需要，他愿率领他的师，并指挥全部保安部队，防守张家口，或者相机撤回绥远。不可犹疑不决，贻误戎机。傅听了很高兴，但设置可否，只是告诉我们：“快打，要打好！”并说：“三十五军和二五八师，我还要调往北平使用。”会后又召集我和袁庆荣军长，民政厅厅长周钧，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载和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人开秘密会议，傅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

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它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傅当日下午即返北平。临上飞机前，再次嘱咐：“荣誉交待”的事，要积极进行。从十二月二日到四日，傅作义总是每日上午九时许乘飞机自平莅张，召集兵团司令官、军长及高级人员开会。

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正在兵团司令部召集我和各军师旅长开会，北平总部第一副参谋长梁述哉突然打来了十万火急的紧急电话（在傅来张家口时，梁每天都有电话报告军情）：“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军分别从东北、西南向平张线南口——下花园间急进，判断似有切断平张交通线，分割包围我军之企图……”傅作义接电话后，即将方才获悉的情报告知大家，并说：“三十五军的行动，待我返平后电告。”旋即匆匆飞返北平。当晚，北平总部给我来电话说：“着郭景云军长率领该军和二五八师，于五日拂晓前从张家口出发，限当天黄昏前撤到康庄附近待命。我当即将此命令告知郭景云，并嘱咐他说：“平张途中恐有情况，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后因运载二五八师的汽车没有筹措好，旋奉傅命留在张家口，归一〇五军袁庆荣军长指挥。

三十五军于五日下午才从张家口出发，当行抵鸡鸣驿时，遭遇小股解放军阻击，当即停止前进。翌日，该军边打边走，晚间进驻新保安。与此同时，我唯恐驻宣化之三一八师和县保安团队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危险，故命令他们立即撤回张家口。不意在五日下午，三一八师师长张进修率领该师及县长王一方率领的县保安团，于撤退途中，在沙岭子附近遭到了解放军伏击，师长张进修负伤，县长王一方自杀，师参谋长张振洋率残余部队逃回了张家口。

郭景云军进驻新保安后，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十二月八日，傅作义派一〇四军安春山军长率领该军前往接援。同时，傅作义命令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亲率所部，向下花园、鸡鸣驿攻击，以资策应。尽管二五八师由郭跻堂师长亲自率领猛攻，并由军长袁庆荣临阵督战，但解放军阵地，犹如雷池，不可逾越。反之，解放军的强大阻击，使郭师伤亡枕籍，不得不撤了回来。经报傅，电示停止执行这一任务。郭景云军在新保安，经十七天的激烈战斗，继十二月十一日傅部一〇四军被歼于怀来、横岭关之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覆没于新保安，至此傅作义嫡系部队已丧失殆尽。

(三)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们接到傅作义的急电：“郭军在新保安被歼，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经察北、绥东与董其武军靠拢。”这是一个有关我军前途命运的问题，我和袁庆荣军长即在我的办公室召集兵团参谋长贾璜和一〇五军参谋长成於念进行研究，决定二十三日拂晓，开始突围，向商都县转进。当时成於念建议：“兹事重大，成败在此一举，应召集各师、旅长、民政厅长、七兵监、分监等共同研究突围计划。”袁庆荣军长恐怕泄漏机密，引起骚动，于是决定：除密电察北、绥东总指挥鄂友三外，其余各师、旅长由袁分别面授机宜。突围部署：（1）电令察北、绥东总指挥鄂友三，率该旅及安恩达、陈秉义等部由张北油篓沟一带即速攻占长城线之狼窝沟和神威台，接应张家口突围部队；（2）令二五九师郭跻堂部为前卫，于二十二日夜，出大境门，向陶赖庙方向攻击前进，打通通向张北、崇礼之道路，掩护

全军突围后，改为后卫，向商都转进；（3）令骑十一旅旅长胡逢泰归骑五旅旅长卫景林指挥，从七里茶坊经孔家庄突围，然后向察北、商都一带转进；（4）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部为后卫，掩护全军撤退后，在本军后跟进，向商都一带转进；（5）其余为本队，按二一〇师，兵团司令部，军司令部，二五八师、保安司令部及所属各团之顺序，沿前卫行进路线向商都转进。

二十三日拂晓，我和袁军长商定：他先出大境门指挥部队撤退，我留在兵团司令部等候北平总部是否还有指示。等到十一时许，北平总部迄无指示，我即驱车出了大境门到朝天洼一〇五军指挥所位置，和袁军长会面。当时兵团参谋长贾璜、民政厅长周钧、教育厅长胡子恒，还有几位师旅长在一起，大家面面相觑。我十分焦急地问：“欣然（袁的字），部队呢？”袁答：“先头部队打不出去，还掌握着几个师的兵力。”这时，当面解放军占据朝天洼两侧高地，强力阻击。二五九师的一个团，数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袁军长再次下令，要郭跻堂师长带领全师发起猛攻，并令炮兵向通往崇礼的道路猛烈轰击。但解放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愈战愈强，对我突围部队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虽然全师投入战斗，亦毫无进展。原来指定从七里茶坊向孔家庄突围的骑兵部队，听说从大境门外突围的步兵，已打通出路，于是他们改变路线，也出大境门，跟在步兵后面突围。这时，步、骑、炮兵，五万余人拥挤在一个一里宽，二十来里长的狭窄的山沟里，十分混乱，以致杂踏相挤，怨声载道。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人民解放军即向张家口市区攻击前进，并分别在陶赖庙、汉诺坝、麻地营、乌兰哈达等地进行截击。我们面对这一人民的巨型铁钳，已如釜底游鱼，无力挣扎了。下午三时许，我和袁军长商量，必须集中力量，在黄昏前，打开通路，否则到黄昏后就无法

掌握部队了。当即令炮兵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并以骑兵连续冲锋，但均被解放军猛烈的火力击退。而张家口市已在当日下午，被解放军全部占领，欲恢复原来的守城态势也不可能。这时风力转猛，飞雪飘飘，士兵们在风雪中，饥寒交迫，已无战斗能力。突围部队，步、骑兵各一部，先后在东窑子、西甸子被击溃，我两个师兵力在陶赖庙西南山强攻达十二次，均遭顿挫，伤亡十分惨重。余部均溃散被俘。我四个团的兵力，在二道井高地及乌兰哈达、高家营南山之线，经过激烈战斗，在二十四日也先后被歼。至此，我突围部队有组织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张家口突围部队共五万余人，除一部分骑兵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和被俘。

在将近黄昏时，我令跟随我的骑五旅王绳武团的一个连，向陶赖庙小山口方向增援，我和我的警卫员在当地一个老乡的引导下，在风雪弥漫中，沿着崎岖曲折的山路，通过长城线的神威台，向商都方向走去。在商都县四台房子一带，与鄂友三、察北专员白震所率的保安队、陈秉义、包贵廷、安恩达、察盟保安队、省保安团曹凯和李维业等部，以及张家口突围出来的张汉三、楚云龙和杨占山残部，先后会合。然后经土木尔台、大青脑包山撤到绥远省武川、固阳一带和董其武部汇合。

此次张家口战役，华北“剿总”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所属一〇五军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以及其它部队共五万余人，全部被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平津战役中，继康庄国民党第十六军袁朴部，怀来南山横岭关第一〇四军安春山部和新保安第三十五军郭景云部被歼之后，打的又一个令人信服的胜仗。

(四)

回想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军队装备劣、条件差，塞外荒漠，备极苦寒，但全体官兵，凭着爱国大义，不怕苦，不怕死，曾先后转战于长城、百灵庙、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原和绥包等地，鲜血洒遍华北战场，受到了人民的赞誉。而在解放战争中，我们错误地执行了蒋介石反人民的“戡乱”政策之后，依然是这个部队，却屡战屡败，每况愈下，终于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性质，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实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出的绥远方式的感召和教育下，使我们认识到再不当去执行反动的“戡乱”政策，继续为腐朽的反动政府卖命；再不当让苦难的广大人民，在反革命战争中，辗转沟壑，流离失所。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傅作义先生亲自领导和组织下，董其武将军和我率部毅然决然地举行了绥远起义。从此，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光明大道。

(一九八四年)

张家口解放的片断回忆

杨维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张家口解放时，我任国民党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一〇五军副军长。现将我在张家口战役中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就回忆所及，记述如下。惟事隔三十余载，所记忆的难免有所出入，尚希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

一九四八年入冬以来，华北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指挥下的部队，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失利，完全陷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形成的战略包围之中。加之，辽沈战役以国民党部队的彻底溃败而告结束后，华北战局，更加岌岌可危。华北“剿总”在此严峻的局势下，不得不收缩防线，集结兵力于平、津、塘和张家口之线，积极充实战力，构筑工事，准备固守，以图确保海口之安全和平绥线之畅通。这样，将可根据形势之发展，“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从海口南逃或沿平绥线西退”。这就是傅作义当时的战略意图。

(二)

张家口地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傅部必要时西撤绥远的重要支撑点，故配置重兵防守。防守部队，是傅的嫡系第十一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副司令官朱矩林）。该兵团所属部队为：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下辖二一〇师（师长李思温），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独立三三八师（师长张进修）；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骑兵第十一旅（旅长胡逢泰）；察省保安部队第三、四、五团；独立野炮营；独立铁甲车大队；侦察总队第一大队；辐汽兵第一团第一营；临时归十一兵团战斗序列的一〇四军之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此外，驻防张北的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暂编骑兵第二旅（旅长陈秉义）、骑兵第二总队（总队长安恩达）等部亦归第十一兵团的战斗序列。

张家口外围的防御工事，早在一九四八年春就开始构筑（当时我任察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城防司令）。除防守部队参加构筑外，还强征民工数千人投入了这一工程。张家口外围，如：赐儿山、人头山、元宝山等各个山顶，山麓；以及各主要交通路口，均筑有钢筋水泥碉堡；市内重要地点，筑有核心工事。在张家口被围，榆林乡飞机场被占后；在市内东山坡又强征民工赶修起临时使用的飞机场。

担任城防和守卫飞机场的部队，主要是保安部队，还有一〇五军二五一师之一部。其余部队，除一〇五军之二一〇师和骑兵第十一旅驻防柴沟堡（后柴沟堡弃守，该两部撤至张家口近郊），独立第三一八师驻防宣化外，均集结市内，作为野战部队，机动使

用。

(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张家口外围顿形紧张，张家口东南孔家庄一带，时有小股解放军出没，多次与张家口守军派出的侦察部队发生战斗。

十一月二十五日（可能记得不准确），据侦察部队报告，孔家庄附近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在活动，并有向张家口推进的迹象。一〇五军袁庆荣军长据报后，一面报告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命令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率领所部于翌日拂晓乘汽车前往迎击。当该部驰往孔家庄后，解放军只留战斗小组与我前哨部队接触，其主力已经撤走。

十一月二十九日，柴沟堡、怀安、万全相继解放，驻守柴沟堡一带之二一〇师和骑兵第十一旅亦撤至张家口近郊。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来犯之解放军系杨成武部二十兵团，有围攻张家口之企图。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立即电请傅作义总司令派兵来援。三十日下午，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所部一〇一师（师长冯梓）和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乘汽车星夜驰抵张家口，归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指挥，旋即命令一〇一师向万全发起攻击，企图一举击歼占据该地之解放军。但先头部队一经接触，解放军即主动撤走。十二月一日，解放军一部向张家口附近之宁远堡进攻，三十五军郭景云军长命令二六七师迎击，激战终日，解放军又主动撤走。是日，为支援张家口而临时拨归三十五军郭军长指挥的一〇四军之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亦乘火车开抵张家口。

十二月四日上午，傅总司令乘飞机来张，当即在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以及所有师旅长，还有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会上傅首先听取了战备情况的汇报和部队长们的建议及意见，然后傅作了指示，并鼓励大家要有必胜信念，要很好地练兵、作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等等。关于张家口撤或守的问题，始终没有肯定。傅只是说：“回北平研究后再行电告。”傅当日即飞返北平。

十二月五日，三十五军奉傅急电，从张家口开返北平。但行抵下花园、鸡鸣驿时遭小股解放军之阻击，停止前进。六日，该军边打边走，终于被解放军围困在新保安。

十二月七日，驻防宣化的三一八师张进修部，奉令向张家口撤退途中，在沙岭子被解放军围歼，师长张进修负伤后逃回张家口。接着解放军攻占了榆林乡飞机场。

十二月九日，傅给孙兰峰司令官和袁庆荣军长来电说，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围，除已令一〇四军安春山部即日从怀来驰往接援外，着一〇五军即向下花园、新保安攻击，以资策应。军长袁庆荣和我即日上午率领二一〇师李思温部和二五九师郭跻堂部执行任务。当先头部队进抵沙岭子附近时即遭据守沙岭子的解放军猛烈阻击。激战至下午四时许，伤亡很大，毫无进展，遂撤返防次。

自援军三十五军撤离张家口后，前几天从万全、宁远堡等地撤走的解放军，卷土重来，逐渐迫近张家口郊区，形成四面包围。防守部队为了巩固防线，调整了部署，在关键地区，增强了兵力，加强了戒备。惟连日以来，不断与解放军接触，屡吃败仗，士气低落，广大官兵，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安。

(四)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傅给孙和袁急电：“三十五军已在新保安被歼，张家口守军要相机突围，向绥远转进。”孙和袁接电后，研究商定：部队的行动，完全由袁庆荣军长负责指挥。于是袁即召集我和参谋长成於念在地图上研究，大致决定：步兵从大境门，骑兵从七里茶坊分两路突围，向商都转进。并决定，当日晚上，先派二五九师郭跻堂部出大境门，向陶赖庙方向出击，为突围部队开路。具体突围部署责成参谋长成於念草拟。为了严格保密，突围命令除驻张北的骑兵十二旅鄂友三部用电报下达外，其余驻张家口的部队，均由袁军长召来，下道口述命令。

十二月二十三日拂晓，各部队遵照突围命令开始行动。我随袁军长出大境门后，看见前面的部队行动迟缓，后面的部队，拥挤在狭窄的河沟里，呈混乱状态。当我们行抵朝天洼时，已十点多钟。这时，先头部队正与据守在陶赖庙南北高地上的解放军激战。几次发起冲锋，皆被击退。这时，袁军长亲到炮兵阵地指挥射击。将近中午时，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赶到，经和袁庆荣军长研究决定，再投入两个团向当面的解放军进击。但正面和两侧高地的解放军愈战愈多，顽强阻击，屡攻不下。到下午四时左右，从七里茶坊突围的骑兵部队，因遭阻击，突不出去，于是又返回来从大境门突围。这时步骑兵混在一起，乱作一团，部队随之失去掌握。接近黄昏时，所有部队已溃不成军，解放军的射击亦逐渐沉寂下来。这时，袁军长、我和成参谋长带着司令部一些官兵进入山里，翻山越岭，转了一夜，二十四日上午，在一个山头上被俘。

至此，盘踞张家口的国民党傅作义部的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五个整师，两个骑兵旅，三个保安团以及其它特种部队共五万余人，除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和少数骑兵部队脱逃外，全部被歼。塞外名城——张家口重新解放。

傅作义部三十五军在 新保安被歼经过

冯 梓

傅作义（以下简称傅）部三十五军，是傅嫡系部队三个主力军之一，辖一〇一师、二六七师（原暂二十六师）和二六二师（原暂十七师）三个师。傅到北平任总司令后，把这支部队控制在北平附近，作机动使用。远距离活动或急用，以汽车输送；近距离活动，仍以原有骡马驮载、挽拽，指挥官乘马，其余步行。涞水战役（解放军叫保北战役），就是这样，算不上摩托化。汽车输送时，师长也是坐十轮大卡，没有吉普指挥车。打起仗来，只得徒步指挥，远不如乘马方便。也不全是美械装备，在最后被歼时，还有苏式机、步枪，日造山炮。三个师战斗力也不平衡。一〇一师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二六七师是原胡宗南部二十六师，曾被解放军击歼一次后，由各部抽调干部，补充新兵，重新组建的，战斗力较差。当时我是一〇一师师长。这个师的三个团是：三〇一团（以下简称一团），是三十五军的老底；其余两个团是在抗战初期，忻口战役太原突围后，由其它部队编入的。三〇二团（以下简称二团）是由原国民三军独七旅的一个团改编而成的，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曾任这个团的团长；三〇三团（以下简称三团）是由山西部队的的一个团改编而成的。

一九三九年，傅部归八战区后，移驻绥西后套。那里比较偏僻，环境较好，干部私心杂念少，很多政治干部是由延安派来的；三十五军也派干部到延安抗大学习。傅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名为十项纪律，严格执行。官兵过着极艰苦的生活，战斗作风和群众纪律都较好。决心抗日到底，不当汉奸亡国奴。

部队进北平后情况大变，干部逐渐腐化堕落，贪图享受，广大士兵直接间接受到共产党宣传，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战争有所认识，而不愿继续卖命，从而部队素质每况愈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三十五军（欠二六二师）在北平西南丰台、长辛店一带集结休整。二十九日忽奉命急援张家口，出发时已到下午，我师在先头行进。途中大休息时，师侦察人员下车侦察，得到了一些材料，经综合分析判断，发觉我们去张家口的行动，解放军已知道。我感到惊奇，向郭景云军长（以下简称郭）作了汇报。他听后，并看了些材料，发火说：“我说总部有了八路（郭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习惯称呼），不假吧！咱们还没动，人家都知道你去哪儿，以后这仗怎么打！”当时我只感到惊奇，但判断不出个正确结论，郭即判断为总部有人通敌。三十日下午，到了张家口，随即协同友军攻击万全方面的解放军，解放军撤退。十二月二日，又协同友军击退宁远堡方向的解放军。三日，张家口外围已无情况。四日，傅飞来张家口，召集军以上干部开了会。傅回北平后，发现东北解放军已南下，这才急令三十五军速回北平。原定六日一早我军先行。出发前，郭告诉我：“你不能先走啦！总部来电着二五八师（原暂十师）临时归

注①：其它文章都说三十五军是十二月五日由张家口出发，开返北平的。

我指挥，一起回北平。你知道，我不能和安小个子（一〇四军军长）一样，谁归我指挥，就把方便让给谁，让二五八师先走，你后走。”接着辎汽一团的陶营长来说：“军部抽调汽车到张家口。”我以为是给二五八师调配汽车。午时，汽车载面粉回来，汽车队的干部说：军部的面粉，让每个汽车搭配装运。过午，军部通知说：二五八师因抽不够汽车，不能一起走了，仍着我先行。出发时已下午一时许。在张家口至宣化的中途，遇到由宣化撤出的胡团长告我说：“下花园附近和以东地区，已发现情况，路过时要注意！”过下花园时，南山已有枪声，先头部队在鸡鸣驿山脚下的公路上，被又宽又深的壕沟阻隔，汽车不能通过。这个沟左起峭壁式的山脚下，紧靠铁路，铁路一侧，是打着很高的石坝，下面就是大洋河。公路、铁路并靠，山脚到大洋河相隔很近，这段狭路还很长，沟宽三、四米，深二、三米，长十几米，车过不去，于是赶快把工兵连调上来。挖出来的土不够填沟，可能是把土倒到大洋河里去了，还得到别处取土。挖倒沟壁，做斜坡路，也得相当时间。车停的时间长了，郭赶到前面发火。他看过这个沟后，感叹地说：“真他妈的挖到点子上啦！他们地形熟，这手做得多绝！前边情况怎样？”我说：“部队下车向鸡鸣驿前进啦。”沟修得能过车后，已近黄昏。军部通知，今晚在此附近宿营，军部驻鸡鸣驿，一〇一师驻鸡鸣驿附近，二六七师驻下花园附近。

七日早，郭率二六七师和一〇一师二团先行，令一〇一师（欠二团）顶住后边和南边追来的解放军，掩护部队安全通过山下隘路后跟进。二六七师攻下西八里向新保安进击时，前来助战的飞机又轰炸了自己人（在张家口外围作战时，蚊式战斗机就曾把我师二团的白营长炸死，他是郭当团长时的老连长，使郭

又痛又恨)。午后，西八里、西水泉、新保安之间停满汽车和炮兵，下花园方向追来的和由涿鹿县渡过大洋河南来的解放军，紧追猛冲，要袭击汽车和炮兵，展开激烈战斗，有两个营长伤亡。我到新保安西北山坡上找到郭军长，报告了后边激战情况和飞机滥炸之事。他气忿地说：“飞机又炸自己人啦！那架飞机的号码是九〇五号，我已向总部发电报追问。飞机上也有了八路啦，这仗怎么打？！”我说：“打过了新保安快前进吧，这块地形久打不好！”他说，“你别管啦，可不能让八路冲过来！”我师进新保安后，天已黄昏，在西城墙上布置防务时，解放军集中炮火猛烈袭击。初进城里，部队毫无掩蔽，造成不少伤亡，我师常效伟副师长就在这时候受重伤的。当晚驻新保安。八日早，令我师（欠二团）攻击前进。攻下车站后，发现解放军阵地内留有一些遗体，我即想到，解放军的打法变了，不是“打不赢就走”，而是硬拚啦。我把两个团都展开，沿公路方向主攻，打了一天，突破了不少阵地，但没打到东八里，晚上撤回城里。第二天（九日）拂晓继续进攻，主攻方向改在右边，反复猛冲，曾一度突破了解放军东八里的阵地，但因解放军兵力雄厚，火力炽烈，工事坚固，打开通路确不容易，又拚了一天，仍未攻下。这次解放军的打法和以往不同，一方面硬冲，另方面硬顶，对峙线交错难分，以致飞机投弹往往误伤了自己人。第三天（十日），郭亲率两师（欠我师二团，留在城内守城），又打了一天，连东八里也没有打到，伤亡很大，士气沮丧，郭也只好服气，撤回城里。（一〇四军来援之事，郭当时没有详细告我，第三天的攻击是不是要和一〇四师汇合，现在我记不清了。）援军撤走后的一个晚上，忽然奉命要轻装突围，汽车、重武器要彻底破坏，重伤兵不带。正在准备中，忽又决定死守待援。于是分配了防守任务，我

师担任城的西半部。防御部署是：三团守城的西北角（由北门至西门），在解放军居高临下的控制下，防守较困难；一团守西南角（由西门至南门），地形较好，但该团伤亡较大，兵力已弱；二团为预备队，着该团构筑向东防御阵地，准备巷战的工事。每晚在军部开碰头会，汇报当前情况，研究下一步作法。这时王雷震副军长病重不能参加，田士吉参谋长虽参加但很少发言，郭传达一下傅的来电指示，电报始终没有让开会的人看过。郭临战时，在枪林弹雨中，能带头冲杀，确是一员勇将；但他文化不高，运筹帷幄，研究战术，在图上指挥，却没有一套。十二月中旬这十天时间，没有激烈战斗。补给断绝，只靠空投，空投场日渐缩小，时常偏投城外，解放军放心用、吃（不会有假、放毒），城内守兵，望空饿叫！

围城期间，解放军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立标语牌，以空炮弹壳打宣传品，夜间到处喊话，听得真清。约在十五日前后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了一封信，拆开看过，思想震动，找送信人，找不到了。信上说：“我是甄梦笔，甄华是我的新名，我这几个字，你还可以认得出是我写的……你们完啦！……快率部队起义吧！……”甄华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一九二六年冬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两都在太原，甄梦笔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末，国民党派人来太原清党，甄华逃回我县（山西平定）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到日本留学。抗日初期回国，我在山西离石和他见面，那时我是三十五军一〇一师的营长，他到我营教过向日军喊话的日语口号，并鼓励我好好抗日，旧事未提。这次看到他的信后，我的思想曾激烈地斗争过。甄华说：“你们完了！”我相信；但起义的事，不好办。部队毫无思想基础，这师的三个团长，都是绥远的学生，住过傅办的绥干团，毕业后分配到这个部

队培植起来的，是一些所谓“家生驹子”，跑不了的干部。郭军长是由这个师的师长升任军长的，师里的二团，是他当团长时由独立七旅带过来的，在这个班底上怎能搞起义呢？！我的思想也没有准备，当然不想反动到底，但先傅作义投降是不愿做的。我偷偷地把信烧掉，没有同别人说过。这时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们的宣传，并有对傅的宣传消息。这时，每晚碰头会上，郭再不说傅的来电指示了。我想这时傅该怎样指示呢？！还说死守待援，援从何来？能说死守守死吗？如果说：

“死守待机”，还能使人相信。我在那时的思想就是以“死守待机”为精神支柱的，总认为傅是不会不管我们的。最坏的结局，就是傅下令着我们投降，做北宋时的杨业^①。这样我们也好重新做人，建功立业。当时，我所以加强构筑工事，让宣传部门，编造谣言，鼓励士气，自己还给主要干部讲些幻想的道理，就是想死守待机。

二十一日下午，解放军开始发动总攻，城外零星据点的守军都被压回城内。二十二日拂晓，解放军曾突破三团阵地，后又恢复。上午解放军已占东城，二团全部展开，向东激战，约在下午三时前后，我和郭军长通了最后一次电话。他说：“完啦，你过来吧！”我说：“我这儿还没完，我派部队把你接到这里来！”随即电话不通了。我这时还控制个工兵连，令史连长冲到军部把军长接过来。接着二六七师温汉民师长，不知由哪里绕到我这掩蔽部里，他说：“东部全完啦！军部已过不去。”不久史连长血

注①

杨业也叫杨继业，原是北汉刘崇部将。宋太宗打下太原后，刘崇已降，杨业尚未降，刘崇令杨业降宋。杨业投宋后，成为北宋唯一良将。杨家将坚拒契丹，推迟了割宋为北敌做儿皇帝的时期。

迹斑斑，气喘吁吁地进来说：“我连伤亡已无人了，冲不过去啦！”我说：“你去裹伤！”这时二团的政工主任王德全进来，可能有事找我，我没等他说话，就对他说：“你快去设法和解放军联系，说咱不打啦！败局已定，为什么再死人呢！”他看我很难过，可能有话没说，只说：“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就去。”近半小时左右，他领着解放军的一位干部和两个战士，来到我的掩蔽部，我下令各团停止战斗。解放军干部看见我打了电话，外边枪声已稀疏，他说：“我回去报告我们首长去。”不久城里的枪声渐停，黄昏时，战争已告结束，三十五军全部被歼。晚上解放军高级首长接见了我和二六七师温汉民师长以及我师的樊参谋长。第二天（二十三日），把我送到兵团敌工部前训处和甄部长、吴处长见了面，他们对我热情款待，甄部长对我作了批评和热诚开导，还陪我到涿鹿县城买了些日用东西。

在前训处看到的小报上，才知道郭景云已被击毙。以后到解放军教团学习时，又听说郭是打两枪自杀的。一九八一年和王雷震在大同见面时，他说：“……枪响第二声后，郭才倒下，当时以为是打两枪自杀的。我出掩蔽部被俘后，到了一个较安静的地点，才发现我的军帽上有个子弹穿过的弹孔，估计郭第一枪是打我的，第二枪才自杀。”

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在突然战略包围，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就地歼灭的总的战略指导下，巧妙的战役布置，灵活的战术指挥，充分而具体地宣示了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革命战略战术的威力，是不可抗拒的。这对国民党部队起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我能作为人民的败将，结束旧军人的一生，亦云幸矣！我亲

历斯役，慨感沉深，忆旧探新，志以循衷！写于事过三十七年后
的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张家口突围的前前后后

卫景林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下旬间，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张家口的国民党部队，有：第一〇五军的全部，第一〇四军的第二五八师，两个整编骑兵旅，暂编骑兵第一团，还有察哈尔省的保安部队；外围有独立第三一八师驻防宣化，约计五万余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些部队开始突围，二十四日就全部被解决了。当然，事物的发展不会是孤立的，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局势，是与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事上的多次惨败，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全面解放分不开的。这是大势所趋。

首先回忆一下当时华北地区的军事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后，华北地区的军事形势，越来越紧张，尤其一九四八年秋季，解放军占领包头，包围归绥以后，华北“剿总”所属部队，就调来调去，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当时，我是国民党整编骑兵第五旅旅长，奉华北“剿总”电令，派我为察、绥边区指挥官，活动于察北的独石口、张北县、尚义县、绥东的兴和县、集宁县等地。由于军事形势所逼及战斗中积累的经验，我骑五旅的部队，一到夜间宿营时，便人不卸装，马不卸鞍，乘马的哨兵要派到二十华里以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华北“剿总”命令我旅向绥远集宁县以东地区活动，尔后归第一〇五军指挥。时间已过两天，我还

没与第一〇五军联系上。我刚到了老平地泉（集宁县以东的一个村庄），华北“剿总”又电令我旅归第三十五军指挥。可是第三十五军在那里呢？电台也呼叫不通，我只好指挥部队向各方面进行威力搜索，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并求与三十五军取得联系。我将上述情况，向华北“剿总”报告后，又电令我经过兴和县撤到柴沟堡。

解放军由西向东，昼夜兼程疾进。可能是曾经占领包头和包围归绥的部队挥师东向，所以我旅连夜向兴和县撤退。第二天下午，我旅到达兴和县东南地区，正准备宿营时，突然遭到解放军第三兵团的追袭。幸好我旅是兵分两路行动的，只有一部分向宿营地前进中遭受袭击，但并未受到损失，便连夜撤至柴沟堡地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奉华北“剿总”电令，调我旅到张家口市内归第十一兵团指挥。当我旅进抵张家口市以西，赐儿山西北，万全县东南地区将要宿营时，解放军第三兵团的部队又跟踪追来。天已黄昏，而解放军仍在尾追中。我想，如果让追击的解放军，随我骑兵进入张家口市，那这个责任我是承担不起的。所以我立即布置部队，坚决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这时，我派参谋进到市区，以电话向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报告了战斗情况。不久，孙派一〇五军副军长杨维垣坐汽车来到前方，了解情况。因我在第一线指挥，未与杨见面。第二天拂晓前，追击我旅的解放军，全部向张市西南地区撤走，我旅便进入张家口市内。

我向孙兰峰司令官汇报我旅战斗经过及其它情况后，孙对我说：由于你旅装备较好，所以总部将鄂友三旅（整编骑兵第十二旅）调去察、绥边区，把你旅调来张市，作为防守张家口的机动部队。这里所有的骑兵部队（包括整编骑兵第十一旅和暂编骑兵

第一团)统归你指挥,好好发挥骑兵的特长,积极配合步兵作战。并说:“张家口市所有部队和一切军事行动尔后统归欣然(第一〇五军袁庆荣军长的字)指挥,以后有事找他。”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上午,傅作义将军乘飞机到了张家口,即时召集师、旅长以上军官在张家口市东山坡第十一兵团司令部驻地(第一〇五军军部也在此。就是原张垣绥靖公署所在地)开会。大家都很高兴地想听听傅先生对形势的分析和尔后的作战计划。会议刚开始,第十一兵团参谋长贾璜来到会议室,走向傅先生面前,靠近耳朵说了些什么。傅即时站起来,背着手沿长条会议桌踱了个来回,一言未发走出会议室。与会人员鸦雀无声,面面相觑,等待着新的消息。几分钟后,贾参谋长又来会议室,大家向他打听消息,贾说:“总部的情报说,昌平县以北山里,发现由东北入关的解放军,有四个旅向西急进。”大家听到这出乎意料的情报后,异常震惊。东北的解放军,接连打了好几个大的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按说,总得有个整顿、喘息的时间吧。总部曾经估计,东北地区的解放军,最少也需要有三、四个月的休整时间,所以总部在这个阶段的作战计划,很少把东北解放军进关后的力量对比考虑在内。难怪傅先生对这突如其来的情报,如此震惊。于是匆忙地立即乘飞机返回北平。这次会议也就这样结束了。上述情况的出现,对守卫张家口的高级军官的作战情绪影响极大。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和第二六七师)奉命由张家口乘汽车返回北平,途经新保安时,被解放军堵截,打不过去,便退入新保安城内宿营。解放军大部队日夜兼程赶到,将新保安城团团包围起来。第一〇四军奉命接援,亦未成功。

就在这时，张家口防守司令部，曾策划命令我骑五旅，绕道崇礼县地区，利用山区的隐蔽，出其不意地直扑新保安城，接援第三十五军突围。不清楚为什么，后来这一计划并未执行。实际上，这个方案，执行起来很成问题。经崇礼县境内到新保安城，几百里路均系高山深谷，居民分散，村庄稀少，购买马草困难，且时届严冬，野草枯干，不便放牧，特别是骑兵目标又大，易于暴露。显然，这个计划，不啻纸上谈兵。

起初，防守张家口的步、骑兵，不断地到外围进行威力侦察，并部署了必要的外围据点。嗣因包围张家口的解放军越来越多，外围各据点，经反复争夺，逐渐丢失，包围圈越压缩越小。我步、骑兵的活动，一天比一天困难。榆林乡飞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我骑五旅奉命夺回飞机场。我即派第十团发动攻击，但遭到了解放军猛烈的火力阻击，机场未能夺回，而人马的损失则很大。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间，我旅副旅长谷耀武由防守司令部开会回来，给我汇报说：司令部决定，张家口的所有部队及各方面有关人员，于明天（二十三日）拂晓突围，向商都转进。突围部署是：步兵及其他人员从大境门（张家口的北城门）突围，骑兵部队于二十三日拂晓开始，向张家口市以南突围。特别注意要严守秘密。

二十二日夜间十二点左右，听见大境门外枪声相当激烈，后来，枪声由近及远渐渐沉寂。

我骑兵部队的突围计划是：骑兵第五旅为第一线，第十一旅及暂编第一团为第二线，并以骑五旅的第十团为突击部队，于二十三日拂晓前开始突围。从解放军包围部队的薄弱部分突破，尔后在突破口两侧占领阵地，支援我后续部队的突围。两个骑兵旅和骑兵第一团于突围后，渡过洋河向西绕走，相机越过铁路，奔

向绥远集结。

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多钟，据我旅第十团报告：包围张家口口的解放军，在张市以南利用既设的纵深阵地，严密防堵，我先头部队损失很大，难以突出。就在这时，我骑五旅参谋长马仰超向我报告说：据报，从大境门突围的我步兵部队，已打通退路，冲出包围圈了。于是我们两个骑兵旅便奔向大境门。

当我到达大境门外约二十多华里的地方，看见不少步兵部队和其他人员靠在山坡或躺在山沟安然睡觉，也有些一动不动地站着。东山偶尔有机枪声，正前方山头突出部分有我步兵，其对面山头的解放军，有时稀稀拉拉地打几枪，双方均不发动攻击。眼看天快黑了，我感到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便带几个人走上山头，正好碰见第一〇五军第二一〇师师长李思温，副师长令狐狸，我与他们商议说：我们后边的不少部队都躺在那里睡觉，一点行动没有，这不是等着缴枪当俘虏吗？我的意见咱们两个部队应即联合行动：一是你师发动攻击，我骑兵配合起来，攻占对面山头后掩护我们的突围；二是等天黑后，悄悄绕过山沟，先向东北方向即通往崇礼县的大沟，尔后再转向西北往张北县以北突围。李思温同意我的第二个意见。

我即召集骑五旅的副旅长、参谋长、团长说明情况，讲清楚突围路线后，并说，小的接触也可能有，但能不放枪就不放枪，除非万不得已，尽可能地避开走，我们的目的是突围。突围序列：我旅按第九团、旅部、第十团，暂编骑兵第一团的顺序；第十一旅在我旅后跟进。将以上部署书面通知暂编骑兵第一团和骑兵第十一旅（因他们尚未到达）。

因我先头部队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山路崎岖，单人牵马行走很困难。直到第二天（二十四日）中午以后才走下山来，仍

未绕出坝顶（张家口以北最高的山），依然在长城线以内，查点人马不过二百多，连、排、班组织都乱了，只好临时编组起来。细看，前面的山很高，而且山上的解放军沿簸箕形的坝顶严密封堵，我们企图突围是不可能的。这时骑兵第十一旅参谋长李兴久赶到。他说，突围的步兵已全部缴了枪，当了俘虏，骑五旅的一部分已绕出包围圈向崇礼县方向溃逃，其余也都被俘。

太阳快落的时候，解放军从几方面向我这二百多骑兵围上来。这时，战是没有力量再战了，我又不甘心当俘虏，我便对我旅副旅长谷耀武、王存瑞、参谋长马仰超、骑兵第十一旅参谋长李兴久等说：你们看着办吧，我不能当俘虏。说完，我便上马向东南方向顺山坡跑去。天黑了，旅部副官赵峰、卫士靳则贤也来到了，三个人乘混乱之机返回张家口，住在旅部剧团。

我感到住在这里不够安全，便于第二天着赵峰和住在桥东的一位姓许的朋友联系，当晚即住在他家。许先生对我们很好，给我们换上了便衣，我俩便安心住下。过了几天去北平的火车通车后，我俩便乘车到了北平。

傅作义将军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随董其武将军乘飞机到了绥远省归绥市参加了促进绥远“九·一九”起义工作。起义后，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军副军长，一九五一年参加了抗美援朝。

傅作义部第一〇四军在怀来南山被歼记

张 沧

国民党一〇四军，即原暂三军，是傅作义部的三个主力军之一。在平津战役期间我担任该军政工处长。

一九四八年入秋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济南及其它战场上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华北战局也随之紧张起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拟集结主力于平、津、塘地区，以保障海路畅通，进退皆宜。

十二月初，傅作义急令支援张家口的三十五军及配属的一〇四军的二五八师乘汽车迅速驰返北平，令一〇四军主力在怀来东西公路沿线掩护三十五军通过。

为了确保平张公路的畅通，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着驻狼山、土木的二六九师攻占了刚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沙城；着驻康庄的二五〇师跟着进驻狼山、土木。同时，傅作义总部命令十六军由南口、居庸关进驻康庄。

一〇四军的骑兵大队在向永宁搜索时，发现人民解放军冀热辽军区的骑兵旅配合步兵旅正向怀来方向攻击前进。安春山除着二五〇师迎击这股解放军外，并向傅总部报告。傅总部即派飞机前往助战。出乎意料的是飞机把炸弹错投在二五〇师九十三团九连阵地上，全连官兵伤亡殆尽，大家十分愤慨，严重地影响了士气。

十二月五日，三十五军从张家口出发，本应在午间通过怀来，孰料出发时间竟晚了七个多小时，而且没有带上二五八师。过了下花园因排除路上的障碍也费时误事至六日始进驻新保安。这样，担负掩护的一〇四军也被拖滞于怀来一线，致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

十二月六日晚，傅总部命令十六军（欠一个师）和一〇四军合力接援三十五军回北平，统归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指挥。当时，安春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迅速接援三十五军问题。决定：着十六军先派一个团接怀来城防，其主力固守康庄，保证三十五军和一〇四军顺利通过；着副军长王宪章率二五〇师、二六九师及军直属工兵营、通信营各一部，向沙城南的贾家营、宋家营攻击前进，直达马圈；同时修好大沙河北岸公路，接援三十五军同返怀来，三十五军在一〇四军向马圈攻击时，要以一部向东佯攻，主力向南突围，经马圈沿修好的旧公路通过怀来返回北平；着二六九师第一团移交城防任务后，准备随时支援各方作战。并立即将上述决定电告十六军及三十五军。

十二月九日晨，十六军复电已派一个团去怀来。该团开往怀来途中就被解放军歼灭了一个营。安春山为表示对友军的欢迎，特派其卫士张发成坐吉普车前往迎接十六军的刘团长，不料连人带车均被解放军俘虏了。

一〇四军接援部队于九日经赵家营、宋家营直攻抵马圈，同时将马圈与怀来间道路修通，随军的二十辆汽车运输粮弹无阻。当时，安春山以话报机将此情况通知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并促请突围。但郭说该军已经苦战三天，伤亡很重，再无力突围。并说，一〇四军既打到马圈，就该全力以赴，攻到新保安城下，接出三十五军同返北平。安春山认为，一〇四军连续几天的行军作战，

伤亡也很重，如二五〇师十二个营长就伤亡六个，官兵疲劳过度，不能继续前进，希望三十五军再努力向外攻击一下，便可会师。如硬要一〇四军打到新保安是没有意义的。安、郭两人在电话、电报上多次联系，未能统一意见。最后安春山还与三十五军政工处长张鸿恩电话联系，希从旁劝导郭景云迅速突围，也未奏效。

在怀来驻防阶段，安春山表现异常，他对从来不信的一贯道，突然感起了兴趣，摆设神坛，烧香叩头，扶乩祈神指点。安还叫我去看过两次，并看见军参谋长郝勤福和参谋处的马毅英、李文蕴等也在场。安对乩语很感惊奇，说如何如何灵验。我只是虚与应酬一番。我见安似有些着迷，曾背过郝等问安：“你怎么真信它了？”安只微笑一下，以后再没叫我去看。

十日晨，守康庄之十六军突围时主力被歼，军长袁朴率残部向南口逃走。一〇四军副军长王宪章由马圈返抵怀来说：三十五军看来是不愿从新保安再向外打了。我们曾一再请该军配合攻击，向马圈突围，他们置若罔闻。我军在攻克马圈后，解放军猛烈反攻，我军伤亡惨重，经与两师长研究，同意将部队撤回。几天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官兵疲惫不堪，谈不到还有什么战斗力了。

这时，安春山即召开独立营长以上部队长会议，说十六军袁朴部已经被歼，解放军一部已逼近怀来，判断有与围攻新保安之解放军配合东西夹击我们的企图。我们已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现在唯一的生路是，迅速撤出怀来，经十八家子、横岭关，沿日伪时所筑的丰沙公路打回北平去。我们的先头部队必须抢先占领横岭关高地，掩护全军安全通过，否则康、怀间解放军向南追击，先我占领横岭关，堵击我军，我们也将突不过去。

当时情况如此严重，然而与会军官，有的还在打瞌睡，确实是疲乏已极。安讲话毕，征求大家意见，均表示同意。

当时突围部署是：经十八家子、横岭关、门头沟向北平急进；军之骑兵大队迅速沿军的转进路线抢先占领横岭关高地掩护部队通过；工兵营乘汽车二十辆掩护野炮营，在骑兵大队后跟进，并排除路障；二六九师第一团为前卫，攻占十八家子以东山地掩护全军通过后，改成后卫跟进；其余按二五〇师、军部、二六九师（欠一团）、十六军之刘团顺序急进。

命令下达后于十二月十日十七时许开始行动。当部队在城内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以及城外骑兵奔驰的尘土和汽车马达声响，就使解放军发觉一〇四军有了新的行动。

部队开始入山时，望见山口的东山腰有少数解放军在活动，经炮击后就消失了。走到十八家子，太阳已落山。那天夜里天特别黑暗，走不多时，就发现解放军追赶上来，步枪、机枪一齐射击，炮弹也不断地落在人群里。“冲呀！杀呀！”“缴枪不杀！”解放军战士们的喊声在山谷里回荡，象有千军万马冲进了山谷。

由于事先对可能发生的应变处置措施缺乏细致研究，部队也无充分的精神准备，一遇到突变情况便都慌乱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跑，汽车也抢路疾驶，致道路堵塞，乱作一团，部队已失去掌握。我们前面的先头部队也被解放军堵在横岭关以西山谷里，解放军的信号弹不时地由我们的前后左右射向夜空。

夜间看不清崎岖的山路，加之官兵均已疲劳过度，行进极为缓慢。天亮后，解放军分段地一拥包围上来，枪炮声就渐渐听不到了，只见一批一批的官兵放下武器，作了俘虏，被解放军带走了。

由怀来进山的一〇四军大部被歼灭于十八家子至横岭关之间的山路上；越过横岭关的一部分在距横岭关不远处也陆续为解放军或民兵所堵截歼灭。全军除一名师长和少数骑兵漏网外，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政工处长和一名师长均作了俘虏。当时军长安春山，身着士兵服装，未暴露其身份而被解放军释放，逃回北平。

第十二战区接受包头、归绥、大同

日伪军投降经过

靳书科

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达八年之久，庐舍为墟，民遭涂炭，中国人民倍受痛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特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并任命傅作义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接受日伪军投降（当时蒋介石拟着傅作义率部到东北接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日军投降。因傅感兵力不足，地区太远，完不成受降任务，未有接受，才改为热、察、绥三省受降官的）。傅作义奉命后即在绥西陕坝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召开党政军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受降及接收有关事宜。参加会议的有绥陕边区副总司令兼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董其武、副总司令孙兰峰（总司令邓宝珊）、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张潜、秘书长王克俊、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张濯清、保安处长陈光斗、绥远省政府秘书长于纯斋、民政厅厅长陈炳谦、财政厅厅长李居义、建设厅厅长曾厚载、教育厅厅长潘秀仁、地政局局长周北峰、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兼党政总队总队长张庆恩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议决定由

孙兰峰代表傅作义长官为第十二战区受降官，并组成东进接收指挥部。组织成员有陈光斗、孟昭第、王雷震、周钧、苏伯安、张庆恩、张国林、苑乃安、李大超、李英夫、张恺然、徐树仁、陈雉卿、刘映元、白震以及电台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等多人。与此同时，急令战区所属各部队，即刻由防地出发兼程向指定地区疾进，配合接受日伪军投降，办理接收事宜。现就记忆所及简述如下。

(一)

以孙兰峰为首的第十二战区接收大员，奉傅命之后，孙即率领先遣指挥部人员数十人，分乘卡车三辆径直向包头、归绥、集宁、大同等城市挺进。并在接收大员中内定孟昭第为集宁警备司令、张恺然为集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县长；陈光斗为大同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王雷震为副特派员、陈雉卿为主任、白震为对外联络官。他们负责处理集宁及大同日伪军投降及接收有关事宜。同时，傅作义长官分别向各部队下达进军命令：1、暂三军（军长袁庆荣）所辖暂十七师向包头挺进，该师的第三团（团长靳书科）担任西山咀及黄河以南二小圪堵一带第一线防务，即刻集结全团昼夜兼程向包头疾进，迅速进入包头，控制城内日军，维持地方秩序，接受日伪军投降。并令该师副师长宋海潮率领该师第一团（团长张进修）向凉城县进军，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2、令该军所辖暂十一师（师长王子修）即刻由东胜县驻地出发昼夜兼程向归绥市挺进，迅速进入市内，维持地方秩序，接受日伪军投降。3、令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所辖新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即刻由驻地出发经包头沿包绥铁路线向归绥挺进，迅

速进至归绥附近，协助暂十一师接受日伪军投降。并分兵一部向陶林县进军，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令该军所辖第一〇一师（师长郭景云），由驻地出发，继新三十一师之后经集宁向大同挺进。到达集宁后归孙兰峰受降官指挥，接受大同日伪军投降。命该军长率所辖新三十二师（师长李铭鼎），继一〇一师之后，向集宁、丰镇挺进，协助该两县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两县。

4、令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率领该部由哈拉寨驻地出发，渡过黄河沿集宁、兴和、柴沟堡之线，向张家口挺进，迅速进入该市，担任城防，代表傅作义受降官接受日伪军投降。为便于各地进行接收，特于事前组成各市县政务委员会，负责接收日伪物资，开展地方工作。各军、师奉命东进后，傅作义长官任命步兵旅（原五临警备旅）旅长于霖瑞为河套地区警备司令，担任该地区的防守任务。

（二）

日本投降时，我任暂十七师第三团团团长，担任西山咀及黄河南岸二小圪堵一带第一线防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傅作义长官直接发来的紧急电令：着我团即刻集结星夜出发，向包头市进军，担任该市城防，控制市内日军。十六日下午我团进至麻池以西地区时，傅作义长官又派汽车传令我团：“部队加速前进，靳团长在原地等候接受新的任务。”不一时，傅长官乘坐卡车到来，我即向前请示任务。傅作义长官指示说：“据报包头飞机场有日军战斗机一架，日军想焚毁。任命你为包头市城防司令，代表接受日伪军投降。进入包头市后，命令日军放下武器，将日军控制起来，令之准备接受投降，不得有任何轨外行动。所

有日伪物资一律贴封看管，令日军造具清册，听候接收，无长官部命令任何人不得动用（因我系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对日军情况比较了解，可以不经翻译直接命令日军）。部队让副团长率领继续前进，你先带兵一部乘汽车速即进入包市，并将办理情况报我。”我奉命后即率一加强连及部分后勤人员先行进入包头市内，以城防司令的身份，命令日军联队长兼特务机关长田中大佐（原为中佐后升大佐），不得有任何破坏行为，并勒令将企图焚毁飞机之日军士兵山田关押禁闭。随即将日军大队长尾原少佐、情报主任儿玉大尉、日军在乡军人中队长中村大尉、日军驻包头领事××（名字失记）等人召来，命令他们严格掌管好日军与在乡军人（日军中有一部分系日军退伍后在乡军人重征入伍的）及日本侨民，不得有任何不法行为。并命令分别集结在几个地方，听候处理，无城防司令部发的通行证，一律不许在大街上行走。同时，将日军特务机关的无线电台先行接管，责令儿玉大尉负责向张家口及大同日军进行联络，通知各处日军向我军投降。就在此时，从包头日军特务机关得悉：①驻张家口市的伪蒙疆日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已奉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之命，命包头及大同等地日军直接向第十二战区受降官傅作义司令长官投降。②、驻归绥及集宁日军已于日前乘火车撤至大同集中候令投降。③、归绥市内的秩序暂由伪蒙军维持。④、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已命令驻归绥的伪蒙军参谋长包贵廷率归绥市及其它等处的伪蒙军直接向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受降官投降，听候处理。⑤、伪蒙军有一个师（第九师）起义投降了八路军。

此时，我一面将对日军处理及所获情况呈报傅作义长官，一面令部队严格遵守纪律，作到秋毫无犯。夜宿包头城外，翌日上午整队进城，当晚第十二战区长官部进驻麻池村内。傅作义长官

接到我团上述报告后，即命令暂十一师和新三十一师，务于本月十九日前，排除一切障碍（估计在察素齐或毕克齐可能遭到八路军的阻击），进入归绥市内，接受日伪军投降。又令在萨、托二县之间进行游击活动的游击支队司令郭长清即率所部向归绥急进，抢先进入归绥市内，等候孙兰峰受降官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又急电孙兰峰迅速进入归绥市接受伪蒙军投降。

（三）

我团于八月十七日中午十二时进入包头市。当我全团官兵身着草绿新装，脚穿麻织草鞋，精神饱满地打着战鼓、吹着军号、唱着胜利凯歌、迈着整齐步伐列队进入城内时，市民热泪盈眶，夹道欢迎。特别是那些离别八年的包头官兵的家属及亲友一见亲人，高兴得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有的甚至跟在部队的侧面直到入城式结束。部队进城后，立即将城防接管。除对重要关卡派兵驻守外，并将日军所看管的武器、弹药、粮秣、医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仓库等全部查封，派兵看守，规定没有长官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随意动用。责令日军管理人员将各库存物品，分别造具清册，听候有关部门派人接管。

一切城防布置妥善后，傅作义长官及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即于次日（十八日）进驻包头市城外电灯公司院内。傅长官进驻包头城后，为了尽快恢复包头市的正常秩序，特令马秉仁为包头市警备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建立市镇机构，开展市内工作。其时马秉仁正忙于组织警备司令部及建立市内各行政机构，对日伪物资仓库仍暂由城防部队派兵看管。直到我团调离包头开往归绥时，才正式接管。

我团进驻包头之后，新三十一师即沿包绥线向归绥兼程前进，行至毕克齐火车站时，不意与艰苦抗战的大青山八路军发生冲突，铁路被破坏。安春山师长即令前卫团第九十三团（团长赵晓峰）投入战斗。从而战端轻开，萧墙祸起，令人痛心。傅作义长官闻讯，深恐归绥市被八路军先行占领，严令安春山师长务于当日排除阻力，占领毕克齐，修复铁路，继续前进。这时，暂十一师也由副师长刘景新率领该师第二团（团长郁傅义）先从东胜出发，连夜由高龙渡口渡过黄河向归绥急进。郭长清游击支队也奉命由托县地区向归绥市快速前进，企能抢先进入归绥城内夺得首功。与此同时，第十二战区另一游击支队司令兼归绥县县长乔汉魁，也奉命向归绥急进，以期首先占领归绥市。

八月十八日上午，郭长清部到达归绥城南茶房附近时，游击支队司令兼归绥县县长乔汉魁也同伪蒙军骑兵旅长奇子祥所派的连长奇玉林及副官张子芳等赶至旧城南郊附近村内。郭、乔两部得知八路军已先进入市内，并占领旧城小什字街及小教场等处制高点，同伪蒙军正在战斗。即由奇子祥的副官同伪蒙军师长门树槐联系后，由郭长清率领该部由旧城南门突入向八路军展开争夺战。当郭部在伪蒙军的配合下同八路军战斗最激烈时，暂十一师刘景新副师长率领的先头部队第二团也挺进至归绥市郊外当即参加战斗。八路军审时度势，主动撤退。此时，新三十一师安春山部也因毕克齐八路军主动撤走而进至归绥西郊，郭长清部及暂十一师、新三十一师先后进入归绥市内，先遣指挥部孙兰峰受降官也随安春山师进入归绥市内，代表傅作义司令长官接受伪蒙军投降。傅作义令暂十一师驻防归绥担任城防；令新三十一师向陶林、兴和推进，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令郭长清部向清水河县推进，配合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二十日，一〇一师范新

三十一师之后进入归绥市附近，孙兰峰受降官指挥该师继续向集宁、大同挺进。

八月二十二日，傅作义司令长官由包头乘火车到达归绥，第十二战区长官部驻于麻花板营房内，并将伪蒙军各部队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第十路军。为了安定伪蒙军的情绪，仍任命李守信为总司令、包贵廷为参谋长代行司令职务，任命门树槐仍为师长。将伪蒙军炮兵部队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直属野炮营，令暂十七师第三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张令功为该营中校营长，任命伪蒙军兵工厂厂长兼炮兵团团长张启祥为第十二战区炮兵副指挥官（指挥官刘振衡），伪蒙军官学校仍住在该校听候分发安排。还将伪绥西联军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第一集团军，任命王英为集团军总指挥，成立归绥市政务委员会，由李居义任主任委员，张遐民为副主任委员；温永栋为归绥市警备司令兼归绥市市长，韩伯琴为归绥市副市长兼归绥市警察局局长；朱伯行为归绥市稽查处处长。与此同时，绥远省政府也由绥西陕坝迁入原省政府大院内。除在陕坝时原绥远省政府的各厅局长及原绥西河套各县县长未更动外，傅作义主席又新任命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军医处长杜勤书兼任绥远省卫生处处长和省立医院院长、刘建勋为公路处处长、张立范为农林处处长、张遐民为合作管理处处长、常佩三为社会处处长、仇曾武为人事室主任、杨凯南为归绥县县长、张恺然为集宁县县长、卢健飞为丰镇县县长、王觉民为陶林县县长、乔汉魁为凉城县县长、陈绍为清水河县县长、卫力石为武川县县长、于维欧为萨拉齐县县长、李麟兆为托克托县县长、鲁凤昌为和林县县长、卢文肇为兴和县县长、石正中为固阳县县长、全文斗为包头县县长。

(四)

孙兰峰率先遣指挥部人员及一〇一师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集宁，督饬集宁警备司令孟昭第及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县长张恺然接收集宁，安定地方。傅作义长官在孙兰峰未到达集宁之前，通过包头日军特务机关的电台，命令张家口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中将饬令大同日军直接向孙兰峰受降官投降（大同日军归张家口日军指挥）。大同日军指挥官接到命令后，即派日军两个中队（相当于我军两个连的兵力）乘火车到集宁车站迎接孙兰峰受降官。孙等一行乘火车行抵红沙坝时，因铁路被破坏，火车出轨不能前进，只好以机车（火车头）将孙兰峰等送到大同。孙到大同后，日军指挥官设宴招待孙等一行。席间日军为表示亲切，特找来女招待数人为孙等敬酒，孙大为不满地说：“这成什么体统，为什么不让你们日本女人来敬酒呢？”吓得日本人不敢申辩，只是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请宽恕！”是日，孙等接收大员住在大同饭店，特派员办事处设在丽生魁商号。郭景云率领的一〇一师当日也赶到大同，驻大同车站附近，协助孙兰峰进行接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孙兰峰等正在研究如何接受大同日军投降及接收日伪物资等问题时，大同日军指挥官突然进来，拿着山西太原日军指挥官给他的命令：“着大同日军直接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全权代表雁北地区领导小组楚溪春投降，并将日伪一切物资交由楚等接收。”正谈论中，阎锡山的参谋长楚溪春乘飞机到达，直奔孙兰峰的住所。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说：“大同是山西省的地方，第二战区的管辖地区，你们凭什么到

这里来接收呢？”孙兰峰说：“大同是第十二战区的管辖地区，属于热、察、绥三省受降范围，当应由十二战区接收。”楚溪春凭着上述理由，又有阎锡山的命令，日本人的支持，以及因楚本人在晋绥军的职位和资望都高于孙兰峰，是孙的多年上级，态度非常强硬，非要接收不可。孙兰峰则以奉傅作义命令，这是十二战区应接收的地区，且有一〇一师军事力量，分毫不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竟各自拍案反目，不欢而散。孙兰峰将此情况电请傅求得解决办法，张家口日本指挥官根本博也同时电呈傅作义请求裁决。傅作义接到孙及日特务机关转来根本博的电报，经一再考虑，认为阎锡山是多年的老上级，楚溪春是多年的老朋友，大同是山西的辖区，日军又倾向于山西一方。从战区划分看，大同虽属第十二战区的范围，属于热、察、绥的受降地区，强行接收当无问题，但这样做势必反目（指阎傅），影响旧属关系，而且勉强接收，如日军不向我军投降，必将激化，后果可虑。经过反复研究，还是礼让为宜。最后决定分电孙、日双方，大同交由第二战区接收，纠纷始告平息。

大同受降问题解决后，孙兰峰随即带少数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北平，随同当时前往东北，与苏联红军马利诺夫斯基洽商东北三省接收事宜的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东北三省受降官熊式辉及接收特派专员蒋经国等到哈尔滨，与苏军接洽对热河日军受降事宜。

（五）

在张家口的伪蒙疆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因奉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之命，向热、察、绥三省受降官傅作义司令长官投

降，即通过包头日特务机关的电台，直接电请向傅作义投降。并请求速派大军来张，以便进行投降交接。傅接电后即令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率该部由哈拉寨地区星夜渡过黄河沿集宁、兴和、柴沟堡之线，向张家口挺进。代表傅作义受降官接受张家口日伪军投降。一路行军顺利，未遭任何阻击，夜晚进抵柴沟堡宿营后，夜间子时许被八路军包围袭击，里应外合，一举袭入堡内，战斗异常激烈。马占山突围不出，不得已从城墙用绳子吊下来，才行脱走，率残兵败将撤回集宁一带。马军撤退后傅部再无部队可以派往，但张家口日军因被八路军围攻甚急，又多次电请派军接收。紧急时甚至请求傅长官那怕用飞机派一两位大员前来，日军即可遵命投降，听从指挥。而傅长官连一两位接收大员也派不出去。其时，蒋介石虽任命冯钦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已到包头数日，但因无部队护送前往，也无法到职。最后因苏联红军进抵张北狼窝沟坝上，日军因系无条件投降，不能进行抵抗。日军迫不得已，根本博始同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以及其他日军和伪蒙疆军政人员一起乘火车到北平，向国民党北平受降官、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投降。并在行前特给傅作义长官来电（由包头日军特务机关电台转来），陈述其情，表示遗憾。张家口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接收，成立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张家口市即归人民所有。

在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向张家口进军的同时，傅作义长官令暂十七师副师长宋海潮率该师第一团张进修团前往凉城县协助地方政权抢夺该县城时，在凉城附近被八路军迎头痛击。战斗异常激烈，官兵伤亡甚重。由于宋海潮指挥失当，全团几被全歼。傅作义长官将宋海潮撤职（遗缺由郑海楼接充）。这是第十二战区继马占山军柴沟堡之失后，又一次出不义之师的败北。

(六)

侵包日军及日在乡军人和日本侨民，自经我军接管后，安分守己，未发生任何不轨行为，放下武器后即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遣返回国。经过将近一月的时间，日军将各个仓库中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以及其它一些日伪物资分别造具清册，经双方负责人签名盖章交接毕，并由我方将受降情况呈报国民党中央备查。

接收工作全部清结后，即在包头市聚德成饭庄内举行受降仪式，由暂十七师师长朱大纯代表傅作义受降官接受日军投降。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代表日军向我受降官进献军刀、敬礼投降。仪式结束后，由我方设宴款待日方投降人员，以示宽大。次日，日军设宴向我军致谢。最后由我团派兵两连，由第二营副营长率领，将日军及日在乡军人与日侨民眷属等共计二千七百余，用军用专车护送至大同，交由大同日军接管，而后和大同日军一起经天津遣返回国。

在我团遣送日军到大同之前，日军田中大佐请求火车路经归绥时，允许他下车到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向傅作义受降官认罪致谢，以示敬意。经请示傅作义长官同意接见。接见时由傅的日文秘书苑乃安担任翻译。

(七)

日军遣返后，由重庆来了两位朝鲜客人，负责人李某（名字失记）。他们代表韩国（南朝鲜）政府前来接管朝鲜侨民回国。

为了工作开展得顺利，特向我城防司令部作了拜会，要求帮助搞清侨民人数，并允许遣返回国。随后在饭店租用礼堂举行中朝联欢，庆祝抗战胜利，设宴招待各方人士。联欢会由南朝鲜的那位李某主持，在致欢迎词时，大讲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多年统治亡国之痛苦，感谢中国及同盟国家帮助他们复国之恩德。联欢会后第三日即携朝鲜侨民男女约一百二十余人，一起由归绥乘火车经大同转太原到天津乘船返国，对我军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

我团在担任城防期间，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官兵非常认真负责。一天傍晚，有三位身着异服人士（其中有一位外国人）进城，卫兵问他们是从那里来的，有无护照？三人中有一个人出言不逊：“你管我们从那里来的？没有护照就不能进城吗？”态度非常恶劣。这时值班排长在屋内听见外边争吵，即出来过问。这位出言不逊的人，不容分说上去打了排长两个耳光。并说：“你们连我们别动队的人都不认识吗？”这位排长未与之争论，用电话报请处理。我听后非常生气，刚刚送走欺压我国人民八年的日本鬼子，又来了什么别动队的外国人污辱我军官兵，岂有此理。着将他们押送城防司令部处理。经讯问才知道一位是别动队的工作人员，一位是美国教员，一位是翻译人员。我严肃地将他们批评了一顿，最后他们承认打人不对，说话态度不好。认错后，把他们放了回去。我以为此事就算完啦，未想到三人回去向军统局报告说我团官兵打了美国人，骂了他们的工作人员，要求给我处分。军统局为此还特派负责人大特务头子唐纵来包头作了一次调查，要求将我撤职。傅作义长官明了真实情况后，一笑了之。

(八)

我团在奉命开往归绥的前几天，傅作义长官发布任王雷震为包头市市长兼包头市城防司令、介仰推为包头市警察局长、李秉智为高等法院分院院长、赵冠一为电灯公司经理、岳占元为包头银行行长。部队在出发的前一天，将看管的各个日伪仓库及其它物资分别交由包头市政务委员会及警备司令部接管，并将城防有关事项及担任城防时，由我负责将伪包头警备队改编的包头市保安大队，交由城防司令部指挥，此大队暂时担任城防，维持地方秩序。不久傅作义长官又派补训一〇一师李思温部担任包头市的城防。

我团部队奉命看管的日伪物资仓库，交由包头市警备司令部及政务委员会接管后，一些不法分子，即以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贪污盗窃手段，将一些重要物资随意盗走，然后重新加封。后来傅作义长官察知此情，派员查明属实后，将警备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秉仁撤职关押，参谋长唐希舜撤职，副官处处长袁荫浓以及王华亭、赵亚民和王某某（大汉奸蒋辉若的副官）四人执行枪决，妄图以此收揽民心，而实际上这几个人却是为发“劫收”财的达官显贵做了替罪羊。

第十二战区的受降，就是执行了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抗日军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反动命令。当时绥远全省除个别地方外，全部被十二战区国民党军抢夺占领。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在大青山、蛮汉山及绥南等游击根据地的八路军，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艰苦战斗八年，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四个多师团，伪蒙军十多个师，伪绥西联军三个师，使日寇未能侵占绥西

河套地区及西犯宁夏，保卫了大西北的功绩，却全部为国民党所篡夺。

(一九八五年三月)

国民党暂三军赴援东北前后

行定远

一九四六年冬，傅作义部侵占张家口以后，统治了察、绥两省的地盘，傅本人被蒋政府委为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四七年上半年，傅一方面休整，扩充武装力量，扩建地方政权，继续向察省各解放区进犯，另一方面妄想向外省扩展。如四七年五、六月间令他的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饗率部赴河北省保定一带支援孙连仲部；七月间傅以察干团教育长李世杰为首组成暑期训练班，集训部队中的各级军官。本人曾在该团二中队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第一期训练，主要课目是野外战斗的军事演习。结业后，回到宣化暂三军工作岗位。该军奉令备战，不日就到涿鹿南山进行所谓清剿解放军活动。在此，曾与马辉将军部有接触。该军在涿鹿南山地区活动了一段，于八月底、九月初奉令返回宣化，接受另一项新任务。

暂三军返回宣化之后，傅作义命令安春山率该军所属新编三十一师和暂编第十师两个步兵师，同时让刘春方的骑四师也临时归安指挥，赴河北支援孙连仲部。安春山奉命之后，将该军所属暂编第十一师留张家口附近，归绥署直接指挥，将外出部队进行了调整。原来的两个步兵师改组为三个步兵师，其人员组成如下：

军长安春山，副军长王法之，军参谋长樊折桂，副参谋长宋清澹；新三十一师师长王建业，副师长韩天春，师参谋长徐世杰，九十一团团长沙英年，九十二团团长沙树桥，九十三团团长沙

步云；暂十师师长张惠源，副师长王崇仁，师参谋长任双齐，一团团长刘一平，二团团长令狐狸，三团团长武耀国。临时组成的师，师长是韩天春（没副师长）。这个临时师由新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和暂十师第一团组成。当时部队的代号，军部称山人部，三十一师称老诚部，十师称恩泽部，临时师称守温部，骑四师失记（骑四师成员只知师长是刘春方，其它不详）。部队编组完毕，军用物资略作补充，兵站部门给配了一个兵站支部，下设几个兵站随军补给。部队于九月份向河北开拔。

军部由宣化乘火车抵达北平，驻在丰台车站。部队由宣化行动时，我们只知道赴河北，但到丰台后，部队集合完毕，又说赴东北支援四平。于是，十月左右军部在丰台车站乘火车向东北前进。经天津、唐山抵达山海关，向沈阳推进。这时，九十二军奉令停止前进，只有暂三军前往。当时关外沿途广大农村都已解放，国民党部队仅占领几个县城。该军经绥中、兴城、锦西等县到达锦州，沿途仅在锦西与解放军有过一次小的接触。该部在锦州休息一两天，又奉命向四平方向前进。

部队经沈阳市北上到达铁岭，在铁岭稍事休息又徒步到达老开源。待先头部队到达昌图县境内，忽然又奉令返回铁岭，改乘火车向新民转进。部队到达新民后，奉命向蒙古地前进，军部到达新立屯。向新立屯前进的那天，正值下了大雪，天寒路滑，而部队又没皮衣和皮鞋御寒，行走实在困难，因而不能再向北面前进，雪停止后又返回新民。这时，该军出关已有一个多月，实际是战备行军，并没与解放军发生战斗，而是疲于奔命，部队已疲劳不堪。

暂三军返回新民后，陈诚让该军归廖耀湘指挥。廖又令该军北进。有一天中午十二时左右，部队正在行军途中，忽然空中来了一架飞机，安春山用话报机与飞机联系，得知是傅作义乘机来

到上空，让安不要深入解放区，免遭解放军歼灭。对外安当时只说译电员将电报译错了，令部队立即返回新民。事后听说安还受到廖耀湘的责难。部队返回新民后，安曾去沈阳一次，经过楚溪春的活动见到陈诚。安向陈申述，部队出关时，过冬服装尚未发齐，现北宁路已全线通车，任务业已完成，要求进关回察绥防地。陈诚当即允许给部队补发冬季服装。安又请求补发一些武器，陈也予以答应。安返新民后，令我和军需处科长赵健民领武器、服装，领到五百支铁把冲锋枪和棉皮大衣、棉皮鞋等物资。

在此期间，东北解放军（据说是邓华的第七纵队）解放了彰武县城，陈、廖令安率军前往，并拨了一个四十三师（师长陈林达）归安指挥。安率部向彰武推进时，七纵队自动退出彰武县城。因而暂三军没经过战斗就顺利地进入彰武县城，安令他的三十一师和韩天春师向县西北方向推进，又令骑四师截击，他的第十师和陈林达的四十三师在彰武集结待命。当时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已基本撤走，尚有辎重车辆和少数掩护部队撤离的还不太远。三十一师的九十一团和刘一平团追上了这些部队。安听到发生战斗，令三十一师和韩天春师全部向前推进，他也到了前方。经过战斗，解放军迅速脱离战场，只有一部分辎重车辆未能撤走，车辆上有一部分缴获的国民党枪支。那次战斗因骑四师截击，因而获得的武器较多，共计三百多支枪。当时我负责部队武器弹药的供应，缴获的武器也是我负责派人送往沈阳的。

陈诚到东北不久，就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得已求援于傅。安到东北后也是提心吊胆，好容易侥幸在这次战斗中得了这点枪支，陈就让当时沈阳报纸登出头条消息，竟然说彰武战役缴获的武器能装备两个师。这当然是给陈鼓吹，但也给傅、安添了不光采的色彩，欺哄了许多不明真象的人。据安的随从副官晋积

善谈，为此陈诚曾在沈阳宴请过安春山一次，并让安坐了首席，由其他将领作陪。安春山以此为荣，经常吹嘘他打通北宁铁路的所谓战绩。从此，安春山就与陈诚有了关系。

彰武战斗之后，经过傅、陈的电报及派员协商，安部返回新民，陈准予安部乘火车返回关内。

返回途中，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唐山时，安当时的秘书刘致远告诉我们说：刚接到中央的电报，山人（安代号）被委为天津警备司令，咱们到天津不走啦。但火车到天津后没停，一直到了北平、天津间的廊坊车站才停止，我们就问刘为什么？刘答：山人不敢任职，已去电请示傅看应如何办。结果傅给蒋中央回电，说安是军人，现下打仗需要他，不适宜任天津警备司令而作罢。这样蒋、陈分化傅的主力而未得逞。从此安部就驻防廊坊周围各村庄。傅作义乘一列专车到廊坊慰问安部，接着傅统治的察绥两省也派出所谓军政民联合慰问团到廊坊慰问暂三军。察哈尔以曾厚载为首，绥远以李居义为首，他们先后到达廊坊，深入部队进行慰问活动，还带了大量的慰问品。时间不久，北平、天津等地的报纸、杂志记者三、四十人也到安部进行采访报导。如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北平的世界日报等。当时有一个杂志的主编名叫笑天（杂志名失记），安为了拉拢这个人曾花费了不少力气，但最后没达到目的，为此曾对当时负责招待的刘子敬多次训斥。然而有些报纸杂志还是对安大肆吹捧，如天津的益世报、北平的北平日报和内幕新闻等。

安春山虽然没留在东北，也未就天津警备司令，但傅还是得到情报，对安有了戒心。傅曾当面冷潮热讽地对安说过这样两句话：“尔仁（安的字）到了那里也有办法，尔仁什么时候也有办法。”安听后既不满又恐惧，他感到傅对他不那么信任了。因而

曾有这样的怨言：“跟了他几十年，现在成了局外人”。

安自从去了东北之后，确实也极力与陈拉关系。如他曾向陈提过建议，有些问题也直接向陈请示解决。陈也另眼看待安，给些小恩小惠。一次，安请陈给些武器装备，陈竟然批准由北平五补给区拨给。这事被傅部知道，我到补给区请领，补给区说总部不让你军直接领，已拨给总部，你们可到总部去领，结果总部四处只给了该军一小部分。安对此也发过牢骚，但也没有其他办法，不过从此安对傅也存戒备之心。

一九四八年，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暂三军（后改为一零四军）活动在平、津、保及冀东、察哈尔等地区。首先，傅将该军建制进行了调整，把原属三十一师调归暂四军建制，将原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编为暂二十七师，归暂三军建制，师长是慕新亚。

国民党绥远地方派系琐记

杨令德

(一)

从祁志厚说起。祁志厚，字定远，萨拉齐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当归绥中学校长。那是一九二一年，当时绥远只有这么一个中学，是从清末的书院延续下来的。

我于一九一九年在托县高小毕业，次年又在原校住了一年，一九二一年才第一次离开家乡，考入归绥中学，这一年正是祁志厚任校长。我考入的是第十一班，当时这个学校每年新设一班，十一班是祁志厚亲手开办的。在此以前，也不考试，祁志厚新开的十一班还要举行考试，不过绝大多数报名的都可以录取。这是个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学校，学生可以免征两顷地（二百亩）的田赋。我家没有地，未享受此待遇。一九二一年归绥中学的班次是从第八班到十一班，第二年又招了第十二班。在祁志厚当校长期间，前后不过五班，这五个班次都是祁志厚的学生，总数也不过二三百人（那时有的班毕业时人数就很少了）。

十一班的托县学生有十多人，除了我们托县高小的同学，还有河口高小和从乡村来的，我们不认识。托县高小的同学有霍世休、刘桂等，河口高小的有李裕智等。吉雅泰也是十一班的学生，他是归绥三两村的人。李裕智、吉雅泰是蒙族，我们三人同住过一屋（当时学生的寝室，一炕顶多住三人），相处得感情很好。因为十一班是祁志厚亲手创办的，他很注意这个班，当

时有“精华班”之称。我那时比较用功，高小时读了许多旧小说，来到绥远买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一类清末小说，如获珍宝，通夜在煤油灯下读。其实这些东西当时在京沪大地方早就过时了，绥远闭塞，才刚传进来。祁志厚夜里查房（熄灯以后查看学生睡了没有），往往在窗外喊叫我的名字让我睡。还有我和同学组织个什么读书会或者在教室与教师拌嘴，凡此种种大概是我给祁志厚留下了印象。祁志厚一九二八年回到绥远就用我当了《绥远民国日报》前身《绥远日报》的总编辑。一年多后我随祁志厚被焦守显、于存灏另一派人赶下台。祁志厚当归绥中学校长时有不少人是他的学生，其中焦守显、于存灏（也是祁的学生）在祁志厚未回国之前，已经是绥远社会上大露头角，有了一定地位的人。焦、于都在北京上过学。焦守显入国民党比较早。一九二七年绥远归山西统辖时期，商震当主席，绥远就有过国民党的省党部，焦守显是主要成员。那时就有陈国英、纪守光，国民党在绥远的清党就是他们干的，可以说这些人是以反共起家的。这一年后半年奉军来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人都跑了。一九二八年北伐以后，祁志厚回来当了绥远国民党的首领，焦守显又是主要成员，于存灏也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工作。焦守显这时已是绥远的实力派，祁志厚回来，认为焦、于都是他的学生，都是听他的话的。焦、于最初自然也是捧他的，于是祁志厚便以首领自居，认为有焦、于实力派支持他，再加上他自己安插的人，他的地位是稳稳当当的了。事实当然不会如此，反动派争权夺利，搞分裂也是必然的。

祁志厚回来之后，形成了所谓祁派（最初包括焦、于在内），这是个封建集团，也没有什么组织。所谓祁派的人无非是祁志厚的同学、同乡和学生之类，被他安插了工作的人。如曹诚斋、张国宝、陈志仁、刘桂、霍世贤、刘士琦、阎秉乾和我等

等，当然不只这几个人，如后来回绥远当过教育厅长的阎伟，萨拉齐的白映星等。晋诚斋是属于老一辈的，是祁志厚的同学，张国宝、陈志仁、白映星是祁志厚的同乡，阎秉乾、阎伟是祁志厚的同学或朋友，其余都是祁的学生。这些人除刘桂、刘士琦在国民党归绥市党部，我在报馆以外，大多数当时都被祁安插于国民党绥远省党部。

祁志厚唯我独尊，要一声喝到底，焦、于当然不听他这一套。刘桂、刘士琦特别是刘桂专横跋扈，也没有把焦、于放在眼里。我为祁志厚掌握了报纸（而且是当时仅有的一张报纸）关系更大。焦（于）派的东西，特别是焦、于手下的人的东西，刊登须有选择，这样就更得罪了他们。总之，祁志厚的宝座不稳了，焦守显从他那里分裂出去，另外有了焦（于）派的旗号，于是公开形成了祁、焦两派的斗争。

焦（于）派公开印发传单攻击祁志厚，当然列举了祁志厚的许多罪状，其中首恶就是“二刘——《火炕》”，“二刘”指刘桂、刘士琦，“《火炕》”是我办的一个文艺刊物，这是指我而言。很显然，焦（于）派首先要把国民党归绥市党部和报纸夺过去。

焦（于）派手下的人早就写匿名信到南京陈果夫那里控告我是共产党，陈果夫叫焦守显查过，焦守显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老套套搪塞过去，总算是“庇护”了我。但我的《绥远党报》总编辑终究是当不成了，因为祁派被焦（于）派打垮了。

祁派与焦（于）派之争，总有个政治上的原因。焦守显那时走得是陈果夫的门子，祁志厚是属于汪精卫系统的，绥远的事还是和南京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连着的。

(二)

再说焦守显。焦守显字子明，托克托县一间房村人。一九一八年我在托县高小上学，下半年焦守显从乡村进城插班，成了我的同班同学。焦守显比我大四五岁，那时已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了。他进城之初还蓄着长长的发辫，穿的衣服在我们这个小城镇看去，也是土里土气的。他业已在私塾念了不少旧书（四书五经之类），但却没有学过算术。我们当时眼里觉得这个村老大很老实，劝他剪了发辫，帮他补习算术。那时我是班长，算术还学得可以，就经常帮他。学校根本没有住校生，只有一个工友姓王，打铃兼看门，是吃住在学校的，焦守显来了就和这个工友一同吃住（这个工友是一个老师的学生，是个知识青年）。我们这班的同学有吴桐、霍世休、刘桂等，和焦守显还是居处相安的。吴桐是回民，他的祖父是有名的拳术家，辛亥革命那年阎锡山来托县把这个人杀了。吴桐叔祖父吴耀（又名吴三汉）也是拳术家，所以吴桐从小就学了拳术。我们几个人这时就拜吴耀为师学拳术，经常到吴家学拳术的有焦守显、霍世休、刘桂和我，这样吴桐和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特别是焦守显，他同吴桐年纪相仿，经常到吴家吃住，和吴桐就显得更亲密。我们几个人既是吴耀的徒弟（拜师要递帖子送礼），已经就很近乎了，后来又想起要“结拜”来，就是几个人换帖结拜为弟兄，原来是打算五个人在一起结拜的，因为刘桂和我虽是远亲，却住在一条巷子里，家里人常来往，我叫刘桂的祖父为哥，这样刘桂比我小两辈，成了我的孙子辈了。当然我们从小同学，又加是远亲，刘桂也没有把我当祖辈看待。这时他的一个叔祖父听见我们要结拜，

大骂不止，说刘桂和我是祖孙关系不能结拜。我们五人之中，霍世休是我的表弟，从小在一起长大，也无所谓结拜不结拜的。后来就决定焦守显、吴桐、霍世休、刘桂四人结拜，焦守显和我单独结拜。这样焦守显就成了我一生中唯一的用这种形式的结拜兄弟。后来这两起结拜弟兄，只是吴桐和焦守显还始终不错，别人和焦守显的关系都没有搞好。焦守显这时已娶妻生子，他父亲是个赌棍，经常在庙会演戏场合中“坐宝”（掏宝、押宝是一种大赌的形式，其中有人是“坐宝”的，据说这个角色一般人还干不了），有一次托县附近一个村子有庙会演戏，焦守显就领我去看他父亲一次，我亲眼见过这种场面。他父亲一辈子始终是个游手好闲的赌棍。

一九一九年我们从托县高小毕业了。一九二〇年，年龄比较大的吴桐、焦守显住了归绥中学第十班，我们年龄小的是一九二一年才上了中学的，恰好赶上祁志厚初当校长办的十一班。

焦守显一到归绥中学，就大大地变了，绸袍缎褂穿上了，也成了平康里的客人了（平康里是归绥妓女所在）。在我住了中学，他办伙食还贪污过钱，被同学揭发。焦守显的衣着、行为我都看不入眼，当时就对他有些反感。在中学期间，因为不是同班，而我那时不嫖不赌，所以和焦守显就不怎样接触了。

一九二二年祁志厚赴美国留学，归绥中学校长由阎肃继任（阎肃是阎伟之兄），学监为成章（字焕文，祁当校长时的旧人，成章那时已很老了）。这年暑假前，学生宣传五七国耻反对日本闹起了风潮，我们把阎肃、成焕文的铺盖扔出校门，还由我到《西北实业报》刊登了誓死不承认阎为校长、成为学监的启事。我在托县高小就以“园叟”的笔名给《西北实业报》投稿，《西北实业报》的主笔“椒山后人”（姓杨）还给我写过信。因此这

次起草启事稿和到报馆刊登，同学们开会决定由我去办。下半年赵允义当了校长，潘秀仁当了学监，从此潘、赵就把学校抓到手了。潘、赵当权以后我们托县在十一、十二班的十个同学都被拒绝入学（等于开除），于是我们这些人就分开了。后来霍世休和我到张家口住了中学，焦守显不知是否被开除的（于存灏和焦守显是同班，是被开除的）反正从此就到北京上大学去了。

我在张家口住中学没有毕业就再未上学，更谈不上在北京住大学了。焦守显、于存灏这些人在北京名为上学，实际上他们和绥远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勾搭，早已为他们将来的出路作了打算。这时，他们因为绥远出产大烟土就和官厅打麻烦，在北京告状，实际上是他们闹到钱就行。他们当时在北京上学，地方上有补助，再经他们一活动，每人一年花几百元现洋是不成问题的，那焦守显的手面比当中学生就大得多了。这一时期他还为一个土默特旗的镇国公打过官司（那时绥远有个镇国公府，焦守显替镇国公打官司，是借土地问题诈财的），焦守显在这上面当然得到了好处。

焦守显是在北京入了国民党的。他想去苏联留学，找孟纯介绍，被拒绝了。孟纯当时在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经管赴苏联留学生的保送。当时绥远在北京的共产党员有些就是由他给办保送手续的。焦守显不是共产党员，可能得到风闻，所以找孟纯，孟纯假称不知有赴苏联留学之事。焦守显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前后加入国民党的，一九二五年他和路友于来过绥远，（路友于后来同李大钊同志一起牺牲，路的爱人隋焕东后来嫁了李冠洋）。一九二五年焦守显在绥远对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就有所活动了。后来焦守显和李冠洋搞到一起（于存灏和李冠洋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是大同盟（这是国民党的一派，头头是丁维汾）。大同盟的丁维汾是一个老国民党员，孙中山活着时候他就是专管国民党的组

织工作的。孙中山北上那年住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丁维汾在北京翠花胡同有办事机构，寄发一切宣传品都是从翠花胡同发的。我在张家口时见过他。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要篡夺国民党，但最初听说南京还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后来蒋介石把丁维汾排挤下去了，用了陈果夫、陈立夫弟兄，于是又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丁维汾失势以后，焦守显就和陈果夫拉上关系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绥远有了国民党的省党部，焦守显、陈国英、纪守光、还有个山东人冷刚锋都是主要成员。这些人都是陈果夫安排的。这一年上半年我刚从包头《西北民报》当了记者、编辑之后，在托县高小当小学教员，焦守显的托县代理人李显（李亦托县人，归绥中学八班的学生，在北京住过大学），在托县主持国民党的清党，因为我在包头《西北民报》工作过，就以共产党嫌疑被开除党籍，这当然是经过焦守显等国民党省党部批准的。一九二八年祁志厚回来为我恢复了党籍，用我当了《绥远民国日报》前身《绥远党报》的总编辑（上面说过）。祁、焦（于）两派斗争时，焦（于）派手下的人还写匿名信给陈果夫攻击过我。

一九二九年焦（于）派在绥远打垮祁志厚之后，祁离开了绥远，接着焦守显也离开了绥远到了天津，从此祁、焦二人也再未在绥远捞到一官半职。焦守显在天津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头头，他本来是投靠陈果夫后取得天津这个重要职位，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扩大会议期间，因为天津市长崔廷献是阎锡山的人，把他拉到阎锡山方面，他也和祁志厚同样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扩大会议。从此焦守显、于存颢和阎锡山挂上勾。这一年焦守显常在平津活动，只是在扩大会议失败以后，这年冬天他才来到太原，这时我和他见了面，记得一同吃过一回馆子，还有刘桂，

彼此显得有些不自在。此后阎锡山到了大连，焦守显也到了大连，不久又随阎锡山回来。一九三一年以后，焦守显也经常回绥远来，阎锡山给他们办了个“西北实业促进社”，这时于存灏已当上了绥远地方法院院长，焦（于）派实际的有力人物成了于存灏了。后来祁志厚、焦守显都和傅作义没有什么深切关系，而于存灏则既和阎锡山有了直接关系，又紧紧巴结上傅作义，因此于存灏就逐渐成了绥远少数几个所谓大绅士之一，成了实力派。祁、焦两派的首领祁志厚和焦守显反而落在后面。

一九三一年以后，焦守显回来绥远几次，有时也住一个时期，他在新城还买下房院，安了家。焦守显早婚，娶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乡村女子，他住了中学就要离婚，他母亲坚决反对。后来焦守显把老婆留在家里，他叫“大姐”，说是离婚了，但以后再也没有人嫁他。这时焦（于）派有阎锡山撑腰，办了“绥远实业社”，招兵买马，成为与潘赵派对壘的形势。绥东派（以张钦为首）和祁派残余（祁派此时在绥远已没有多大力量，祁志厚回来也有少数几个人同他一起活动，可以说是成了残余了）也同焦（于）派联合起来，对付潘赵派，依然是不断地演些丑剧。一九三三年潘秀仁已继张钦当了教育厅长，那时张钦是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是地方法院院长，祁志厚、张钦、焦守显，于存灏等在教育界的势力逐渐被潘赵派取代，这些人就想把教育厅长职位夺下来。当时焦守显在绥远亲自主持发动打了教育厅（焦守显多年惯于用这一手，从前夺祁志厚的报纸最后就是大打出手，至于在国民党归绥市党部更不知打过几次了，甚至在中学校也大打特打）。那时潘秀仁续弦新婚不久，焦（于）派的人马把教育厅砸了个稀烂，把潘秀仁的洞房也打了个一塌糊涂，把帐子撕成碎条，潘秀仁越墙而去。据说当时各省教育厅长都是任命本地人当的，从祁志厚、

张钦到潘秀仁都是绥远本地人，一下子把潘秀仁这个厅长给打下去了，中间傅作义兼了几天教育厅长，后来祁派的阎伟回来当了厅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可以说祁派这一回占了便宜了。教育厅被砸烂，不但在绥远是重要新闻，在平津各大报也会占一定位置。我立即为天津《大公报》写了通讯，并摄了照片。《大公报》的胡政之（《大公报》社长）蒋桂战争期间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有关蒋桂双方的记载，蒋介石看了满意，大概总是胡政之从推许蒋介石为正统方面着了笔，可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看了也满意，并且李、白当时还叫部下学习了胡政之的这篇东西。一石双鸟，不知胡政之要的是什么手法。我从一九三一年结识了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给我灌输了一套自己不坐官捧朋友坐官的所谓“水涨船高”的哲学，对于《大公报》的一些做法，亦步亦趋，揣摩模仿，不遗余力。这一回我把潘秀仁被砸的现场作了详细的描绘而且摄了几张照片，《大公报》把我写的这篇通讯全文发表而且附上了照片，焦（于）派等人看了当然满意，因为他们的“战绩”我给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附了照片，打碎的破烂实物，更足显示他们的威力。有一次我见了潘秀仁，他也表示满意。他认为我把对方“罪证”拍成照片给登出来了，所以他说我在《大公报》上这篇通讯很好。可见我这时学《大公报》已经学得“很不错”了。

一九三六年由阎锡山出钱，焦守显要到美国去作什么考察（不是留学而是考察，可能是因为有了“绥远实业社”，打了个考察实业的旗号），在他出国之前，我们有所来往，我还是捧朋友坐官“水涨船高”那一套，他那时还没有老婆（他“大姐”不算），以后也一直再没有娶下，和一个绥远有名的暗娼打得火热，表面上大概还避人。有一次他领我到这个暗娼家混了一阵，

这就是说不避我，是和我很近乎了。在他离开绥远以前，免不了大家给他“饯行”，有过不少宴会，一直到车站送行，我都参加了。他先到日本，后到美国。在日本住了一个时期，还给我来过一封信。

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七年底我就到了榆林，一直住了八年，仍当《大公报》记者（《大公报》驻榆林记者）。大约是一九三八年末或一九三九年初，焦守显从美国回到重庆了，有人说他途经香港被日本人搜刮一空，很困难，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汇了一百元钱。其实我那时因为《大公报》待遇比抗战前低，生活是凭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过年过节送些钱接济的。焦守显给我写了回信，从此再未通音信。可以说我和焦守显从一九一八年高小同学起，至此整整二十年的关系就此结束了。后来听说他又走了朱家骅的门子，在兰州当了国民党西北公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一九四二年病死于重庆（中美建交后，焦守显的儿子拿出焦在美国的两千美元存折，由中国银行办理提取手续）。

（三）

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扩大会议期间，祁志厚到了太原，也把我叫到太原。这时我在《绥远通俗日报》当总编辑，因为骂人出了乱子，不但我干不成，连陈志仁的绥远通俗教育讲演所长也给弄丢了（《通俗日报》是讲演所的机关报）。事实上是张钦继祁志厚当了教育厅长要用自己人（陈志仁是祁志厚在时用的），以后这个所长改为民众教育馆长，樊库代替了陈志仁，陈国桢当了《绥远通俗日报》以及以后改为《绥远社会日报》的总编辑，一直到了抗战前夕，阎伟当了厅长，陈志仁和我又把这两个

位置夺回来。祁志厚在太原任阎锡山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处长（政治部主任为李锡九，下设几个处），处下设科，我在出版科，出版科出有一报名为《陆海空军日报》，我在这个报社先当编辑，后当总编辑。这期间祁志厚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改组派是汪精卫的名堂），我们几个所谓祁派的人也都成了改组派（任何手续也没有），张国宝因此于一九二九年在绥远被潘秀仁、赵允义等逮捕过（祁派与焦（于）派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纪守光等在绥远得了势，一般称为潘赵派，这些人是国民党嫡系，蒋介石死党，特务头子）。一九三〇年张国宝、霍世贤、阎秉乾都到过太原（没有工作，祁志厚也没有力量把这些人都在太原安插下来）。这一年阎冯反蒋失败，扩大会议垮台，年底我和刘桂从太原到了北平。我回到绥远，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绥止，一直当新闻记者。刘桂带着家眷在北平赋闲一个时期，一九三一年到南京找了工作。一九三一年后，祁志厚和张国宝、霍世贤在上海、广东活动过，依然是跟着汪（精卫）系跑的。祁志厚想活动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一直到他逃往台湾之前，始终没有弄到手。一九三一年改组派就无形消灭了，后来所谓汪（精卫）系也瓦解了。祁志厚想投靠孙科（孙科是立法院长，祁很久就是立法委员）但也没取得重要地位。祁志厚在南京始终失意，所以长期以来绰号叫“祁悲观”。我当了天津《大公报》驻绥记者后，自己又办了“绥远新闻社”，想在新闻界搞出点名堂来，对于地方的派系斗争已不感兴趣。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陕北榆林八年，与邓宝珊发生了关系，在抗日以前和抗日战争期间，我极力在为傅作义鼓吹，事实上我已投靠了邓宝珊、傅作义，和祁志厚的关系也就不密切了。

(四)

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扩大会议期间，潘赵派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被查封了，潘赵这伙人离开了绥远。陈国英还闹了一回玻璃圪沁和红净桥晋师（这是萨拉齐和归绥的两个村子，陈国英纠集了一些乌合之众，从这两个村出发，攻打绥远）。进攻绥远的恶作剧，被卜兆瑞的警察打溃，陈国英化装只身逃往平津。扩大会议失败以后，一九三〇年底傅作义的军队来了绥远，一九三一年潘赵派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恢复了，《绥远民国日报》也恢复了，陈国英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委员和宣传部长，因此当了《绥远民国日报》社长。

本来陈国英参加国民党早，从一九二七年就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主要成员，那时潘秀仁、赵允义才刚抓了学校，自然也就从学生中培养了一些青年，如后来当了绥远财政厅长的张遼民等，但潘赵还没有拿到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从一九二九年祁、焦（于）两派闹了个两败俱伤，潘赵才介入。这时按说陈国英还是比潘赵资格老，可以在潘赵之上，陈国英也想得如此。但陈是有名的流氓（外号叫陈二痞），不学无术，不为人所重视，潘赵则在归绥县既有了实力（潘赵都是归绥县人，陈是萨拉齐人），抓到了一批学生，当时在地方上的名声比陈国英要好些。又加潘秀仁是个工于心计的阴谋家，玩弄陈国英于股掌之上，这时潘赵就凌驾于陈之上了。后来陈与潘赵火并，枪杀纪守光，打伤潘秀仁，早种因于此。

二十年代初，在北京上学的绥远青年，办了《绥远旅京同学会刊》，对推动绥远新文化运动有不小影响。那些办刊物的人也回绥远演过话剧，当时在绥远也是新鲜事，我也参加了演出，他

们当中好些人如陈志仁、贾武、赵允义等，都是在这次演出中才认识的。潘秀仁是一九二七年认识的，那时已是奉军统治绥远时期，他在北京搞什么兵旱灾赈济活动，当时绥远有一个兵旱灾救济会的组织，牌子挂在旧城恒昌店巷，我在那里遇见了潘秀仁，潘秀仁也在《绥远旅京同学会刊》上发表过支持我而批评“塞北文豪”的文章，见了面就算认识了，但在一九三一年以前一直没有来往过。恒昌店巷那个地方当时叫绥远会馆，也是绥远省议会所在地，以后成了国民党归绥市党部所在地。

一九二七年暑期，我从托县家里来到绥远，陈国英这时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之一，也是主要成员之一。我的表兄霍世贤认识陈，我们就去找他，想请他给我找个工作，陈国英也答应了，从此我才认识了陈国英。那时他们办有一个石印小报，我想到这个报社去工作，有一次正和陈国英谈这件事，陈的口气似乎也认可，但忽然进来个纪守光（山西人，当时已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要成员之一，从此我才认识此人），把陈国英拉了出去，鬼捣了一阵，陈国英回来便绝口不提我到这个石印小报的事了。此后焦守显在托县的代理人李显在托县开除了我的国民党党籍，我就更活动不开了。

（五）

一九三六年我在《西北日报》当副刊编辑，因发表斯诺的《西行漫记》而被南京方面撤职。

我离开《西北日报》之后不久，发生了陈国英、曲步霄枪杀纪守光、打伤潘秀仁的双方火併事件。那时已进入一九三七年初了。出事的日子是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时间已经不早

了，我已回了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纪守光在旧城北门议事厅巷被打死了。我给省会公安局长袁庆曾打电话询问，袁说实有其事。我马上跑到旧城九龙湾同事杨震卿家里（那里距出事地点很近）报告这个消息，当时杨震卿等正在打牌，曲步霄在旁边看，他们都说还不知道。不过我当时就感觉到曲步霄神色有些不对，但也没有注意。

事后知道，议事厅巷有一个小院，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后被迫撤消时转入地下活动的地方，潘赵（陈）派经常在那里聚会，里面平常住着一个新来的姓翟的，也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这一时期，陈国英与潘秀仁等在一起搞不下去了，矛盾激化了。纪守光是山西阳高人，他的本家叔父纪亮（子明）北伐以前就在归绥中学当教员，一九二七年也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主要成员，不过为期很短，不知什么原因，曾经在他们的省党部里被扣押过，此后纪亮就离开绥远，再未见来。这时纪亮已在南京当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纪守光来绥远也很早，可能是因纪亮的关系来的。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都是本地人，纪守光是外路人，可能多年来他在潘赵与陈之间，挑拨离间，借以自重，后来与潘赵接近而与陈国英疏远了。当陈与潘赵短兵相接之际，陈首先便集中怨恨于纪守光。前几天陈国英就派人找过纪守光，准备给他戴“水斗子”（内装粪尿），纪守光出门，后面也常跟着带枪的保镖，大概是不好下手，所以陈国英要大大污辱纪守光一番的打算未能实现。这天晚上陈国英、曲步霄带上打手李应龙、富魁等人，从《西北日报》他们的据点出发来到了议事厅巷这个地方。因为是腊月二十三，人们送皂放爆竹，有些响动也不易听见。议事厅巷口，本来设有一个警察岗哨，陈国英事先打已人与警察局长袁庆曾串通，临时把这个岗哨

也撤了。这样陈、曲的人马便很容易地来到潘赵的据点议事厅巷那个院子。这时潘秀仁、赵允义、纪守光等都在内，双方都有短枪，潘赵看见陈、曲来势不对，陈、曲的人一进院，潘赵的人在屋里就开枪了，于是双方火併开了，乱枪齐发，纪守光当场被枪杀毙命，潘秀仁足部受枪伤，但不甚重。纪守光是被李应龙击毙的，因为李应龙枪打得准，屋里电灯，看得真，纪守光是从外屋往里屋跑时中弹的。纪守光的家属就要求傅作义、王靖国等缉拿凶手，当时外边不知道凶手是谁，过了不久，陈国英、曲步霄就被逮捕，李应龙等人就逃跑了。到了“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绥远前夕，才把陈国英、曲步霄放出来，他们二人坐了半年多班房子。

潘秀仁受伤以后，住在正风中学（这是潘赵派办的私立中学），我去看他。这时去看的人很多，未见之前，先要搜身，怕有刺客进去。我也被搜了身才见到潘秀仁，看见他也没有怎样，人还是好好的，不过半躺半坐在那里和人谈话而已。后来我把这次访问潘秀仁写了新闻报道，在报上发表，特别描绘了搜身的一幕。

日寇侵入绥包以后，陈国英就到了后套陕坝。一九三八年上半年，陈国英带着两个同伴途经榆林到了重庆。他的两个同伴当时都很年轻，是绥远赴重庆去上学的学生。这时我已住家在榆林，成了《大公报》驻榆林的记者，已和邓宝珊、高双成常来往了。陈国英路过榆林，我介绍他同邓、高见了面，他依然是那样大言不惭，天一句地一句地不说什么正经话，不几天就走了。

后来陈国英到了兰州，当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依然是特务头子，职业反共的刽子手。陈国英在兰州作恶多端，甘肃人把他恨透了。邓宝珊的参谋长俞方奉（字九如，解放后为

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对我说：“我们要捉住陈国英不杀他，要用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碎他的”（古有“寸磔不足以谢天下”之语，俞说的就是“寸磔”的意思）。邓宝珊的军医处长杨介宸的儿子在兰州被陈国英逮捕了，杨介宸知道我和陈国英是同乡，就请我向陈国英说人情去营救。我由邓宝珊的兰州办事处转一电报给陈国英，请他释放，陈国英也没有答复，但杨介宸的儿子终于释放了。

一九四三年夏，我随邓宝珊到了重庆。那时陈国英家住在重庆，没有看见他的老婆丁淑蓉，在祁志厚结婚时的一个饭店里遇见了陈国英。从榆林见面以后已有六七年未见了，陈国英原来是个肥胖的大汉，此时变得瘦多了，几乎没有原来的样子了，显得十分狼狈。谈了些他不会发国难财，吃了亏等等的谱，还说他的幼女在幼儿园掉进老师的澡盆里活活被淹死，他也“宽宏大量”没有追究云云（陈国英在兰州当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可能是一九四三年以后的事）。

我从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和陈国英见面以后，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于一九四七年才又在绥远和他见过面。这时他回绥远是为他老婆活动监察委员的事，后来他的老婆当上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监察院的委员。这一次他回绥远住的日子很短，只是在宴会场合的饭馆里见过。这时他在绥远因为有过枪杀纪守光的事，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此时，潘、赵派正和傅作义经过八年抗战在后套陕坝的勾结，潘秀仁继傅作义当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又是建设厅长，潘、赵培养出来的张遐民也大露头角，当了财政厅，这些人真是盘踞要津，炙手可热，谁还把陈国英看在眼里。这回陈国英能给他老婆丁淑蓉活动成一个监察委员，就算傅作义给他的很大的面子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在南京当了一个月的监察委员，和丁淑蓉曾见面，那时陈国英不知在何处，我在南京这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陈国英，以后也一直未见。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陈国英和丁淑蓉逃往台湾。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于呼和浩特）

绥远国民党党争拾零

袁 轸

绥远国民党各派简况

绥远党派大体说来有祁志厚派、焦子明派、潘赵派（潘秀仁、赵允义）、张敬亭的绥东派。我于一九三〇年到绥远时，潘赵派已盘踞了省市党部及各县党部，祁、焦、张等派成了在野派。于是这些人们的矛头都指向潘、赵一方面来了。祁志厚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南京任立法委员，焦子明也经常在外另找其出路。他们留下的一些伙伴，遇机就向潘、赵、张等，尤其对潘赵派攻击。记得有一年，掀起一次反潘运动，声势很大，弄得潘秀仁藏躲不迭，据说最后逃藏在建设厅长冯曦的私邸。

一九三一年，傅作义来绥主政初期，正值杨猴小、赵半吊、杨白皮、康存良等大股土匪四处窜扰，匪势甚炽之时。另外傅作义虽然名义上是绥远省主席，实际阎锡山安插了赵承绶的骑兵部队在绥东集宁、陶林、兴和等县，把王靖国的第十师配驻在包头以及河套各县。除此之外，加之地方党派纷争，傅作义当时的处境着实有些进退维谷。他深怕地方党派纷争、闹事引起其它问题，于是由山西猗氏县找来一个名张翔之（人皆称张翔老）的人，委了他一个省政府的参事，专门代傅搞地方党派的工作。当张翔之到达绥远以后，为了作事方便，特意在新城西夹道构建了一座孤

独小院。于是他整天身揣日记本，东访西问，作了详细调查供傅参考。傅作义把原来一向由地方人主持的教育机构、法院、党部及偏远的县分，如东胜、安北、固阳、陶林等县，作为他驾御党派的处所与地带，用挑起来，按下去，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调和矛盾等作法，如几次更动教育厅长及所属中小学校长时出现一些问题，随即派人处理、安插等。最终各党派都仰仗傅的鼻息，俯首贴耳于傅的肘腋之下。

一九三〇年春季，我在归绥担任绥远省立归绥师范学校事务主任的时候，偶尔从新旧城马路经过，路南边一处插着一面兰色旗子，门面上写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国。当时我真以为是这样，但耳闻目睹党争之现状却远不是如此。

党部选举会议的闹剧

一九三〇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我骑着车子由公主府到旧城购置东西，中途遇见一位国民党市党部的工作者（不知姓名）。他很客气地说正要找我，让我到市党部礼堂出席党员大会。我说我没有入过党，怎么能参加党员大会呢？他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急忙塞在我的衣袋里。我盲目地跟上这位面熟而不知名姓的人往市党部走。到了登记处，他把给我的那件东西送进去填了一张准许出席证，我就进了会场。原来这个大会，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开上了，只见有人正在发言，主席台上一个人指手划脚地给解答。逐渐听出，原来是为了候选人的产生起了争端。这次的候选人是由党部提名，请省党部批准。这次会议就是召集全市党员记名投票，进行选举。会场上，反对的一方提出，要求由各区党部

召集各所属区分部的党员，初选适当名额候选人，并推选代表参加会议，依照民主集权制，进行间接选举，不同意市党部不通过区分部、区党部擅自操纵，提请省党部批准的选举。他们坚持推翻当时的议程。另一方也提出自己的理由，力主按当时议程进行，台上的监选员一边解答，一边斥责。双方争吵激烈，大声呼叫主席和监选员，要求发言。逐渐地，下面开始打对仗，相互诘责、讥骂，秩序混乱不堪。最后，看着主席一直不露面，监选员也掌握不住会场了，我也和很多人一样离开会场，会议结局不得而知。

事后才知道，那个拉我来参加会议的人，是按照原任集宁县高级小学校长陈国楨的授意作的（我曾任过此校教员）。就这样，我没通过什么手续及介绍人随便拣了个党证。

表现派系之争的两次学潮

同年九、十月间，师范学校闹起了学潮。校长及教职员们，初以为这是学校内部的问题，不愿使事态扩大，分别劝说解释，但始终无效。闹事的学生，多系萨拉齐县籍，显系祁志厚派的人在背后鼓动操纵。另外，护校的一些归绥籍学生及部分绥东的学生也参加进去，这又显系潘赵一派的人在背后撑腰。学生们开始是要求校长辞退训育主任樊库。其实樊库本年并未给这些学生代课，与闹事的学生关系不大。校长为了平息事态，允许把训育主任更调，但仍无效果。其后又请刘颂三老先生（原是校长刘汉的老师，当时是师范数理教员）出面调解，同时请各教员督促中立学生继续按时上课。并暗示中立学生去劝说其他学生随同上课，这样做不仅无效，闹事的学生反而阻挡教员及中立学生进入教室。校长无法，当即报告教育厅并请示处理办法，教育厅长张敬

亭，以不助长学潮为原则，下令将首要闹事的学生予以开除处分。最后，尽管闹事学生大吵大闹，大有动武之势，还是被校方开除处分了一批。

我离开师范两年后，该校又闹起了学潮。一日约半夜时分，刘汉来找我，说学校闹起风潮了，让我即时到车站泰安栈去，找训育主任常自有、教员刘颂三，告诉他们已给民政厅袁厅长通电话了，请令警察前往镇压。当我到了泰安栈，刘、常二人说当校长离校以后，他俩也被撵出。他们在校门外停留了解校里情况期间，忽见南边走来两人，向东边门里的学生听不清说些什么，此时警察也来到了，他们把这两人交由警察带回去看管起来了，原来这两人是寿松年和张万仁。

第二日，他们都到校长家里集议，报告了教育厅，通过民政厅派警察护送校长等人回校，结果，把带头闹事的学生给开除了，寿、张二人未加究问，予以释放。从此以后，张敬亭和刘汉两人极不相容。刘叹息地说：连个学校都不能单纯地办，搅混在党派里是什么作风！

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的派系竞争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当时是分区举行，绥东丰镇、凉城、兴和、陶林、集宁五个县为一区，一个区选代表三人。

刘汉当时本无意进行竞选，他的外甥女婿丁士贞（抗战时牺牲）怂恿他试一试。潘秀仁听说以后，特意派人给刘送来二百元现款，作为竞选费用，刘当时谢绝。丁士贞对这次竞选很感兴趣，他对刘说：现在张敬亭、班浩（统计局局长）深怕您老来与

他竞争。愈老要不出来，显系被他们吓住了。刘于是决定参加竞选，并给他的学生写了许多信，结果初选成功了。一九三七年复选举时，他在绥东这一区因得票数最多而当选了。张淑良次之，梁元又次之。初选时，张敬亭怕落选丢了名气，不抗拒刘、班又怕失掉绥东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凉城人，刘汉也是凉城人，专门为了与刘汉竞争，他怂恿梁元，拿出巨款来竞选，结果列入第三名。不料，班浩依仗他父班廷献，通过田应璜的关系，阎锡山来电指名让傅作义把班浩选上，因此把票箱搁到集宁，最后设法把梁元挤下去了。张敬亭激愤地发散传单，一场选举风波给闹起来了。正闹得不可开交时，被日本侵略军的大炮给震灭了。

张敬亭掀起的反阎伟斗争始末

一九三五年秋季，《绥远社会日报》上披露了一则消息，登载了一些指责教育厅或教育厅长阎伟的话，这一下触着了他们的逆鳞。阎伟是祁志厚派的继承人。民众教育馆长樊库，以及其他所属人员，是阎的眼中钉，早想找个隙缝拔掉。民众教育馆及社会日报社是教育厅的直辖机构，当阎伟看到这则消息以后，除用电话诘责外，旋于次日下令将樊库的民众教育馆长撤职，先此集宁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米伋穉也被撤职，更换成丰镇县人郭际枚。张敬亭以为阎的种种措施，简直是对他开火，于是召米、樊以及绥东各县在省供职的人士，在他的府邸开会，商讨倒阎驱阎的对策。当时，让宋介之草拟宣传传单，除送其它报社披露外，分送各机关学校。这次的人数，可以说把东五县在省人全包括在内。其后傅作义暗示财政厅长兼禁烟善后稽查处总办李居义调解。人们日日前往张邸集会。张、李接触频繁。一日下午集会

当中，张敬亭郑重其事地宣布说：咱们这事，傅主席很关心，同时主席对阎的举动很不满，因此主席请出李厅长来给我们调解。我们也不愿意给主席添麻烦。原来是为了樊冲府（樊库的字）被撤职而引起的，主席特意委樊库为陶林县长，大家就算完事吧。但第二师范训育主任申化南（这次代米出席）大为不满，一时会场上沸腾起来了。张敬亭很生气。于是，人们提议改日从长计议。因樊库前一日已得到张敬亭告述，他已首先退出。

事后，人们探悉张敬亭这次反阎，有他个人的意图。最初确实要与阎对抗，通过抗争，来巩固他在绥东的领导地位，显示他在绥东的力量。通过樊库离间陈国桢、刘汉等与潘秀仁、赵允义的关系，使潘赵不得染指绥东。此外，他这次领头闹事，本愿给米伋秭、宋介之、申化南等人安插一个适当的地位。但他本人得到李居义暗许的一笔重款，就不再向李居义讲说米、宋、申等人的事了。所以这次风波，最初是绥东五县在省人士的一个大团结，最后是一个大分裂。从此以后，张敬亭在绥东就有些叫喊不起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各省市按名额选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张敬亭让他的大儿子张维勇出名竞选立法委员，因无人支持败北了。刘汉竞选立法委员成功。于是，张敬亭指派凉城人史正卿向刘汉威吓利诱，硬要刘汉把立法委员让给张维勇充任。史对刘说，如把立法委员退出，张先生负责让你担任归绥市长，否则真有些了不得。当史正卿走后，刘汉激愤地说：“祖辈世袭的制度，已随时代的变迁，成了历史上的陈迹。多少万人的凉城，只准张家一门父传子，子传孙世袭吗？我今天偏要拗一拗他，看他把我如何？”这也说明张敬亭从那次反阎大会已失去了威信。

派系内部火并残杀

一九三一年以后，日寇侵华的矛头指向华北。过去绥远从未有过一个日本人，当时也安插了日本特务机关。一九三五年，日寇迫令国民党中央政府撤销华北各省的党部，不得在华北地区有所活动。绥远在日寇特务机关监督之下，不得不将党部封闭。国民党中央密令各省在暗中筹设活动。一九三六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夜，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在旧城北门西边一个偏僻小胡同里一所民宅内，潘秀仁、赵允义、纪守光三人正伏案商讨党务在暗中活动办法，突然，有人从外向潘秀仁射了一枪，潘脚部受伤，顺势跌在桌下，赵允义随亦伏在桌底。纪守光在灯光照耀下，急忙奔向套房里间躲闪，刚踏门槛，又一枪射准纪的后背，当场毙命。第二天早晨，我由城南十八里贾家营合作社穿旧城返新城时，在北门外东顺城街，迎着纪守光的大女儿纪新香，她哭丧着脸问我：省党部在哪里？我说：省党部早已关了门。她说：我父被害了，死活不明。听我父说，新省党部设在北门里西边一个僻静小巷内，你领我寻找一下。我当时忆起牛桥街德合明山货铺，一向经营各学校、各机关的生意，上街的人消息非常灵通，或许知道。果然由德合明上街的人领我俩找着了。这时，门外已设岗警，阻止进院。经说明请示后进去一看，潘秀仁两手抚摩着脚部脸色灰白地坐在地下，赵允义背插着手在屋内踱来踱去，纪守光跪倒在里间房门外，下颌托在里间房门口一个骨牌凳子上。上身衣服脱去，背后有一个约食指粗细的弹孔，纪新香随即抚尸大哭。

过了几天，传说把陈国英、曲步霄二人逮捕了，押送在高等法院。以后潘、赵移住私立正风中学，与该校国语教员王鸿度日

日研究草拟诉状，催促法办。他们原来是形影不离、同流合污的一派，为什么一旦火并起来，竟至于下毒手残杀？原来纪守光是山西省阳高县人，他的叔父纪子明早已同国民党反动头子CC派陈果夫勾搭上，几年前就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通过纪子明，纪守光直接同陈果夫撮合上了。通过陈的关系，允许绥远选派一个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当时陈国英要他出任⁶，潘秀仁执意要赵出任，毕竟陈人单力微，一根骨头被赵衔去了。陈怀恨在心，于是杀机萌胸，终于爆发了。

纪守光死尸移回他的院内举哀停放后，等待法办了陈、曲二人再行下葬。不料官司一天天地拖延下去了。及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迫近绥远，法院释放了所有拘押的男女罪囚，陈、曲二人也不例外地出监了。纪的的死尸不及安葬，草草厝殓在他的院内西小圈圈墙边，家人便惊慌失措地随其他人逃难走了。

吉鸿昌将军在内蒙

王崇仁

吉鸿昌将军是爱国抗日的民族英雄，是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认识吉鸿昌将军，是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将军发动的北京政变之后。当时我在国民军第一军补充第四旅二团三营九连当兵，他是第三营营长。一九二五年夏，他调任绥远都统署副官处处长，我已调到绥远都统署手枪队当战士。同年秋，吉鸿昌将军调任绥远全区警务处处长，一九二六年又任陆军独立三十六旅长、第十九师师长。我在三十六旅及十九师司令部手枪队任队长，随他转战陕甘、进军华北。一九二八年，他保送我去德国学习军事，于一九三一年回国，又继续随他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从事抗日反蒋工作。我随他工作约十年（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亲眼所睹，他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功勋。这里只简略地回忆一下他在内蒙地区活动的片断情况。

吉鸿昌将军为绥远人民造福谋利

一、紧张练兵，不忘帮农。吉鸿昌于一九二五年元月在西北军补充第四旅二团三营任营长时，部队由北平移防绥远归化城，

駐在小校场（今内蒙医学院地址）营房内。是时，适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军任西北边防督办，辖有绥远、察哈尔、甘肃等省区地盘。军队招兵买马，大量地进行扩充。西北军几乎全系新兵，军事训练任务繁重，要求严格，课程安排很紧。精力充沛的吉鸿昌营长，经常在紧张的练兵中挤时间，率领全营官兵到营房附近的村庄，如什拉门更、攸攸板、刁刀板等地帮助农民劳动。他说：“我们官兵弟兄们来自老百姓，我们穿的军衣，吃的军粮都是来自老百姓，我们的枪支武器都是用民脂民膏购买的，我们帮助农民父老弟姐妹劳动是天经地义应该的事。”因此，我们官兵与农民打成一片，在劳动中很卖力气，除了喝点农民们送来的白开水外，不接收任何报酬。农民们赞扬说：“西北军是一支爱护老百姓的军队。”

二、整修街道，以利交通。一九二四年，西北军移防归化城时，归化城系绥远特别区首府。当时平绥铁路已通，市面商业尚称繁荣。唯有“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特别是主要街道高低不平，尘土飞扬，降雨天气道路泥泞，市民大为不满。

吉鸿昌将军于一九二五年夏调任绥远都统署副官处处长后，看到这种情形，就在他的办公桌对面挂的黑板上写着：“道路不平，尽是灰尘，进行整修，刻不容缓。”接着于五月间，发动归化城驻军石敬亭的补充第四旅、绥远都统署手枪队等部之兵工整修了归化城市区三条重要道路（即火车站至新城、新城至旧城、火车站至旧城），以沙石和炉渣铺路面，轧的平平整整，并在道路两旁植有柳树。街道整修后的归化城市容，当然不能与今天的呼和浩特相比，可是在当时看起来，颇有点生气，美观多了。

三、消灭匪患，安定社会。一九二五年秋，吉鸿昌将军由绥

远都统署副官处处长调任绥远全区警务处处长时，绥远全区遍地是土匪，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闹得民不聊生。大股土匪头子有王英、杨猴小、赵半吊子、金翅刁（女）等人。这几个土匪头子大都是些驽悍惯匪，杀人的阎王。吉鸿昌将军为了人民安宁，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了招安与剿除两种办法消灭匪患。他将匪首王英招安，改编为绥西护路队，其余几股土匪亲率保安骑兵团配合地方驻军剿除消灭。杨猴小，赵半吊子被剿除，金翅刁被击毙。土匪被剿平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城市商业呈现出新的景象。

四、维护绥北交通，整修蜈蚣坝。蜈蚣坝段公路为归化城通往武川县、四子王旗、茂明安等地唯一的交通要道，当时绥北各旗县盛产小麦、牲畜、皮毛等物资，要经此路运到归化城转销国内外。同时绥北各旗县蒙汉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亦经此路运往。但此路为人马车辆行走踏成的大车路，路面狭、坡度大，转弯多，又崎岖不平，据人传说，路形如蜈蚣，故名蜈蚣坝。此坝如在冬季降雪之后，山高路滑，汽车马车过此坝，常常肇事滚下山去，客旅行商的生命财物遭受损失是很大的，他们对过蜈蚣坝视为畏途。

警务处处长吉鸿昌每逢接到蜈蚣坝客商肇事的报告后，总是不安地对人说：“我一定想办法铲除掉这条吃人的害虫——蜈蚣。”后来，他呈请都统李鸣钟批准以兵工修建蜈蚣坝段的公路，并于一九二六年春亲自率领所辖的骑兵团，补充第四旅一个团和绥远都统署手枪营开赴坝口子、乌素图一带安营扎寨。我那时在绥远都统署手枪营第一队当副班长。记得开工时，吉鸿昌将军在大青山下集合队伍作动员讲话。他首先问我们：“我们军队穿着老百姓的军衣，吃着老百姓的粮食，我们为老百姓修路，以

解除他们行路的危难，你们说，应该不应该？”我们一致高声答应：“应该！”他又继续问我们：“怕苦不怕苦，怕累不怕累？”我们又继续答应：“不怕！不怕！”继而他又给我们讲了很多军队应该为老百姓修路的道理。尔后，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一样，手执铁锹率先在工地上同士兵一块劳动起来。当时工地上歌声、号子声、笑声汇成一片，响彻云霄。由于吉鸿昌将军和其他军官们与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士兵们很受感动，劳动很积极。有奖有惩的竞赛办法也鼓舞了士气，不但修路的速度快，质量也很好，竣工计划提前完成了。竣工时，吉鸿昌将军亲书“化险为夷”四个字，遂刻于坝顶公路右侧崖石上留念，此四字至今仍完好无损地留在那里。

蜈蚣坝段公路修妥后，便利了绥北交通，大大减少了客旅的生命和财物损失，繁荣了绥远物资交流。虽然此段公路今天改道不用了，但是迄今内蒙古人民对吉鸿昌将军整修蜈蚣坝公路仍传为佳话。

吉鸿昌将军评昭君出塞

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城南十公里黑水之畔，墓高约三十余米。旧时代这一高大古墓，无人看管，墓周围略有几棵树木，墓前立着东倒西歪的历代名人石碑。旅游者观后大有寒冢荒墓之感。

吉鸿昌将军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游览了昭君墓。当时他赞扬说：“昭君真是一位可佩服的巾帼英雄。”游后立碑对昭君表示敬意，并加史评以抒感怀。其碑文曰：“懦夫愧色。”史评曰：“西汉当元帝之际，边祸日亟，内外臣僚皆萎靡不振，怯懦

卑鄙之无识者流，并无人焉，敢挺身而为国捍危难者。独明妃以弱孱女子身蹈×××，其冒险精神与班定远后先光辉，×装书此，以表领忱。中华民国十有五年五月中浣谷旦。中州吉鸿昌。”

吉鸿昌将军在西北军是一位爱国的青年将校，他对士兵喜欢讲岳飞、文天祥、木兰从军，昭君出塞等英雄故事，以鼓舞士气。在此又对昭君出塞和亲一事立碑评述。

率部抗日战绩辉煌

日本军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在我国东三省发动“九·一八”事变，企图以东亚共荣圈为幌子，达到灭亡我国之目的。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东三省、热河等省相继沦陷。尔后，日寇又分兵两路向西南进军，即南侵我长城线，西犯我察哈尔。其西路，李守信、刘桂堂等部配合日军一部分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侵占多伦，五月二十四日占领沽源，相继又占宝昌、康保、商都等城市，并企图军事大包围侵占张家口。南京政府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竟然与日寇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当时在张家口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对南京政府此举义愤填膺。他赞成中国共产党宣布的抗日政策，接受了共产党派出的吉鸿昌、宣侠父、南汉宸、柯庆施等同志的协助，创建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将军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将军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将军任前敌总指挥，从而掀起华北人民抗日的大风暴。

一、解囊购枪。一九三三年五月间，辽、吉、黑人民抗日后援会正在办理结束中，我系该会的军械股股长。爱国老将军、会长朱庆澜敬慕方振武将军北上抗日的热忱，派我到方的司令部所在地宣化，送去战刀五百把，以利方军的抗日。事毕，我顺便到

张家口检查了我会移交给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汽车队的情况。是时吉鸿昌将军已被冯玉祥将军任命为察哈尔省保安处处长，正在忙着筹创民众抗日同盟军。我去看望他，即留我在保安处工作。大概两三天后，吉鸿昌将军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咱们筹备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武器很缺乏，你对北平很熟悉，拟派你去北平购置手枪壹百支、电台一架。款子一万元，马永千处长已给你准备妥，希望你迅速完成这个任务。”当时因为冯玉祥将军正在张家口紧张地酝酿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蒋孝先宪兵三团对北平运往张家口的武器查禁甚严。我怕完不成任务，迟疑未决。因筹建民众抗日同盟军急需武器，马永千处长又告诉我，此款系吉鸿昌将军自筹经费，他这种为抗日毁家纾难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义不容辞，随即携款返回北平。

北平我有一个患难朋友李经五，系辽吉黑民众抗日后续会军械股股员。他与法国买办商人克郎盖联系，商妥给予经济好处，由克郎盖代买手枪和办理托运手续，将买妥的手枪一百支、子弹一万粒、电台一架装在两个大长方形铁皮箱子内，加法国大使馆封条，由法国大使馆卡车运至西直门火车站，假借法国大使馆送给绥远教育厅电影放演机两架，运至归绥站。当时宪兵要进行检查，克郎盖用手指敲了敲封条说：“大使馆！”宪兵未敢检查，随办了托运手续。克郎盖在火车站外将托运单给了李经五，李在火车开后，叫我看了托运单。当时我想起用钱买法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很懊丧，但我不这样办又不行。火车至张家口站，这批武器由我们保安处住站检查人员取出交给马永千处长。我随即面见了吉鸿昌将军，汇报了买枪及托运的经过，吉鸿昌将军说：“这个任务完成的好。”并继续高兴地说：“吴广以木棒子为武器起义，打出个张楚国；刘邦以一把宝剑斩蛇起义，打出个汉室天下。

我们有手枪百支，组织起民众抗日同盟军，联合全国人民进行抗日，还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不倒吗？”这以后，吉鸿昌将军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率队出击，光复了察北五县，这批手枪在光复失地的战斗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光复察北失地。吉鸿昌将军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该军系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主力部队，是冯玉祥将军在洛阳成立军官学校时以队长、教官、学生为骨干编成之。辖有高树勋师、支应麟第二师、宣侠父第五师三个师。军队武器装备不好，均系旧步枪，只有一部分轻机枪。但军队骨干军事技术水平高、思想进步、基层领导干部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所以第二军的战斗力很强。

为了光复察北失地，吉将军於就任前敌总指挥的次日（六月二十一日），率师分兵三路向北进行反攻。他在出师前召集部队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最动人的一段为：“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已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扶危。”当时民众抗日同盟军听完动员讲话后，士气高昂。出兵时恰值雨季，道路泥泞，行军很困难。同时新编成的民众抗日同盟军补给无着，除了携带的一些炒米外，就依靠沿途向农民征来的土豆、大瓜等维持生活。但这些困难并未减弱官兵的斗志。进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左路军高树勋在攻战康保后，顺利地占领了商都；右路军孙良诚部进兵到达沽源时，敌刘桂堂率部反正，沽源随被光复；吉鸿昌将军率中路军于六月三十日进抵宝昌附近，七月一日进攻宝昌，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占了宝昌，三千守敌残部退往多伦。七月四日，吉鸿昌将军率部逼近多伦，激战周余，攻战了多伦近郊各据点，于七月十二日向多伦发动总攻击。总攻击前，吉鸿昌将军派直属警卫部队以战俘服装化装成伪军潜入多

伦城内；总攻击时，吉鸿昌将军赤膀手执战刀率先前进，经过一场血战，里应外合终于光复了察北重镇——多伦。敌伪李守信等率残部逃往热河丰宁。从此察北沦陷的商都、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五县均重入祖国的怀抱。

“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三省和热河相继沦陷，失地数千里，诚如吉鸿昌将军所说的：“半壁河山业已改色。”国军数百万狼狈溃窜，从无收复一城一池。光复察北五县为光复失地之纪元，民众抗日同盟军反攻察北的胜利，是一次震撼中外的胜利，全国人民鞭炮齐鸣欢呼庆祝，各地贺电如雪片一样飞向张家口，大批的慰问金和物资汇给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在办理结束中，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汇来慰问金十万元。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光复的察北五县，其中商都、宝昌和多伦三县，现今系我们内蒙古地区管辖，沽源、康保现属河北省。这次反攻胜利，与全国人民的声援及内蒙、河北两省区人民的人力物力支援分不开的。所以说，这一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但在全国人民欢庆察北光复胜利的欢呼声中，蒋介石却在那里暴跳咒骂：不准你们抗日，抗日胜利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反对塘沽协定，就是反对政府，随即下达讨伐令，向察哈尔进军，因此逼得冯玉祥将军通电下野，方、吉两将军率抗日健儿进入华北继续反蒋抗日。在昌平地区与蒋军二十多万及日寇一个联队苦战数十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损失惨重，在日寇与蒋匪军联合包围下，归于失败。

（一九八四年）

吉鸿昌出国考察

王崇仁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战争已成败局，吉鸿昌脱离了第二集团军，在河南归附了蒋介石。因为他直接与蒋介石打了交道，才逐渐地认识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从而使他这个爱国的旧军人，走上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光明道路。

吉鸿昌率所部第九军四万多人投归国民党政府后，蒋介石表示将对他有所借重。将他原属的三十师和三十一师改编为第二十二路，任他为总指挥兼三十师师长。还将二十二路划归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指挥。李鸣钟系吉鸿昌在西北军的老长官，又系同乡。二十二路的防区是河南商城、潢川和湖北麻城等地，总指挥部驻潢川。蒋介石特派冷欣为联络参议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协助整训部队。从这些措施来看，蒋介石对吉鸿昌的态度是亲善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先与后取”的笼络手段，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一贯手法。事实上，蒋介石不仅策动第二集团军的将领反对冯玉祥，以瓦解第二集团军，而且对由第二集团军分裂出来的部队，也实行同一办法，而先分化瓦解，最后予以消灭。吉鸿昌以及其他原属第二集团军的梁冠英、石友三、孙连仲、宋哲元、韩复榘等部队，都是蒋介石用这套办法消灭掉的。

吉鸿昌在所部整编为第二十二路后，认为部队在中原作战中伤亡很重，急待休整和补充，但他这个天真想法是与蒋介石的企图

矛盾的。蒋要吉鸿昌部队对他绝对服从，效劳卖命，否则就“吃掉”它。冷欣这个蒋介石的高级特工人员，就是肩负着这个使命到二十二路来的。因此，冷欣在二十二路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监视这个部队，以至对其进行瓦解和消灭。如二十二路希望对装备、弹药给以补充，他推说中国连年内战，消耗过巨，现在补充有困难，但对驱使二十二路进攻大别山苏区却振振有词。一九三〇年冬季，二十二路被迫向豫、鄂、皖苏区发动进攻，遭到严重失败和损失。吉鸿昌从这一失败中不但认识了红军力量的强大，同时也理解到蒋介石的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毒辣阴谋，但对冷欣这个高级特务来说，总算是他对蒋介石立了一大功。接着，冷欣就秘密地以金钱收买二十二路各师的团级以上军官，使其和吉鸿昌捣乱，以瓦解二十二路的部队。冷欣当时只要听说哪位将校军官缺钱花，就主动赠予三百元、五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收买的钱数看你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定。当时有些高级军官是被收买了，例如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就是被收买的一个，据说光收买张印湘就花费了十万元以上。张印湘本来与吉鸿昌的关系很好，也是河南人，又系吉鸿昌任陆军独立三十六旅旅长时所属的一个团长，他升任旅、师长，以至二十二路成立后当军长，都是吉鸿昌一手提拔、保荐的。从张印湘被收买后，经常为了人事和经济问题，故意与吉鸿昌闹意见，由于冷欣给张印湘撑腰，吉鸿昌就无法处理。

吉鸿昌了解到冷欣在二十二路瓦解部队的各种阴谋活动后，觉悟到投归蒋介石是走错了道路，同时认识到二十二路进攻苏区是上了当，从此二十二路与苏区成了无协议式的罢兵休战状态。这时吉鸿昌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曾不断地对他接近的人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我必须走革命的路才能赎我的罪。”

由于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的做法，也引起了当时由第二集团军分裂出来的石友三的不满。石于一九三一年春在河北发动了反蒋、反张学良的战争，吉鸿昌对石友三的反抗很表同情，并暗中予以支持。在石友三失败后，吉鸿昌估计蒋介石会转过矛头来对二十二路下手，当时他对一些主要部属说：“如果蒋介石打我们的话，我们不会等着被消灭，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并指示作好准备。当时他还说：“如果我们抵抗不了时，我们退入红区作俘虏，也不屈服于蒋介石。”

有人说：在一九三一年春夏之际，吉鸿昌曾与红军取得联系，秘密化装进入红区参观，并与红区取得协议罢兵休战。我认为这一说法与事实不尽符合。当时在冷欣监视很严的情况下，这样做不可能。如果他早与红区有联系，何必八月间又派我去商城找关系呢？同时如果他早与红区有联系的话，肯定他不会离开部队出国视察。这一说法可能是指一九三二年夏宋埠暴动失败后他率一部分队伍进入红区作过短期参观的传闻之误。

一九三一年年初以来，蒋介石与吉鸿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对二十二路首先施用了经济压力，连续有一两个月扣发部队经费，经驻京办事处处长王慈博多方奔走联系，才仅仅发给一部分菜金和给养费。这年我由山西去河南绕道经过南京时，王慈博对我说：“咱们是杂牌军队，呈请补充比登天还难，即使批准也些微无几。”这确是实情。何况吉、蒋之间的矛盾，已不只是杂牌军队与蒋记嫡系军队间的一般矛盾。蒋介石的经济压力已经给二十二路部队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和纠纷，同时他又搞武力威胁，将镇压石友三的军事力量调驻陇海线和平汉线上，对二十二路驻地潢川、商城等县采取了大包围形势。但二十二路是久经战阵的劲旅，吉鸿昌也是从前第二集团军有名的勇敢善战的将领，这种威吓没起多

大作用，相反的却使吉鸿昌提高了警惕并作了军事上的准备。这是七月以前的紧张情况。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我和几个留德同学一起到山西绛县去看冯玉祥将军，他派我到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工作，我没有去，以后随他去汾阳。八月初，蒋、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地传到汾阳来，冯玉祥将军知道我是吉鸿昌的老部下和我与吉之间的良好关系，派我去河南看看情况，并嘱咐我几点：你去河南要以你个人名义出现，吉鸿昌若问你从哪里来，可以说由山西汾阳来。吉鸿昌若问我对河南紧张局势的看法时，你说我的看法只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蒋介石是流氓头子，不讲信义，不可以共事；一句话是要想救国救民，非走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不可。冯先生派我去看吉鸿昌，是吉脱离第二集团军以后，冯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个行动既是对吉的关怀，也与抗日反蒋救国密切相关，我认为很重要，当即向冯表示愿意完成这个任务。

我接受任务后，从山西绕道南京，在二十二路办事处取得了一张护照，经汉口转信阳到了潢川。这时冷欣去南京表面上作吉、蒋的调解工作，实际是去领取旨意。他竭力企图使吉鸿昌离开部队，而吉鸿昌则从未动摇过不离开部队的决心。我到二十二路的当天晚上，吉鸿昌找我谈话，我们见面之后，谈了些我的学习情况，随后又问我从何处来？我答由山西汾阳来。几年不见面，不断的惦记着，并听说这里情况很紧张，特来看看你。我说完后，他大概体会到我是冯先生派来的，很久的时间没有发言。又谈一些别的话以后，吉鸿昌问我：“冯先生在汾阳很好吧？”我说：“很好，他对这里情况也感到不安。”“你来时冯先生有嘱咐的话吗？”随后我就把冯先生的两句话转告他。他沉默一会说：“很对。”这时候已经很晚了，他让我去休息，告诉我换上军服。如

冷参议回来，不可与他多接近。八月中旬末，有一天，吉找我谈话，派我到商城徐花荣旅长防地去看看苏区活动情况，并秘密指示我设法与苏区取得联系。我接受任务后，由一个骑兵排把我护送到商城，徐旅长本是我在绥远都统署手枪队任班长时的排长，我们关系很好，他给我谈了不少关于二十二路以往的事情，同时也给我介绍了苏区的情况，我就住在他的司令部里秘密地想法子找关系。

蒋介石虽然对吉鸿昌部施加经济压力，并调兵遣将予以吓唬，但始终未敢采取断然手段。这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二路战斗力强，吉鸿昌敢于抵抗，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二十二路的防区商城、潢川等县与苏区毗连，蒋军若压力过大，就可能逼得吉鸿昌率部投奔苏区，这样不但解决不了二十二路部队，反而增加了苏区的力量。所以这个时期，蒋、吉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蒋介石因有所顾虑，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形成了蒋、吉之间的僵持状态。

八月底左右，徐花荣旅长由潢川开会回商城后告诉我：“吉总指挥接受了冷参议由南京带回的出国视察的新任务，他已离开部队，由冷参议陪同去上海，请你也去上海。”我闻之深为愕然，细心揣摩，这时候军事没有变化，出国视察明明是个阴谋，吉鸿昌为什么接受丢掉军职去出国视察呢？据我以后了解，他离开部队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是与苏区没有取得联系，形成腹背受敌的孤立，处境危殆。第二是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并且没有外援，如蒋介石发动进攻，会使二十二路受到很大损失。第三是二十二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如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抵抗，肯定会出现内部分裂。这个问题在八月下旬吉鸿昌为了说明当时与国民党中央矛盾的情况所召集的旅长会议上，表现的很明显。虽然当时三十师的旅长们不同意吉鸿昌出国视察，

但是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却装病没有出席，该师的旅长们在会上也没有表明态度，这使吉鸿昌深感部队有分裂危险。第四，蒋介石虽然不讲信义，但吉对他提出的条件还多少寄以希望。由于上述的原因，尤其第三个原因，使吉鸿昌接受了和平离开部队的条件。其条件是：吉鸿昌以政府名义出国考察；二十二路的番号和人事不加更动，总指挥由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暂代；吉鸿昌回国后仍可回部队工作；拨给考察旅费十万元。这些条件是经蒋介石确定由冷欣带回来的。但是言犹在耳，吉鸿昌刚刚出国，蒋就把二十二路的番号撤消，缩编为军，被收买的张印湘升任军长。出国考察旅费只拨给六万元。

张印湘在吉鸿昌出国后，因为他逼使吉鸿昌离开部队有功，升任军长。一九三二年夏，吉鸿昌率三十师（当时只集结起来一个团）准备在宋埠起义时，他迅即由汉口赶来亲率三十一师部队驱走了吉鸿昌，把跟随吉鸿昌工作的燕鸿甲逮捕。燕坚强不屈，被剥皮处死。张印湘对蒋介石虽然效尽了犬马之劳，但以后由于他与蒋记嫡系闹矛盾，被定上反抗中央的罪名，被蒋介石所杀。

吉鸿昌八月底离开部队，由冷欣监视陪同去上海准备出国。我于九月九、十号到上海，吉鸿昌住一品香饭店，我住大中华饭店，我们住处相距不远，我每天去一品香饭店，在吉的随从副官牛健忠房间等机会，但都因国民党政府参议常小川等监视很严，无法与吉接近。一直等到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下午，乘常小川等外出之机，我才与吉鸿昌谈了约两小时。我首先汇报了去商城的经过，随即问他：现在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你可否请示不出国视察，率部队抗日呢？当时他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想法，经常小川参议请示南京没获准。”他又告诉我：“蒋介石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镇压革命力量和排除异己，打不

完的内战，招来外患，真该万死。”我又对他说：蒋介石应对丧权辱国的“九·一八”事变负责，我想国人不会原谅他，时局会有新的变化，你可利用变化之机回部队去，这样有利于斗争。他又说：“现在他们监视很严，况且是二十三日的船期，时间太仓促了。”我随即建议：“你是否以吃泻药装病，退了船票，以后再计划第二步的行动。”他想了想告我：“既然已离开部队，出国看看再说吧！如时局有变化我立即回来。”我也体会到他被劫持不得不出国的苦衷，就再没有说别的话。他嘱咐我仍回山西冯先生处，并说：“你对这里情况很了解，你向冯先生汇报吧！”最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国难当头，报国有期；蒋贼不灭，革命不息。”

九月二十三日的雨后上海，天气晴朗，阵阵秋风由黄浦江上吹来，也有些凉意。下午二时，我们到江边为吉鸿昌送行，祝他一路平安，早日回国杀敌。

我于九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乘火车去山西，九月底到达汾阳，当即去峪道河见冯玉祥先生，汇报了吉鸿昌出国视察的内幕和情况，冯先生唉叹了一声，良久不言，最后恨恨地大声说道：“蒋介石，历史不会饶恕你！”

克兴额先生小传

博彦满都 阿萨拉图

克兴额先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知名人士，一生从事蒙古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先生去世至今已有十五年了，关心并研究蒙古文化和历史的同志们，每多询问先生的生平事迹，因而向素知其人其事的人们多方探询，写成这个不甚完整的资料，供有关方面参考，不足或错误之处，尚希知者予以指示纠正。

事故繁多的家世

先生汉名包存智，字明远，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今辽宁省康平县）西扎哈气村多隆阿之家。

先生的先世是扎鲁特旗台吉（注1），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受清王朝之命出征噶尔丹，战于额尔德尼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大败而归，被降为平民，故不愿再回故里，移住科尔沁左翼前旗北部乌旦他拉，成了该旗封建主宾图王的阿拉巴图（属下）。

乾隆末年，宾图王将王府由伊克岳里泊迁至旧王府（邓家店）时，迫令旗民亦由北南迁，开垦土地，为他纳租。先生的祖先也迁至西扎哈气村。先生祖父懂蒙、满文，当上了宾图王的梅

伦（注2），苦于不懂汉语，乃令子弟每天到五里外的“王图头”家里，学习汉语，并读“三字经”。及至先生之父多翁已兼通满、蒙、汉文，且熟于清朝典章制度，他不承认是宾图王的奴才，不受其差使。曾协助总管清朝皇室东北三陵所辖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的翼长（嘎拉达）特格喜，反对开荒，向奉天将军、热河都统和北京理藩院控告满洲军头目冯麟阁，清王朝不悦，派遣大军包围苏鲁克旗，逮捕了特格喜，并通辑多翁归案。宾图王闻之，恐罪及其身，又下井投石，即声明本旗并无此人，又威胁多翁给他当差。不久，多翁之父故去，宾图王凭空向多翁索债，说他的父亲生前欠债累万，要没收他的家产，遂在他门前挖沟，不准车马出入。多翁起而反抗，即在家中布置了火器打手，自己又立北京，控告宾图王于理藩院。宾图王惧，乃求东土默特旗王子（宾图王的姑夫），出面调停，争执乃告一段落。后来，多翁又向哲里木盟盟长、科尔沁右翼中旗王爷连年控告宾图王的罪行。其时，科尔沁右翼前旗封建主乌泰王，为偿还京债，招徕喀喇沁等地人民在本旗开垦土地，多翁亦在此开垦为农。

在此以前，有科尔沁右翼前旗随公主下嫁的满洲“八旗人民”（注8），居住在左翼前旗柳条边（注4）外，成立了七大屯，但仍受其原来所属旗管辖，他们拒向宾图王纳税。而宾图王不但要收租，还要收他们为奴。他们得到多翁的援助，告到昌图厅（注5），得批：“八旗人民”仍归右翼前旗管辖。”为此他们感念多翁之恩，遂向右翼前旗推荐，让多翁在那里，一面帮助整顿旗务，一面继续控告宾图王。在上诉中间，宾图王却变本加厉，迫令先生之兄格蒙额入府当奴。格蒙额越墙而逃，得亲友的帮助，跑到千里外的多翁住所地避难。先生得过寒汗症（注6）竟三年不起，以致身体孱弱。

求学及受奴役

先生十岁时，甚恨其祖母维持并执行封建专制和迷信喇嘛、压迫奴隶的作法。当她迫令先生当喇嘛时，先生说：“我宁死也不当喇嘛。”

先生十一岁时，其父兄得右翼前旗王子调停，无罪归里。他们痛恨王公压迫，首先解放了家中奴仆依兴阿等十八人，把在右翼前旗的田产，全部分给他们；一面下定决心，让先生就学，初令就学于李金汤和雷振东二夫子。十二岁时，喀喇沁、土默特等地的文风传入旗内，先生又就学于满、蒙、汉兼通的一位白××先生。十六岁时，学识颇有根底，却又被宾图王的老福晋（王母）得知，迫令先生辍学入府当差，为她讲读故事，消愁解闷。暇时，先生便向府中一些人士学习文章，钻研不已。在此三年之中，先生目睹王公贵族作威作福、任意掠夺、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喇嘛成群、到处传播迷信的现状，恨之入骨。因而作杂文诗赋，加以尽情讽刺，且直说：“这些毒蛇猛兽不死，社会怎会得好？”

入蒙文学堂及参加革命运动

戊戌变法以后，满清王朝为欺骗人民，推行所谓“新政”。一九一〇年在沈阳成立蒙文学堂（贵胄学堂），指令宾图王的弟弟丹巴达尔济入学读书。吓得这些贵族们好似大祸临头，哭丧之余，竟迫令先生和博彦满都二人给丹作“陪读生”。不久，先生被评为优等生，协助老师编译教科书，成了代课老师。次年，

奉天省（即今辽宁省）成立蒙文教科书编辑局，由蒙文学堂录取高才生，先生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被选为编辑员，参与编辑了“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先生已成为同盟会会员，当时人们都已剪发，独有蒙文学堂师生仍拖着长辫，显得非常落后。先生便和数名同学，发动剪发运动。少数王公子弟，不但不剪，且说：“头可断，发不可去。”先生同他们展开激烈斗争，强行剪除或乘其不备给剪去一半，终于全给剪掉了。影响所及，古老的教师们也纷纷剪发。次年，因日本铺设侵略性的安奉轻便铁路（注7）遂发生了抵制日货运动。先生与多人响应这一运动，首先把自己的衣服、文具什物等日本货，全部烧毁，努力宣传鼓动，使落后的蒙文学堂成了进步的学府。

一九一四年，先生毕业后，担任专职编辑员兼奉天省翻译书记，继续编辑了很多蒙文教科书，并出版了“哲里木盟十旗劝学文”等有关振兴教育的材料，散发各旗。

创办学校及其影响

一九一五年，先生认为促进文化必须从创办学校入手，徒赖书本宣传，终属无济于事。故毅然辞去编辑职务，回旗着手建校工作。当时，各地富有人家都成立私塾，收他们的家族子弟入学，而穷人和汉人子弟没有机会求学。至于正规学校，在整个内蒙古广大地区内，除土默特旗小学及喀喇沁右旗“崇文学堂”而外，其他各旗没有一所正规学校。

先生回旗时，前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已死在外蒙，丹巴达尔济继承王位，他极力阻挠建校。先生坚持自己的主张，向人民群

众宣传设立学校的好处，又很得其父多翁的支持，划出二十七屯的亩晌，作为学校经费，故在同年秋，于西扎哈气成立了东部蒙古第一所“科尔沁左翼前旗公立蒙汉两等小学校”。多翁也辞去管旗章京（注8），作了住学校监督。

学校招收蒙汉男女学生七十余人，大多是贫家子弟。他们都剪了发，脱长袍，穿制服，唱起“八月十九武昌城起了革命军”的歌曲。先生在农村，亲见封建王公和土豪劣绅剥削劳动人民的残酷行为，便作“悯农歌”、“勉学歌”教学生们唱，暗示：牛鬼蛇神，一时横行，我们要立志不懈，奋勇斗争。因之，遭到王公和土豪的反对，目先生为“叛教徒。”他们造谣说：“这是洋学堂，准备把大家的子弟送去当兵。”又说：“男女混杂成了什么体统？学汉文、汉语，将来都要变成汉人咧！”故意不交纳学餉（学费）纷纷叫回他们的子弟，重新成立私塾，污辱学校教师，使学校陷入困难状态。即使如此，也丝毫没有动摇先生把学校办得更好的决心。在先生的努力下，人民群众自动前来交响（费），学校有了教室，也有了宿舍，不但有了蒙汉文报纸，还挂起了地图。功课方面，有蒙文、汉文、算术、珠算，有史、地、音乐，还有修身、经学、百家姓和庄农杂字。实际上，他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反帝反封建教育。每逢先生上课，群众也到窗外听讲，终日不散。他们称颂道：“二先生办学堂，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我们！”

先生每天除上常课，领导学生上早晚自习各二小时外，还改作业，编印讲义，坚持学习。某夜，因学习工作时间过久，曾被煤油灯熏倒，烧了右臂，自此，得了严重的晕倒症。学生中也不断发生疾病。由于乡间求医困难，先生又钻研时令症及风土病，并出高价自行配制日常用药数十种，药性强，威力大，不但解除

了学生的疾病痛苦，也给蒙汉贫民提供了方便。先生还设了“柏园书室”，乘暇整理藏书，得满、蒙、汉、藏文书籍数千册，向外借阅。各地群众也有不远数百里前来抄录、阅读的，书室成了群众性的图书馆，传播文化于社会。

一九一六年，博彦满都毕业归来，当了教员，先生与之商定扩充学校，并从沈阳聘来了同学王东藩，增加了英文课。又从旗筹治局兵营借来了“九音号”，每逢天气清朗、整队出发，作短足旅行或参加附近的喇嘛庙会。

在这以前，人们把送子入学视为畏途，有的将儿子送到喇嘛庙当喇嘛。不久，学校声誉为远近所周知，甚至远在数百里外的科尔沁左翼后旗及康平、法库、彰武等县的居民，也把子弟送来入学。影响所及，那些送子当了喇嘛的父母也纷纷把儿子领回，送入学校。从此打破了蒙古人家“辈辈出喇嘛”的陋习，学生人数一时增到一百五十余人。在那蒙昧、黑暗的时代里，能办得出这样一个学校，实乃极为不易之事。先生前后保送两批毕业生入奉天省立第三（在沈阳）、第四（在郑家屯）高级中学读书，因而渐渐掀起东蒙各旗成立学校之风。哲里木盟和奉天省以先生对文化教育事业有功，先后报请北京政府，颁给嘉禾章、大绶嘉禾章和文虎章五枚。

参加国会，拒绝贿选

先生的思想初为佛儒溶合，进而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代替，在当时是进步的，很为人民群众所拥护。一九二〇年哲里木盟十旗选举国会议员时，四个名额虽被王公完全占去，先生亦被选为候补议员。至一九二二年正式补为众议院议员，乃放下教

鞭，参加了国会。当时军阀当政，主张在蒙古地方设立热、察、绥三省，先生乃约蒙汉议员多人联合反抗，说：“蒙古民族乃祖国的一员，只有扶助，才能奠定国家统一的大业，蒙古设省，不啻消灭蒙古，共和何云？”提出了振兴蒙古教育、改组盟旗的方案。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军阀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迫令国会进行总统选举，先生坚持护法，反对开会。此时孙中山先生派人到北京欢迎议员南下，先生遂参加护法团至上海及江南各地，展开了护法运动。

先生在京时，继续收集各地书籍，至此又参观了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因叹道：“蒙古各旗在这一方面落后得太远，现在国不成国，振兴蒙古文化教育的责任，落在我们头上”。不久，国会议长吴廉伯通电全国，召开“制宪会议”。先生回到北京，始知“制宪会议”原为贿选总统。此时，军阀头子曹錕打算攫取总统，派直系山东省长熊炳奇到北京，在大石桥设立了议员俱乐部，公开宣布每张选票银洋伍千元，大选出席费五百元……，该款须于总统选出后三日付给。先生闻之，愤然大怒道：“在此魍魉世界，牛鬼蛇神当权，贿赂公行，甘受外敌操弄，置国家大计于不顾，这是我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丑事。我受人民委托，怎能干出这种违反民意丧权辱国的事情。”乃拒绝贿选，退出国会，回到东北。当时参议院议员宾图公爷博彦德勒格尔，当上了贿选使者，他认为拉得先生一人，便可以拉去更多的人，就满怀信心地以巨额贿款前来引诱，并说：政府将封先生为辅国公。先生毅然拒绝，没有参加那个臭名远扬的“猪仔国会”。

创办东蒙书局、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一九二六年六月，奉天省当局闻先生在沈便聘请为咨议，要求他提供有关蒙旗应兴应革事宜。先生接受其议。说：“蒙古远在忽必烈时代尚且创造了文字，推行了文化，降至清代，只翻译佛经，禁止蒙、汉两族在文化上的沟通，致使蒙古人徒尚清淡而缺乏国家观念，成为时代的落后者。今者东西方列强，方以我国神圣领土作为他们侵略对象，而国内有志之士，亦以振兴教育，促进知识为己任，前仆后继，勇跃提倡，吾辈若不提倡文化，教育青年，将何以与国内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巩固国防而促国家于富强？”便罄其所有，着手创办蒙文书籍的出版事业。得各方面的援助，于一九二七年于沈阳南关（奉天省农会）成立了“东蒙书局”。对出版事业，先生是门外汉，但他遍询有经验的人，初步购置了石印版，同年冬接收了前吉林省“蒙文白话报社”的铅字和一台印刷机，但都不合现代规格。先生乃苦心钻研，创造了“东蒙版”蒙文字铜模，铸了三、五号铅字，购买新型机器，开始铅印书籍。但由于经费不足，未能接上电源，始终轮流脚踏，艰辛勤苦地从事他的出版工作。

先生感到新时代蒙文教课书的缺乏，首先出版了蒙文教课书六册。这个教课书以传播新时代思想为中心，采用童话和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既易记忆，又便使用，切合蒙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一时颇为社会所欢迎。同时出版了公文召格根的“谴责诗”一书。它是民间诗歌体裁，每句首字、尾字皆成同一音韵，每句所用之字，虚实相互映照，最为精炼出色。特别在内容方面，无情地讽刺和揭露了王公、喇嘛的虚伪、狡诈、狠毒，欺世害人的罪行。先生出版此类书，有其深远的用心。其次，鉴于蒙古地方工

具书和文学理论书奇缺，又出版了《幼学必读》和《吉如肯·妥里德》（蒙古语法）。并同其友下了很大的决心，以三年的时间，修改增订了《三合便览》（注9）、《四体合璧》（注10），并新编了十万字《蒙汉合璧字典》，《四部成语》等工具书，准备付印。

先生以毕生的精力，搜集民族文化遗产如：《蒙古青史》、《青史演义》、《黄金史》、《蒙古源流》、各种缮本的《蒙古秘史》、《他如格斯尔传》、《一百二十老人语》、《青旗》、谚语、谜语等民间口头文学及木版满、蒙、藏之书籍，不下一千余种。有的已经修定，有的计划修定。准备一一出版。先生又说：

“在继承民间遗产的同时，更应吸取先进的汉族文化。”故搜集了古典小说，如：《三国》、《七国》、《西游记》等类书籍的译本六十余种，并译就《清史演义》一部。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工作更感兴趣，他说：“蒲松龄的作品，文字精炼，且每篇文章都有刺激时政和激发世人觉醒的作用，这是它的特色。”因出版了《选译聊斋志异》（注11）四本，共一万册。从此，先生运用了丰富的蒙古语汇，发挥了自己的才能，用精炼的笔法，反复切磋琢磨，每因一字不妥帖，便废寝忘食，力求将原文风格，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是近代蒙文读物中少有的佳品，人们把它当做学习语言的典范来阅读。

还有一些为先生特别关心，认为应尽先出版的进步书籍，如：《国耻小史》、《黑奴吁天录》、《波兰灭亡记》、《印度灭亡记》、《扬州十日谈》、《外蒙古革命史撮要》等书，终未得军阀政权批准出版，先生引为极大憾事。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在沈阳召集了哲里木盟十旗王公会议，因先生与一些有志之士提出发展蒙旗方案，提请

大会决议，从此各旗在整顿政务、振兴教育、发展经济上，有了新的方针。

同年秋，先生召请各地热心教育的人士及在沈阳学习的蒙古族学生共五十余人，于沈阳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启发知识分子对文化事业的关心。当时，其友莫德惠出任奉天省长，着手清丈蒙旗既已开放的土地，决定将所征租赋，归省、旗两方，四六提成。先生与莫商量：“蒙租是旗民大家共有，若落在王公手里，适足以助长他们的奢侈生活；相反到了人民手里，很可以做些有益的事业。”主张以各旗提成的十分之三，做为兴办教育的费用，莫甚为支持。各旗青年闻之，亦纷纷出头成立了旗教育局。该款尚未拨出，莫已他去，数年计划，竟遭王公反对，终成泡影。先生愤恨道：“缸罐之属，早晚破碎；王公败类，注定消亡。”不久，旗内人民组织了农会，掀起了反抗宾图王的运动，先生全力支持，终将这个残暴的封建主打倒。

同年秋，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蒙旗处，并在沈阳成立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由该会敦请先生负责“蒙旗旬刊”翻译出版工作，并请他兼“蒙师”的教师。先生乃将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工作结合在一起。每天到“蒙师”上课，传播进步思想，刊登时代性的文艺作品和“蒙师”师生所写剧本及讲演稿，又应沈阳城达尔罕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二小学校的邀请，前往上课。回到家中，上了版和译好的稿件，都等待他去审核。他一面听取日间的情况，一面布置明天的工作，直至深夜，仍不休息，终年如此。

一九三四年秋，吴鹤龄在南京政府搞出卖民族利益勾当，打算让先生去南京政府教育部担任工作。吴的原企图是：其一，打算吸收先生于其集团，以提高其在蒙古社会的威信；其二，

吴与国民党内的假克兴额（原名李指南，是喀尔沁右旗久居北京的流氓，当先生拒绝贿选，退出国会时，他却冒名顶替，参加了国民党，当上了中央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形成两派，他久欲利用先生之名打倒对方，以利他操纵蒙古事务。对此先生乃嗤之以鼻。

先生的生活和作风

先生为人，不阿谀、不苟且，有正义感，不为名利所动。平时不苟言笑，和蔼而又严肃。生活上极俭朴，布衣粗食，喜好饮酒，但不过量，没有官僚习气，不隐讳自己的缺点。见人疾苦如己受，在京在沈，救济了很多的贫苦学生。听到亲友有困难自动筹款协助。书局成立后，生活困难的青年，听说有了蒙古人自己的工厂，不远千里，前来就业。先生对他们爱护如己子，耐心教给技术，帮助学习文化，还保送一部分入学。先生还能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他人，如喇锡僧格、包益斋、付拉喜等，甘愿积年累月地陪同先生作艰巨工作，始终不懈。先生一向不歧视其他民族，有一个叫张文义的人，家贫、耳聋、生活无着。友人介绍他到先生的工厂，先生乃慨然收留，予以照顾，其后又为他安家立业。张跟随先生十几年，一直到死，不愿离开。

其时，蒙古文化落后，所印书籍，堆满屋内，推销不了。有人笑先生过迂：拼命地印那不赚钱的东西，是为什么？先生乃语重心长地说：“文化事业，对人民群众有最大的贡献。不用十年，我所出版的书，将布满蒙古地方，对启发民知，将起大的作用。我的工厂也将成为具有更大规模的工厂，而新培养出来的子

弟，也将成为优秀工人。将来的事业是光辉的，贡献将是大的。再者人生不只是为生活，应该为人民群众作点好事。这就是我所孜孜以求的公众利益，而不是什么庸俗的金钱利益”。由是先生愈为众人所崇拜，称之为明远先生或“克·巴克西（老师）”。

先生住所成了变相的“蒙古会馆”。远地来沈的人们，都以到书局见先生为快。他们每将各地珍贵文化遗产，献给先生，以表感激之情。每逢假日在沈的蒙古名流、青年学生、喇嘛、医生，都聚到书局。有时成了新旧两派的辩论会，有时成了反对王公和军阀的大集会，有时成了反对喇嘛和宗教迷信的会场。每逢辩论激烈时，先生一言一语很能鼓励其进步的一方，批评其落后的一方，使人们悦而诚服，给以极大的启发。

先生习字初临柳体（注12），其后依其性格的发展，不论在汉字或在蒙、满字方面，都成为一种独特文体，其书法熟练，别人很难仿效。在著述方面，有讽刺王公和喇嘛的寓言《四十年日记》、《柏园随笔》（现仅存“杂感诗”、“悯农歌”、“勉学歌”、“拜活佛”、“鄂尔罗斯旅行记”等诗篇）。晚年自号柏园老人。

“九·一八”前夕，先生和各地热心人士，联合一气，正将既已出版的大批书籍运到海拉尔、洮南、突泉、郑家屯等地向人民群众发送时，发生了事变。沈阳首先陷落，早已被日特所注目的这个书局，也遭到了封闭。先生尽生平之力所开创的出版事业和搜集的东部蒙古文化遗产，也和东北国土一同受到破坏摧残。

搞蒙文教科书及其失明

一九三二年，日伪在哲里木盟故地区成立了伪兴安南省，为

便于操纵蒙古人民，决定对各旗用蒙文传达命令，于是强迫先生离开东蒙书局，担任伪省秘书官职务，先生对此感到非常痛心。日伪进一步诱惑先生出任伪兴安西省民政局长，先生拒不接受。不久，伪满蒙政部在长春成立蒙文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伪满新京），又令先生去做这项工作。先生以为在教育工作中，或可以渗透自己所抱的希望，兢兢业业地对待这项工作，因而每因一字之去存，和日伪相持，经年不决，他说：“虽一字之微，也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头可断，此志胡可动摇？”日伪每以要对迟误出版负责任来威胁，先生据理力争，丝毫不为屈服。日伪推行日语、强迫人们学习，先生说：“铁石木块，不适于身；敌言敌语，不适于口。”拒而不学。有人为讨好日敌，穿所谓“协和服”，先生仍着长袍大褂，自行其是，且说：“我们中国人有中国服，为什么穿那亡国服”？他目睹伪蒙古官员从长春去郭尔罗斯前旗途中的种种丑态，作了《郭尔罗斯旅行记》，骂日敌人小器量小，是难善其终的“奥帖”，骂伪“协和会”为“蝎虎会”，骂伪“兴农合作社”为“倾农合作社”；把他们所谓“自愿出荷”，比之为明代的“乐输”。见鬼子给人民吃了橡子面和豆饼，便大声慨叹说：“斯日易丧，余及汝偕亡！”有时口吹长箫，声音抑扬婉转，借以发泄蕴藏着的无限悲愤。先生的言行引起日伪注意，乃加以迫害，先生更为之郁郁痛恨，久之，竟使右目失明。

创办蒙文编译馆

先生一直计划恢复他的出版事业，但一目失明，知难以实现，大失所望。正好有奈曼旗卜贺克什格（梁翠轩），准备在开

鲁创办蒙文书社，先生闻之，便将东蒙书局所有机器和财产全部送给卜氏，将极大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且以此感到无比喜悦。

一九三九年，伪满政府借口蒙古各旗在开放地区设局收租，诸多不便，便迫使蒙古王公作了“蒙地奉上”，实际上将开放蒙地的权利，彻底地收归伪满国家所有。他们诡称由伪政府一次发下一笔基金存于银行，蒙旗可以年年提取息金，除一部分作为王公生活津贴外，其他大部分可以办理人民事业。因之，伪兴安总省各旗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成立“蒙民厚生会”，伪满锦州、热河两省各旗于锦州成立“蒙民裕生会”。一九四〇年“蒙民厚生会”拨出专款，邀先生前往创办“蒙文编译馆”，从此，先生又搞起编译、出版工作。他首先针对日伪既已强制出版的教科书，出版了名为“辅助读本”，实际上是丰富其内容，发扬民族性格和展望将来的群众性读物，一时颇为各界所欢迎，同样也引起日本特务注意，从而特务机关直接监视该馆工作。先生因旧恨新怨一起涌上心头，一怒又使左目失明。至此，人们又推崇先生为蒙古“瞽叟”。先生正在退休中，东北得到了解放。

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及其“毛泽东主席万岁颂”

一九四七年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主席誉先生为民主人士，过去曾为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派人邀请先生在教育部担任参事工作，并予以优厚待遇，让他在家休养。先生感激之余，要求政府给一贡献力量的机会。因之由政府派干部到先生家探讨解决有关蒙古历史和蒙汉文翻译上的疑难问题。先生对这工作

兴趣很浓。提出解决意见，最后又译出了《六部备要》一书。

先生一边工作，一边向同志们学习共产主义革命道理，他激动地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内蒙古人民得到了自由，多少年来所向往的自治政府也成立了。不到一年，创办了这么多的小学，成立了十几所中等学校，出版了数十万册教科书和各种新闻杂志，文化教育及各项事业也都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回忆过去，看看今天，怎能不使人兴高采烈而感激涕零？我年已老，且双目失明，不能给党和人民贡献什么力量。但我幸运地听见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坚信全国人民一定能得到解放而过自由幸福的日子，我虽死亦无憾了！”因作“毛泽东主席万岁颂”。今其女记录如下（由每句第二字，组成这一题目）：

不毛之地，
功泽均沾；
远东宁谧，
民主新建。
衽席同登，
亿万欢欣；
永岁奠基，
庆颂无边！

先生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于乌兰浩特病故，享年六十二岁，由人民政府装殓，葬于归流河曲之阳。后来故人为之立石于墓前，文曰：“科尔沁克兴额先生之墓”。其所遗珍贵文献，已由家属奉献于人民政府，至今仍为内蒙古图书馆和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视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且极珍贵地保存着。

（一九六四年八月）

注:

1. 台吉——旧社会蒙古贵族的称号。

2. 梅伦——蒙古官吏名称。

3. 八旗人民——随公主下嫁的陪送人。

4. 柳条边——即边墙意。清初，为防蒙古侵犯，插柳结绳，以定内外，故称柳条边。

5. 昌图厅——即今辽宁省昌图县，清朝时，厅是一种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划。

6. 寒汗症——病名，西部区俗称出水病。

7. 安奉轻便铁路——安东至沈阳的轻便铁路。

8. 管旗章京——蒙旗官吏名称，其职责为在旗扎萨克及协理台吉指挥下，管理全旗行政、司法和军事。

9. 《三合便览》——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字典。

10. 《四体合璧》——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的字典。

11. 现仅有完整的一部，在内蒙图书馆保存。

12. 柈体——柳公权书法体。

吴桐小传

杨令德

吴桐（一九〇一年——一九六二年），字子琴，回族，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是一位杰出的拳术大师。他的祖父吴英，叔祖父吴耀；都是有名的拳术家，对于拳术三门（“八卦”、“形意”、“太极”）中的“八卦”，有独到之处，器械中的“长枪”也极为精湛。他幼时即由其叔祖父亲自传授，练就了“八卦”、“长枪”。在归绥中学毕业后，到北京住体育专门学校。这时他已辛勤练习“八卦”将近二十年，有很深的造诣了。在北京上学期间，拜于“太极拳”名师吴剑泉先生门下，由于他有了“八卦”的根基，又加他始终练功，坚持不懈，所以几年的功夫，成为吴剑泉的得意门生之一，尽得吴先生的“太极拳”真传。从此，他的拳术更为精进，卒至后来成为“太极”拳的巨擘之一。在北京毕业后，即回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原绥远各中学任教，培养了不少弟子。后来他又当了多年绥远省国术馆馆长。

抗日战争以前，他还从当时在归绥中学执教的另一著名拳术师荣连升先生处学到了荣的“阴把枪”和“太极剑”。因为家学渊源，由“八卦”而“太极”，他的造诣已深，功夫已成熟，所以对于“阴把枪”、“太极剑”也有很大发展。这三种祖国拳术的宝贵遗产他是不愧为继承发扬而光大了的一位杰出的人材。

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张之江主持的全国性武术比赛会，当时称为“打擂台”。吴桐在擂台上同一位山东拳术师对阵，吴桐的老师吴剑泉先生当时在台上为评判员，对方为山东大汉，体壮气粗，吴桐与之相比，似显得瘦小些、弱些。吴桐在对阵前亦稍有怯意。经吴剑泉先生指点，嘱其务持冷静，以太极拳之“柔”克对方之“刚”。对方果然系以猛冲猛扑之“刚”劲出手，吴桐则运用太极柔术，伺隙猛踢对方于台下，致对方伤重死亡。从此吴桐以“打擂台”获胜而名扬一时，国民党当时竟以人命为儿戏，吴桐亦深为后悔。此后即不再与人角力矣。

本来吴桐幼时性情暴躁，身强力大，极好打架，小朋友在一起玩时，他总是头，领上一群小孩子，到处同别的一群小孩子打仗玩，有时简直是石子乱飞，真正硬碰硬地打起来，他的石子几乎是百发百中。后来上了中学，学生和军队打架，他也往往是领头的人。可以说，他青年时期是一个暴性子、好勇斗狠的人。可是当他在北京拜于吴剑泉先生门下，学了“太极”，而且造诣较深，特别是“打擂台”以后，就变得非常温和起来。真是虚怀若谷，谦谦君子，不知者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身怀绝技，“打擂台”也是无敌的。古人说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不一定靠得住。可是吴桐的拳术，却是愈学愈精，而达到变化气质的境地了。

他在拳术上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有两点是值得人们学习的，第一是他的勤学苦练，真是无间寒暑，数十年如一日。幼年从他叔祖父练“八卦”，每天都是午夜而起，在一个地窖里练，练枪是每天傍晚在院子里，后来几十年他始终保持这种不断地练功夫的习惯，成为常课。所以他的功夫深，技术精，成为一时名手，是他的辛勤劳动，艰苦练习取得的。他的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第二是他的谦虚和传授别人学“太极

拳”而从不隐息的精神，只要有人肯学，他就认真地教。请他是如此，有时是亲自上门去教，不论机关、团体或个人，他的循循善诱的教法，恨不得把他的全部本领都教给人的那种精神，有许多人是会感受很深的，总的说来，学不厌，悔不悔，这两句话，他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

他的拳术虽然有了成就，但他的成就真正得到发展，还是解放以后的事，他积极参加了一九四九年绥远省的“九·一九”起义。起义以后，他经过各种运动，受到党的培养教育，特别是他参加了土改运动，在乌盟、伊盟，深入农村，作了较长时间的工作，受到锻炼，收获很大。他常说，解放以后，回族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身，他自己也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培养下，获得了新的生命。解放以后，他到北京多次参加全国运动会，还荣获关于太极拳方面的国家裁判的职称。他看到解放以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伟大成就，看到他所专擅的拳术，也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日益发展，就更加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解放后不久，他调内蒙体委工作。他工作积极认真，教人学习太极拳也更热心了。可惜，六十年代初他就患了病，在他患病期间，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六二年国庆节他刚手术不久，还兴致勃勃地扶杖出席了庆祝大会，对人谈及他的病已好转，说现在祖国和自治区的建设蒸蒸日上，他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实在休养不下去了，不久要争取恢复工作，也要继续完成他在前几年写的关于“太极拳”和“阴把枪”的著作。谁想事隔不久，病魔竟会突然夺去这样一位雄心勃勃、技术精湛的国术家的生命。这太突兀了，实在使人悲痛！

吴桐有子女五人，都已成年，在党的关怀爱护下，分别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祖国的繁荣，子女的努力，他的弟子也有不少得到了

他的传授，他自己的专技后继有人，这些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他生前就有极其深刻的感受的。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夜）

回忆自治区老体育工作者苗时雨先生

赵允迪

我和苗时雨先生是相处四十年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共同的事业，共同的道路，使我们之间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今年是苗先生去世的第二十个年头，每当想起苗先生的一生，想到他为体育事业勤奋工作创造的业绩，我总是浮想联翩，非常激动。也总想写篇回忆以表思念。今日作此拙文，料难全记其辗转经历及众多善事，只聊表寸心，权作对苗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一点祭奠吧。

苗时雨字润田，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姑子板村（今巴彦塔拉饭店一带）。他自幼勤奋读书，早在就读呼市庆凯小学时，就十分喜爱体育活动。但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地区落后，学校对体育很不重视，既没有老师，又没有运动场地，更没有器材，每天除了完成课堂学业外，精神上没有丝毫乐趣，死气沉沉地一天天过下去。他是个有生气的青年，时常到归绥一中运动场去踢足球、打篮球，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苗先生小学毕业后，考入归绥中学。学校条件较好，既有体育老师作指导，又有运动场和体育器材，每年还举行一次田径运动会或一些球类比赛，这为他实现向体育发展的志向创造了良好条件，每天除了完成课堂作业外，他就在运动场上锻炼身体，同时也注意提高运动的技术水平。当时归绥中学是绥远体育的先进单

位，不论举行足球、兰球比赛与田径运动会，该校总是名列前茅，苗先生是主要运动员之一，他不仅是打兰球的好手，田径项目中三铁都录取过第一名。

一九二八年，他代表绥远省兰球队到太原首次参加华北区举办的大学、中学兰球比赛，绥远省派队参加中学组。当时有天津扶轮中学、通县潞河中学、北京育英中学，此三校球队都有兰球名手。天津扶轮中学有姚恩汉（是当时国手），潞河中学有赵伯荣、吴云龙，北京育英中学有牟作云、张世荣。绥远省的球队是临时组成的队。初出茅庐，未见过世面，最初认为自己与人家水平差距太大，不堪一击。但在比赛中，表现突出，颇得好评。虽在技术和比赛经验方面不足，但在体力和勇敢顽强精神方面，并不比其它队差。经过参加这次比赛，苗先生对体育更加热爱了。

一九二九年，在东北沈阳市举行了华北区大学、中学田径运动会，绥远省组织十三人田径代表队去参加中学组竞赛，苗先生参加项目是三铁。他的铁饼成绩三十米，在中学组录取第二名。而大学组第一名的成绩也并不高，北师大赵文藻才掷了三十二米多。这次比赛以后，他更加刻苦锻炼，立志终身从事体育事业。终于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师大体育系，苗先生进校后勤奋学习和钻研，发挥其聪明才智，各项成绩都达到优秀。在学业上，他以“多能一专”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兰球技术娴熟，长于防守和进攻。在校期间，曾在一九三一年作为北京市兰球队主力队员之一，参加了华北区兰球赛，发挥出较好的个人技术水平。同年又远征东北，使东北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兰球队场场败北。特别是在大连曾战胜日本国家兰球队，成为极胜一时的全国兰球名队。

一九三三年，苗先生由北师大体育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在该校工作两年后，又被聘请到北京市市立师范学校任体育主任。施行实验性的体育教学，在该校推行美国麦克乐先生开展“体育公式”，提高学生健康和运动技术水平，成效比较显著。之后不久，又受聘于北京市立体育专任训育主任。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大举侵华，北京沦陷。此时他正回归绥（今呼和浩特）探亲，平绥路不通，他经宁夏到陕西，在陕西师大体育系任教，后因妻子留京无着，遂仍返回北京，任教于北京体专。苗先生在该校工作九年，一贯兢兢业业，其主要原因是他有很强的事业心，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立志为中国体育事业培养一些好的人材。目前全国体育战线有很多先进体育工作者，是苗先生的学生。如王士林、贾玉瑞、阎维仁等。苗先生确是一位爱国的、事业心很强的体育工作者。

一九四九年绥远省和平解放后，苗先生最初任教于绥远一中，对该校体育教学工作以及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开展劳卫制，达到了标准，居全省学师之冠。运动队训练方面，其他学校也不能相比，为社会上培养出好多的优秀运动员，为绥远省体育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解放后，学校体育工作得到人民政府的极大支持和热心关注，同时也使体育教师有了用武之地。苗先生正值中年，精力旺盛，英姿勃勃，工作热情和积极主动性空前高涨。他总是以勤奋负责的工作态度来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还经常从事早操、课外活动的组织指导工作。就是在星期日也不肯休息，经常带上学校运动队到各校进行观摩比赛，为的是互相学习，增进友谊。他这种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师表作风和发奋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是他

在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之主要原因。

一九五三年，随着绥远省体育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呼市体专，用以培养体育人材。教育厅聘请他担任该校领导工作。体专初建是平地起家，要什么没什么。经他积极筹备，使得体育师资，运动场地，各种器材得以落实。为了解决招生问题，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由于当地学生，对学体育缺乏志向，够条件的学生不愿来报名。苗先生在各校经过动员，耐心教诲，说明培养体育人材的重要意义，使部分学生思想逐步转变，经过反复作思想工作，总算录取三十名学生，内中还有女生二人，完成招取第一班学生。

一九五四年，绥远省合并为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将张家口师专、乌兰浩特师专、绥远省师专三校体育专业合并成内蒙古师院体育系，内蒙地区第一次建立了正规的培养体育师资人材的教学机构。苗先生担任体育系的领导职务。由于学校人员多，有它的优势，加之党对体育师资的关心培养，与组织的密切配合，促进他聪明才智的发挥，这就使苗先生在内蒙师院体育系工作期间，在体育教学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此外，苗先生在体育理论造诣方面进一步得到完善，他认为培养优秀的体育教师，内部因素是主要的，同时又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是主客观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所以应发扬成材优势，克服阻碍成材的不利因素，从而促进人材优势的积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优秀的体育教师队伍，为实现党的教育方针而努力奋斗。苗先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夜以继日地奋斗，培养出一大批体育师资人材。最后，终因积劳成疾，在一九六四年过早地去逝，这是内蒙体育事业的损失。

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教育，也由于苗先生个人的不断努力，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党和政府也给了

他很高评价和应有的荣誉。他曾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担任过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内蒙代表团的副团长，曾担任过内蒙古体育学院的副院长和内蒙师院体育系教授等职务。

苗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我却时常怀念他，特别遗憾他的过早去世，若苗先生在天有灵，看到如今中华体育和其他各行各业奋起腾飞的大好形势，他将会得到莫大的快慰。

（一九八四年）

回忆我的父亲达理扎雅

达 楷 芬

我父亲达理扎雅原是内蒙古阿拉善旗世袭的第十代亲王，在我祖父塔旺布力扎拉逝世后，于一九三二年继承了阿旗扎萨克亲王爵位。其间经过了国民党统治时代，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当时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等搞所谓的“西蒙自治政府”垮台，最后因与德王意见分歧（德拒不向人民投降），乃分道扬镳，与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及旗内正协理罗巴图孟柯、副协理罗永寿、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一起率阿旗官兵举行起义。

解放后，我父亲被任为巴盟盟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八年五月被揪回阿拉善旗批斗，不数月即因备受折磨而死去。十一月十八日这一天，是我父亲含悲弃世的日子，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我父亲虽然出生在封建阶级家庭，并且承袭了王位，但在担任阿拉善旗扎萨克的十几年中，为了保障民族的利益，备经忧患。在日本侵华期间，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屈服，当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解放的时刻，他当机立断，毅然高举义旗，归向了人民。特别是解放后，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努力工作，认真地改造世界观，心甘情愿地做人民大众的一员。

现在，我写的是我父亲由“王”到“民”的回忆，并把同

父亲在一起生活时见闻所及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以作为我对父亲的悼念。

父亲的幼年时代和生活爱好

我们家虽然是蒙旗的王公、扎萨克，但由于祖辈为清王朝征战有功，祖先曾尚过康熙皇帝的女儿鹅掌公主，以后又世代与清皇室结亲，因而在北京城三座桥建有一座豪华的府第。我祖父塔王在世的时候即经常住在北京，迷恋着那里舒适而尊贵的生活，很少回到旗下管理旗政。因此，我的父亲达理扎雅也基本上是在北京生活长大的。

据老人们讲，我父亲在未出生之前，因为是第一胎，如果生下个男孩，就有个承袭王位的问题。按照我们的家规，就必须回旗生养，所以我父亲是出生在阿拉善旗的。我父亲一生下来，就交由我曾祖父的四姨太抚养（人称四老太太）。四老太一直把我父亲抚养到十岁左右，我曾祖父死了以后，才把父亲送到北京我的祖母处。此后，我父亲一直到长大成人，与溥仪的堂妹、载涛的女儿金允诚结婚，始终生活在北京，到了一九三二年承袭王位，才回到了阿拉善旗。

我家在北京的府第，其建筑规模和式样，都是仿照清王府的样子，庭堂院落，回廊画壁，极其辉煌华丽。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父亲从小即过着养尊处优，呼奴唤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极其讲究豪华的贵族生活，自然形成满身骄气、任性，根本不以什么仕途经济为重。但是由于他是嫡生长男，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颇为我祖父偏爱和家人们的尊崇。为此，我祖父特为他在家中聘请塾师教读五经、四书等旧学，不让他到社会上设立的

学校读书，以免沾染上新时代的思想，用意在维护蒙古王爷的封建统治。恰恰相反，我父亲对“子曰”、“诗云”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而对中外名人小说和史料、传记等，则广为涉猎，并且与人津津乐道。

此外，我父亲还有两项比较突出的爱好，一是爱马，一是吸纸烟。父亲爱马，经常畜养名贵种马二十余匹，并聘请养马技人专门调养。记得马号头姓温，我们都叫他温头，这人还是我外公载涛特意挑选介绍的。这人调养马的经验很丰富，对马的饲养管理、刷洗皮毛、压马调教等都很精细，深得我父亲的器重，直到回了阿旗还带着他。养这些马匹，除了要上好的草料喂养外，还得有专人天天刷洗，皮毛都是锃光瓦亮的，马的头鬃和马尾也编结红红绿绿的绒绳。当这些马在场地亮晒和牵引遛走时，人们看了无不啧啧称羨。我父亲对于马真是可以说爱护备至，除了每周规定的两次亲自走马外，平时一有闲暇便到马厩查看他的马，抚摸侍弄一番。记得我们家回定远营后，父亲一般都在王府的西花园骑马。那时我逐渐大了，父亲每次骑马和出外打猎，总爱带着我去。

我父亲另一个爱好是吸纸烟，他吸纸烟特别讲究，吸好烟不吸坏烟，经常吸的是三五牌、茄利克、大小炮台等，后来改吸中华牌香烟。他的吸烟有定量，每天吸多少烟用烟盒点数装好。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抢着给他装烟。他吸烟用的打火机，也非常讲究，千方百计搜求新颖的产品，经常调换更高级更好看的。在朋友交往的场合里，他往往拿出打火机和烟盒，与别人比高低，互相交换，觉得是个乐趣。父亲性喜干净，闲来无事，便给打火机灌油，擦得锃光瓦亮。对于吸烟用的烟嘴，更是经常擦洗得干干净净。他在这些琐事上，都是自己亲手整理，往往不使唤别人。

离京回旗，举行“承袭大典”

一九三二年，当我八岁的时候，我二叔父因骑摩托车摔伤，震坏肺部，吐血而死，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紧接着，我二婶因悲痛二叔的死，感到自己很年轻，膝下又没有儿女，尤其是在我们那种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下，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就吞服鸦片自杀了。此时我祖父因忧伤过度，也卧病不起，不久相继去世。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安葬祖父和叔婶的灵柩，一方面是我父亲承袭王位问题。对此，旗下官员认为王位不可久悬，于是派人来北平催促我父亲迅速回旗，办理大事。这样，我父亲便决定全家离开北平，同时护送着三口棺木回归旗下。当时由北平到阿旗，行程数千里，乘火车只能到达包头，由包头到阿旗还须起旱路行走，经过河套，路过银川，才能到达定远营——阿拉善旗王府所在地。

我们全家及仆役等人一行数十人，乘火车到达包头后，旗下官员早已派车、马、骆驼等运输工具等候迎接。就这样，男人乘车，女人坐轿车，骆驼驮着行李和三口棺材，浩浩荡荡地向贺兰山下大草原进发。

那时我们年幼，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山山水水，觉得非常好玩。我父亲在大家尊奉下，骑骑马，坐坐车，有时在芨芨丛中追逐野兔，打打野鸡，也显得分外高兴。

经过二十多天的跋山涉水，终于到达了我們向往已久的老家定远营（现在的巴音浩特）。到旗后，我父亲与旗府官员商讨计议，选择好吉日良辰，首先举行了祖父老王爷的安葬仪式，叔、婶二位的灵柩也同时安葬。吊唁和出殡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在旗王

府巴音浩特大庙——延福寺举行。各大寺院的喇嘛念经诵佛，拜坛行礼，全旗远近牧民都来祭奠，一时盛况空前。此外，还在我叔婶墓地树立一块贞节烈女牌楼，以表彰我二婶的“殉节”。这个葬礼持续进行了十几天，才算完事。

继之，我父亲承袭王位大典，也开始准备进行。这个典礼更为隆重，一切沿袭清朝的典章制度。在举行典礼时，我父亲穿戴翎顶袍褂，我母也以福晋的尊位，梳上蒙古头，珠翠啣档，身着蒙古长袍，腰上束着采色腰带，两人分左右高高坐在大殿中间，接受大家的朝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蒙藏委员会，也派遣大员前来祝贺，宁夏、北平等地均派有代表前来参加，真可谓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极一时之盛。

在我父亲继承王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我父亲要继承王位，我母亲也应理所当然地坐上“福晋”之位。可是，我祖母对此特别不高兴，提出异议。原因是我祖父在世时，长期居住北京城，我祖母并不是我祖父的第一位夫人。我祖母姓姜，系满族人，家庭出身贫苦，因嫁我祖父后连生三子一女，遂在家庭中自然地居于主要地位，但始终也没有名正言顺地称“福晋”。现在，我父亲继承王位后，我母亲要当“福晋”，因此她非常生气和不满。对于我母亲的当“福晋”，旗府官员一致表示赞同，这主要是因为母亲出身皇族，金枝玉叶，有其高贵而不可攀比的条件，不管我祖母如何反对，也必须依照传统办事。这样，就使我父亲处于两难地位，既不能违拗母命，又不能违背众官员的意愿。我父亲事母至孝，平时对祖母一言一语也从无违拗，对此重大问题，更不敢擅专。经过再三研究，还是屈从祖母心意，最后决定把我祖母正式尊称为“太福晋”，这场矛盾才算解决了。

整饬旗政，与日本人斗争

在我们回旗下的第二年，我母亲要生我四妹妹，同时我祖母也要回北平去，准备给我的三叔父娶亲（现在台湾），这样，我父亲便陪同祖母和母亲，带着我们，一同回到了北平。这时华北局势已趋混乱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因此，我父亲在北平不敢多事逗留，给我三叔办完婚事，我母亲也生养完毕，于是又带着我们回到阿拉善旗。我祖母和我三叔没有回旗，依然留在北平。

我父亲这次回旗后，一心扑在旗政的整顿上，他很想把旗内的人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加整顿一番。他与旗下官员日夕商讨施政计划，访问和接待牧民群众，广泛地征求大家的意见。旗政经过一番整顿，各方面大有起色。首先在教育方面，开办了两所小学，还有一所女子小学。当时在定远营，蒙汉遗龄儿童没有上学的机会，女孩子上学更是稀少。为了号召人们送孩子上学，我母亲亲自充当学校校长，我当然是第一批报名上学。影响所及，学生很快达到五六十人，学校的设备也逐渐齐备起来，以后上学的就更多起来了。

父亲当政后，深感自己文化低，在处理工作方面有困难，除了事事请教我母亲帮助外，还不惜重金聘请蒙、汉老师，每天在公余之暇，一般在下午的三、四点钟或者利用晚上无事的时间，补习文化课和读书写字。我们当时看到父亲勤奋学习的情况，在母亲的教导下从来不敢打扰父亲的学习，我们也跟着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好景不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七七”事变的前夕，

我父亲带着我去北京为祖母祝寿，并想把她接回旗内，避开北平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争的气氛。无奈我祖母执意不肯离开北平，我和父亲只好留下祖母回归旗下。就在我们回旗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发生了。从此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地发动起来，我们和祖母、三叔也就失去了联系。阿拉善旗虽说远处战争的大后方，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渐伸到绥远，继之西进到河套地区，开始逼近到宁夏和阿拉善旗的边沿地带。

有一天，定远营的城郊突然降落了一架日本飞机。机上载着四个日本人，下机后住在城外永盛合商店，据说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要求见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怕得很，没有去见他们。不料第二天这四个日本人登门拜访，硬是要求会见我父亲。我父亲无可奈何，身为一旗之主，只好在警卫严森之下接见了他们。日本人说明来意，主要是诱我父亲归顺他们。他们说只要我父亲投归日本，就可以大批物资、武器接济我们，并给我们送了好多儿童玩具和糖果。日本人的说服，遭到我父亲的婉词拒绝。继而对我父亲又施加威胁，疾颜厉色，双方话音越说越高，以至相互拍桌子叫喊起来。最后日本人的鬼域伎俩没有施展得开，就恼汹汹地走了。日本人走后，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们玩弄日本人送来的玩具，不准吃他们送的糖果，一方面怕里面有毒，又怕有炸药。同时听我父亲和母亲说，已把这次日本人来阿拉善旗的经过详情，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汇报。谁知以后却因此引出好多麻烦来！

全家被迫离开定远营，软禁银川

日本人走后不久，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出于他久

已企图吞并阿拉善旗的野心，便假借我父亲私通日本的罪名，开始向我们下了毒手。他歪曲和捏造事实，向蒋介石作假报告，并派出大量军队进驻阿旗，在旗内遍设征拔壮丁的机构，在定远营设立银行，把阿旗的经济命脉掌握起来，并把阿旗出产的皮毛、盐、碱等资源统统攫夺为己有。同时，他还在定远营取代旗政权而建立保甲制度，从而开始抓兵、要马，残酷地剥削劳苦的广大蒙汉人民。我父亲面对马家军阀的穷凶极恶和残酷压榨，据理力争。马鸿逵以势压人，通过蒋介石而向阿旗动用武力，并威胁逼迫阿旗非立即交出军权、政权不可。对此，旗内人民非常激愤，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并向我父亲要求和马鸿逵死拼一场，如果拼不过就向沙漠地带转移，一定要抗争到底。在这种严重形势之下，我父亲考虑的很多，^①主要是怕人民的流血牺牲，特别是怕背上个“投降日本”的包袱，那就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马鸿逵的哥哥马鸿宾以调解面目出现在定远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也派刘伯石来旗进行调解。马鸿宾他向我父亲百般安慰，对此事件的发生深表痛心，致使事件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深感不安，并再三解释纯系误会，又说他一步来迟，再三向我们全家表示歉意。天晓得，马鸿逵平时同我父亲表面上称兄道弟，拉扯旧关系，说他们的父亲马福祥和我祖父是“金兰之好”的换帖弟兄，我父亲又是他们老太太的干儿子，实际上总是把阿旗看作他们口边的一块肥肉，必欲得之而甘心。

就在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当中，于一九三八年春节后，马鸿逵又增派大批步、骑兵和飞机，向定远营开火攻击。在马鸿逵的大炮轰击下，我父亲不得不答应条件去银川。就在去银川的途中，我们全家也险遭不测。当时我父母和我们姐妹四人同坐一辆汽车，已经

非常拥挤，可是马鸿宾也要同我们一起坐车去银川。事后我父亲说，他当时恐怕路上出危险，因此让我们同他挤在一起，意思是要死也死在一起。果然，当行至三关（去银川必经之路）时，只听得山上大声断喝，随即扑上来一大群军队将汽车团团围住。这时，马鸿宾推开车门大喊一声：“住手！”军队一看是马鸿宾就愣住了，才未敢下手。马鸿宾马上指挥开车，我们连中午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得知，这是马鸿逵派人在三关埋伏着，预备把我们全家全部杀害，多亏是马鸿宾在场保护，我们才免遭毒手。解放后我父亲在兰州见到马鸿宾还谈起此事。我父亲说：“那时如果不是您的照顾，我们全家早没命了。”马鸿宾说：“当时知道消息太晚，没同马鸿逵见面就连夜去定远营了，不然真危险！”他还谈及马鸿逵心毒手狠的一些作法，表示很不满意。由于此故，我们一家人对马鸿宾始终都当恩人一样的感激。

我父亲和我们全家被押到银川便软禁起来。我们住在一所大院子里，门前有警察站岗，说是保护，实际是监视，在这期间，我们全家过着囹圄般的生活，行动是不自由的，无人敢与来往，如处在孤岛上一一般。我父亲对于这样的处境，感到非常悲惨和痛苦，成天唉声叹气，动不动就暴躁发火，夜间也不能好好睡觉，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被马鸿逵残忍杀害。

马鸿逵有五位太太，我母亲为了缓解与马鸿逵的关系，便在这五个太太中间密切往来，强颜欢笑地陪着她们吃吃喝喝，打牌、吸烟，还要适合分寸地赠送礼物，以博取他们的同情与谅解。应该提到，就是在这段凄惨的岁月中，我的三妹妹得了病，因为不能好好地治疗，以致病死在这里。可以想到，这对父亲和全家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我父亲这时简直要达到疯狂的程度，他终于给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写了一封信，

叙述了他在宁夏的遭遇。朱绍良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就把我父亲接到了兰州。我母亲和我们姐妹未能同行。好不容易，我母亲向马鸿逵的四太太说情，总算答应了我们走。于是母亲和我们三姐妹，便乘飞机离开银川到达兰州，重新和我父亲会合。

到兰州后，由国民党第八战区派总参议张春浦，总务处长拜襄华负责招待，生活上由他们供应。住的房子是兰州五泉山下裴建准的房子，前后门依然派有警察“保护”。

兰州八年

我父亲被接到兰州整整居住了八年。在这个所谓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山城，我们全家虽然摆脱了那种生命时刻受着威胁的境地，但过得仍然是不舒心的。因为我们在兰州，依然是处在被歧视、被怀疑、被监视的地位，处事待人必须屈意承欢，以取得国民党官员的好感。同时，父亲深知，被强制离开阿旗的乡亲父老，还深受着马家军阀的欺凌压迫，生活的困苦和精神上失却主宰还在折磨着他们。因此，父亲虽然身在兰州并出入豪华的官场之中，却时刻渴望早日回归旗下。记得父亲当时忧伤地对我说：“咱们现在是不怕半夜鬼叫门了，但何年何月可以回旗呢？”还无可奈何地说：“监视就让他们监视吧，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对我们了解的！”

在兰州期间，父亲除了对国民党官员作必要的应酬外，大部分时间是闭门读书，由于父亲为人诚厚，待人接物恭谨谦虚，日久天长便深得有关权要人物的谅解。特别是战区长官朱绍良对我父亲大加赏识和赞许，因此对我们的监视也就慢慢放松了。这也

应该说得力于母亲的良苦用心和大力帮助。为了搞好与朱绍良这个当时西北战区最高长官的关系，我母亲充分发挥了作为父亲贤内助的作用，经常陪同朱绍良的夫人一块玩乐，以及奔走于这些豪门贵胄之间，投其所好，甚至节衣缩食用来应付各种礼仪的酬酢。朱绍良夫人当时有鸦片烟嗜好，我母亲为了陪奉人家，也于此时染上了这个嗜好。就是因为同朱绍良夫人这种兴味相投的往来，经常在一起吸烟、打牌和玩乐，也从而建立了交情。这样，父亲由阶下囚跻于座上宾，也确实得力于母亲这种帮助的。

我们在兰州居住的情况当然为旗下人民所关心。他们经常来人看望我们，后来还把我父亲的卫队人员，换班调来兰州，以维护我们的安全。我父亲最喜爱的走马，这时也都送到兰州。从此我父亲在兰州的枯索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些情趣，侍弄马和骑马，又成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项内容。此外，我们为父亲心情舒畅，还经常怂恿他带我们去看戏、看电影，可是，每当旗下人来兰州向我父亲汇报情况时，我父亲便久久沉浸在愁苦之中，难得笑容。当时旗下人员专程来兰州向我父亲送报告时，为了避免宁夏当局的检查，都是直接通过沙漠经由甘肃一条山送到兰州的。我父亲每次接到报告，听到马鸿逵对阿旗人民残酷虐待的情况，便气愤不已，继之便与母亲两相对泣。那时我同妹妹达芟芬正在上中学，看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只是晓得跟着难过和流泪，但毕竟理解不到其中的道理和背景所在。

我父亲在兰州应付国民党的局面，确是一场艰难、复杂的政治斗争。在兰州，一方面朱绍良是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一方面，谷正伦是甘肃省政府的主席。这两位军政头目，虽然同是蒋介石系统的嫡系骨干，但他们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与斗争，在权益之争方面各不相让。朱和谷的夫人，虽然都是贵

州派，但一直貌合神离，反映在朱绍良和谷正伦的政治斗争中，也各有自己的一派力量。这样，我父亲在这中间最感应付困难，既不能单是顾此，又不能顾彼而失此。我们在兰州的生活一切都由战区方面供应办理，但有些具体问题，也脱离不开甘肃省政府的辖属范围。因此就必须两方兼顾，面面周到，大的事情方面是如此，生活小事也莫不考虑周到，方能应付自如，免生枝节。

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我结婚的时候，需要请最高长官作证婚人，但朱、谷两人不管请谁，都会产生意见；于是只好设法避免了这个矛盾。平日请客送礼和交际往来，也要双方兼顾，力求皆大欢喜，如我结婚时，在五泉山我们家中，专门宴请了朱、谷两家，各设一席，由父亲、母亲陪客谷主席家，我和爱人张钦武陪客朱长官家，如此设置，都有其一定的用意和分寸。我当时很不理解，后来我父亲才说：“我同朱长官关系近一点，同谷主席比较远一点，钦武同谷主席关系近一点，同朱长官的关系远一点。这样安排，他们都没有意见。”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国民党的官场中，就是一些繁文缛节的礼节仪式，也在勾心斗角之中，何况是有关政治、经济的权益之争呢！于此，我深深感到我父亲在兰州生活的八年确实应付不易啊！

蒋介石对父亲的两次召见

在兰州期间，我父亲两次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当时，父亲和全家很重视和寄希望于这样的召见。第一次召见，大约在我父亲到达兰州后半年的时间。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发来电报通知召见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是非常高兴的，以为借此机会可以直接向蒋介石面呈冤屈，从而解决宁夏马鸿逵对阿旗的欺凌与压迫问题，

并允许我父亲回归阿旗。与父亲同去重庆的还有阿旗王府的副协理以及秘书等工作人员，准备了关于日本人去阿旗的经过情况和马鸿逵派兵进攻阿旗逼交政权、军队的种种非法行为的材料。可是没想到见面后，蒋介石只问了些旗内人民生活情况，问了我父亲和家中的一些情况，而对于宁夏马鸿逵肆意诬蔑我父亲勾结日本，投敌卖国和镇压蒙族人民的事情只字不提。我父亲急欲就此问题向蒋汇报时，遭到蒋介石有意识的迴避，竟站起身来送客。这样的召见后，承蒙“恩赐”了一桌酒席，招待住了几天，我父亲不得不怅然地返回兰州。第二次召见，大约是在一九四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是蒋介石到兰州视察的时候，对部属的一次例行接见。我父亲循例进谒，更没有谈到什么。这次蒋介石到兰州，与宋美龄同来，住在兰州四墩平九间楼，宋美龄还邀我母亲吃了一顿饭。

父亲留兰期间曾两次回旗看望

一九三九年左右，阿旗群众纷纷要求我父亲回旗看一看。经过朱绍良征得马鸿逵的同意，由第八战区总参议张春浦陪同我父亲回旗一次。父亲回旗经过银川时，对马鸿逵作了礼节性的拜望，对宁夏各方面应付一番，到定远营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又由张春浦陪同返回兰州。这个所谓陪同当然是监视。我父亲去定远营时坐的是汽车，而返回兰州时为避免宁夏马鸿逵的麻烦，就由定远营骑马经过大沙漠草地到一条山，由张钦武接应换乘汽车转返兰州。经过张春浦总参议这次陪同到阿旗实际了解一番，国民党方面也有所证实，我父亲并没有搞投靠日本的事，而马鸿逵的歪曲事实，捏造是非，纯属诬陷，不过是蓄意藉机强占阿旗的地盘，扩

张个人实力而已。从此，国民党当局对待我们就比较放松，而我们的生活也就自由多了。当时日本飞机对兰州轰炸很凶，我母亲此时又得了大病，为了避免轰炸和便于母亲休养治疗，我们由兰州五泉山又搬到十里店一个小院落，住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又回到了五泉山住地。

我们在兰州居住，虽然说受着国民党当局的供应和招待，同时旗里也接济一部分，但因人口众多，当时物价飞涨，所以生活上感到困难。父亲同母亲研究，打算回旗清点一下家底，好带来些补贴生活。经过八战区的准许，因我母有病，就决定带着我回旗一趟。我在我们家里排行老大，父亲对我从小就特别疼爱娇惯，出门经常带着我，形影不离。这次带我回旗，我当然非常高兴。回旗时是由兰州坐汽车走的，这次八战区也没有派人“陪同”。路经银川我父亲必须去见马鸿逵，由我去看马鸿逵的四太太刘慕侠和老太太。众人所知四太太极受马鸿逵的宠爱，言听计从，她的权势很大，甚至可以左右马鸿逵的一切。因此，必须去拜见问候，力表亲厚，以求得缓解马鸿逵对我父亲的迫害。我当时虽然年龄不大，并且涉世未久，但也从跟随父亲经历多次危难中懂得了这些道理。刘慕侠对我也是以“义母”的姿态接待的，颇表亲爱。她不愧是演戏的出身，装出一付“慈爱”的样子哄我，甜言蜜语，问长问短，但不免有时却唠叨着：“你们现在有战区照顾了，我们也照顾不到了！”我回来把这些话语告诉父亲，我们感到这个话显然是讽刺，并且蕴含着多少牢骚。我当时就想，脱了缰的马儿，你们再也逮不住了。

父亲和我回到定远营后，很忙碌了一大阵子。旗内王府的大小官员，远在各地的牧民群众，争先恐后地来看望我们。父亲这时候真如竭泽之鱼得水，那真是高兴极了。他成天与大家在一

起，互相倾诉离乱后的情况，诉说马鸿逵对阿旗的迫害与压榨，谈论国家持久抗战必定胜利的前景。我父亲还鼓励牧民们要努力生产，团结一致，今后要密切联系，安心等待我父亲的回来。这样，父亲在旗里住了一个多月，同时将家里的财物整理一番，准备带回兰州，以补贴家用。我父亲回兰州时仍然避开宁夏，由旗内护送骑马直接通过沙漠回兰州。在起身之前，父亲给张钦武拍了电报，到一条山时住了两天，又由张钦武派汽车把我们送回兰州。

国民党中央批准我们全家回旗

与马鸿逵的斗争仍继续下去

一九四四年秋天，旗内人民迫切要求我父亲回归阿拉善旗主持旗政，抵制宁夏马鸿逵对我旗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榨。经八战区长官部向国民党中央请示，与宁夏马鸿逵联系，才同意我父亲和全家回旗。我父亲和全家人们久所期待的这一天总算来到了，但是可以预见到的种种困难也摆在眼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与宁夏马鸿逵的关系问题。马鸿逵对阿旗在政治上侵并、经济上掠夺，对此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而马鸿逵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是不肯轻易吐出的。

我们这次回旗不象过去那样旅行般的来往，而是要回而不返了。居住八年的兰州这个山城，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着一定感情的。我们道别了一些知己的亲朋故旧，爱抚地看看那些山山水水，由旗里派来的大批人马、骆驼和轿车载运着一切应用什物，开始经一条山穿过大沙漠，直奔阿拉善而去。我父亲回旗避开走银川的路，就是怕同马鸿逵这个恶魔进行周旋。可是回旗不久，

马鸿逵带着全家来定远营看望我父母，表示特别的“关切”。明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还得装腔作势地进行迎候，极力表示出亲善与友好，这个滋味当然是不好受的。

定远营这个地方，如今已经为马鸿逵的强权所渗透，政治、经济完全为他们所控制了。他以“旗县并存、共管”为理由，企图在定远营建立县治，实行蒙汉分治。这实质上是把旗政权排挤掉。由于旗内人民的坚决反对，一时不能得逞。而马鸿逵则变换一个名目，在定远营设立了办事处，推行保甲制度，实质上等于县治，从而进行横征暴敛，摊派苛捐杂税，实行征兵要马，把阿旗人民推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马鸿逵还在定远营设立银行，以经济手段操纵和控制旗内特产的皮、毛、森林等等物资，就是旗内一向开采经营的赖以维持旗政开支的碱矿，马鸿逵都眼红伸手。我父亲此次回旗，是在国民党中央同意之下而回的，马鸿逵对之也无可奈何。不过他总感到我父亲之回旗，对于他在阿旗的横行霸道有所妨碍，尽管在表面上称兄道弟，并唱着决不损害旗内利益的高调，但事实上则是时时事事与阿旗搞磨擦，必欲吃掉阿旗而后已。我父亲回旗不久，马鸿逵为争夺阿旗碱矿，就把阿旗负责办理碱运的郑礼范扣押起来，制造是非。我父亲在马鸿逵的强权之下，还是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并亲自去宁夏见马鸿逵，要求把扣押人员释放。马鸿逵也不得不保持双方的体面，宁人息事，终于把人放了出来。

当时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要地方选贤举能，由省推荐两名中央委员。在甘肃省方面，谷正伦主席把我父亲推荐上去，这就引起了马鸿逵的嫉妒和不满。为此，向国民党中央反映：达理扎雅是阿拉善旗的扎萨克，阿旗隶属于宁夏省，推荐达理扎雅为中央委员与否，应该是宁夏之事，为什么甘肃省要“越俎代庖”。由此

可以看出，马鸿逵对于我们阿旗和父亲，眼睛盯得很紧，总是千方百计加以贬抑的，总想控制在他的手下听命于他的摆布，始终也不放松一步。更卑鄙的是马鸿逵的为人。他不仅在政治上善于玩弄阴险狡诈的手段，而且在与朋友、部属的交往之中，也是两面三刀，拨弄是非，他好在河边看潮水的热闹。当然，这也符合他独霸一方总的利益。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回定远营住娘家，我爱人张钦武由西峰镇防地去定远营接我。路经宁夏时，钦武为了照顾宁夏与阿旗的关系，就去拜望马鸿逵。在共同进餐中，马鸿逵说：“你老丈人总是抱怨你不听话，性情太执拗了，硬是把偌大个盐商产业踢踏了。跟着胡宗南跑，有什么好处呢？”这分明是挑拨我父亲与张钦武的关系。对这种无中生有的中伤，张钦武信以为真，引起岳婿之间感情上的芥蒂，钦武到我家时闷闷不乐，表情冷淡，有意识地避见我的父亲，弄得我父亲非常生气。事后沟通情况，大家才知道是马鸿逵的挑拨离间。这虽然是件小事，也充分表明马鸿逵对于我们是无孔不入的，极尽其破坏之能事。

我父亲参加“西蒙自治政府” 的一些情况

在祖国西北地区面临全部解放的时刻，以德王为首的一些国民党蒙旗的高级人士，会集兰州并转赴阿拉善旗，酝酿和组织成立“西蒙自治政府”，并企望以这个事实来面对共产党的解放。我当时住在兰州，我父亲再三用电话、电报催促我回定远营去，暂避风险。于是，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兰州解放的前一个月，我与多淑

秀（白海风的爱人，现为内蒙政协委员）一同乘车到一条山，然后换乘骆驼和马经沙漠回了定远营。我回旗后，父亲曾给我讲述“西蒙自治政府”成立的经过。起因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即将垮台之际，国民党中央用飞机把德王接到南京，继而又将德王送到兰州。德王到兰州后，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何去何从，犹豫未定。何兆麟（原内蒙政协副主席）陪同德王到兰州时，我三叔达密林旺楚克也一同乘机到了兰州，要回阿拉善旗去。因此，德王便有了去阿拉善旗的动机，适逢何兆麟与我父亲旧交甚厚，于是便给我父亲写信商量这个问题，得到我父亲的同意。何兆麟陪送德王到阿拉善旗后，白海风、巴文峻等人也先后到了阿拉善旗，于是便在德王的倡议下酝酿成立“西蒙自治政府”。

我父亲从来胆小怕事，如果说以东道主的身分接纳德王暂住一时倒可以，对于成立“自治政府”这样的大事，实在不敢表示赞同。德王这个人野心很大，投靠日本和成立伪蒙疆政府之事，闹得臭名昭著为国人唾弃，如今在这个危急时刻，仍然不甘寂寞，企图东山再起。后来，德王说服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一再与我父亲商议这个问题，并说明当前极为有利的形势。理由是，我们蒙古人多少年来要求自治，始终得不到国民党的允许，如今国民党即将垮台，他本身也自顾不暇了，咱们正好乘此机会成立“西蒙自治政府”（与“东蒙自治政府”对称），要求国民党政府批准，以造成既成事实。同时，将东北流窜过来的一些军政人员，还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都收集到阿旗，以作为“自治政府”的实力。

我父亲面对这种形势，终于心有所动。他认为藉此机会把从东北逃窜到阿旗境内的乱军收容起来，收归为阿旗的武装力量，以避免他们对阿旗人民的扰害，更是非常必要的。这样，

父亲终于答应参加“西蒙自治政府”。但对于要求父亲同他一同去广州，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准许自治问题，还是坚决不去。结果德王自己一个前去广州，向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人提出这个问题，依然是遭到否定，毫无结果而归。宁夏解放前夕，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路过银川时，德王率同“西蒙自治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白海风、何兆麟、巴文俊等向徐请求国民党准许成立“西蒙自治政府”，也遭到徐的申斥，指责他们是“乘人之危”。事后他们回到阿旗还在议论不休。尽管受到国民党的阻挠，“西蒙自治政府”还是成立起来，我父亲被选为副主席。

“西蒙自治政府”成立后，他们给国民党的报告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德王亲赴广州进行活动，也无结果而回。德王由广州回来路经兰州时，张钦武邀请德王在我家吃饭，谈及此事还对我父亲抱怨：“你爸爸同我一同去就好了！”其实国民党政府此时已是穷途末路，哪里还会顾得上什么“蒙古自治”呢？

一九四九年夏天兰州即将解放，胡宗南急电调张钦武的部队向甘肃南部转移。我父亲和我一再给张钦武去电，劝阻他千万不要向陇南转移，务要以家庭孩子为念（我父亲的区防司令部的电台和张钦武部队电台每天都有两次联系），必要时可把部队撤到蒙旗来。事实上陇南已被解放军截断，根本过不去，最后张钦武即率部队转移到甘肃北路的杨林山区。此后，兰州、银川相继解放，这对阿拉善旗的震动很大。马鸿逵驻阿旗的部队，一片混乱。我父亲就把旗属的军队都调集到定远营城内，实行防卫措施，以保安全。此时，旗内的一部分人劝我父亲率领大家向北沙窝撤退，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留在定远营坚守，等待解放军的接收。我父亲这时心慌意乱，一时定不下来。他尤其是惦记张钦武的部队。不料有一天双方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我们非常着急，父亲判断说一定是被解放军歼灭

了。到夜间我母亲偷偷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消息，听说“胡宗南匪部整编骑兵第一旅旅长张钦武率部向我军投诚”，赶快把这消息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听后高兴地跑到我住的屋子里叫喊说：“钦武有消息了，已经投降共产党！”这样，我父亲才消除疑虑，排除“北逃”和“等待”的两种意见，决心率部向解放军投诚起义，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

关于起义问题也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首先遭到德王及其旧部一些人的反对。父亲与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是赞成起义的。大家虽然耐心地说服，分析利害，指明前途，无奈德王顽固不化，总是坚持他自己的一套。这样，就显然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德王为首，及其旧部，还有从东北逃窜来的部分武装力量，他们坚决反对投诚起义。有一天，德王及其从众，带着“西蒙自治政府”的印信和木牌子，不辞而别，向阿拉善旗西北方向而去。一路打家劫舍，抢夺牲畜粮食，宰杀骆驼，直到在“拐子湖”附近盘据多日，最后逃越国境，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扣捕。对于德王逃窜后所部扰害人民，我父亲非常不满，还组织轻骑武装进行剿击，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派以我父亲和白、何、巴等人为首，通电起义，并派代表到宁夏向解放军接头办理善后。这期间，张钦武在起义后由于彭总的授意，也对阿旗起义进行过奔走，这里就不多说了。至于父亲等人起义后的情况，有的在《内蒙古文史资料》中已有所叙述，也不再多作赘语。

结束语

我对父亲的回忆就写到这里吧。父亲达理扎雅作为一个封建

制度残余的蒙旗王爷，本来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我们的。但是，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他尚且能够奋力前进，跟着人民走，从一个王爷成为人民的一员。作女儿的思念父亲，对他一生的生活经历，有知必录，着重于抒发自己的怀念之情。其中有关的一些史实，不免挂一漏万，有许多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望父辈亲友多予指正，以供史家之参考。在我结束这个回忆录之时，心中不免感慨系之！如果父亲活着的话，是会看到今天国家兴旺发达的大好景况的。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党的拨乱反正，国家各方面都走上了正轨，在政治上排除掉“四人帮”的干扰，清除了“左”的错误影响，形成了个空前安定团结的局面；在经济上端正方向，进行改革，使国家走上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现在，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父亲如果在天有灵，是会含笑瞑目的！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九日定稿於呼和浩特）

忆我和父亲从黑暗走向光明 的亲历记

李秀元口述

王玉魁、赵兴业整理

(一)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耳庆密子村，旧社会父亲李海龙养家兵，雇长工，是大青山地区的一个“山头大王”。

民国十几年，大青山地区土匪四起，残害民众。一天，一个土匪在附近圪堵村抢人，我父带领十几名猎人，以火枪为武器把他包围起来。这个土匪用快枪进行还击，一人被土匪打死，其余惊悉逃跑。我父重新组织几个猎民追击，土匪因过度疲劳，在绍卜亥村休息酣睡，被我父进屋夺下枪支就地将他处决，我家开始有了武器。

不久，绥远省都统马福祥派一个姓马的营长，带着二百多骑兵来后山剿匪，听说我父打土匪勇敢，就叫带路。走在固阳卜塔亥村附近与土匪遭遇，一个土匪正要瞄准马营长开枪射击，我父看见奋不顾身上去抱住土匪，夺下他手中的武器，打死这个土匪，救了马营长。马营长深表谢意，临走时除未收缴获土匪的那支长枪外，又给留下五、六支步枪。

后来国民党叫地方上成立三帮团（系萨县、包头、五原三个方面的自卫团武装组织，简称三帮团）因我父打土匪勇敢，又有

枪支被任命为团长。

我父担任团长后，随即扩大武装，建立组织机构、规定士兵应遵守的纪律。由伯父李海云担任副团长，并让我们本家人和亲属担任连排长。给士兵规定的纪律是：1、服从命令不怕死；2、戒酒除花；3、不准聚赌刁人抢人；4、不准欺压良民子女；5、不准吸食大烟；6、不准随意占用百姓的土地。如有违者坐禁闭，打军棍，直至开除。在吸收一个新兵和提拔任用一名军官时均由我们一家决定。所有士兵战时打仗，闲暇时间给我们无代价地劳动，而部队的一切费用均由地方百姓摊派供给。除此之外，还雇了十几个长工。从此，我们家过上了养家兵，雇长工，剥削人民的生活。由于剥削大，收入多，从而向黑暗的深渊越陷越深。

(二)

帮团成立不久，包头广恒西大财主马卜子被土匪“请财神”抓走，以交出十支手枪为条件，才让马回来。他的家属很着急，要求我父设法营救，并告知土匪的住地。我父随即带领二百多人马装扮成土匪模样火速赶到土匪驻地，把十多名土匪的枪全都下了，用棉花塞住咀，锁在家里，救出了马卜子。

把马卜子接回来以后，他对我父非常感谢，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给我们每个战士赠送了景泰兰马鞍子一个，灰绒马靴、毡袜各一双。给我父赠送了万民伞一把（仿皇帝用伞制的）。然后在萨县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庆贺仪式，摆银供，请乐队，热闹非凡，一时轰动了全城。当时萨县县长兼自卫团总团长侯秉成，听到了这些赠送我们的礼物和庆祝活动，异常嫉妒和恼火。说：“三帮团”才建立几天，李海龙就有了如此之大的威风，比我这个县长

的威望还高。因此，想找机会进行报复。

当时，老百姓盛行种大烟，我们为了解决士兵的生活费用不足的问题，也种植大烟。侯秉成以禁大烟为名，带领人马来到我们烟地里用棍棒乱打，眼看着将要收割的大烟被他们全部毁掉。但我们暗处还有几十亩大烟，没被他们发现，收割完后，保管李二红偷偷地把新割下的大烟全部背到侯秉成那里告我们的状，说我们“夜请财神，日办公”，“私立三帮团”。把这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们的头上。

侯秉成抓住这点，认为报复的时机已到，要调兵来攻打我们。我伯父李海云得知这一消息，叫我父作好对付的准备。我父当时还比较年轻，满不在乎，未作必要的防备。果然第二天中午，固阳、萨县、包头的好几个区兵队来了，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区兵队的队长到我们家里，我父正在玩象棋，不去好好招待，区兵队长非常恼火，随令把我父捆起来。说：“上级有令，把你抬回萨县再说吧。”就在这时突然从窗子上伸进一支步枪拍拍地连打四、五枪，结果我父未被打中，却把他们自己一个叫花牛子的打死了。临走时，把我伯父也给捆起来了，用牛车拉上要往萨县送。他们不服，一路上用最难听的言词辱骂区兵们，队长命令士兵搬起小磨扇打断了我的右腿。看到这种惨景，我四叔李海德连夜去包头，找人想办法把人救出来。他走到萨县城西正巧遇上了以前剿匪的马营长的部下周连长，向周说明情况，要求设法营救。周连长用电话向马营长作了报告，马营长指示他很快把我父和我伯父接出来。于是周连长迅速带领全连人马向老窝铺方向出发。

区兵们走到老窝铺村南时，把我伯父从车上拉下来要处决，一连打了四、五枪均未击发（事后检查枪的撞针早已断了）没有打死。然后又用刺刀在他的两大腿上捅了三、四刀，放在车上正

要出发，周连长带领人马赶到，就把这些区兵们包围起来。区兵队长看见自己的力量不敌对方，带他们的区兵向公鸡窠子方向后退，走在半路上悄悄地向萨县城里跑回去了。周连长把我父亲送包头医院治疗，结果治疗一年多虽有好转，但没有把腿接好。他向医生再三要求给他把腿接好，医生们说：“接是能接好的，有新茬子才行，否则是无法接好的”。我父听罢，咬紧牙关，把病腿伸到门框底端，忍疼又整断了。后经医生精心治疗，他的腿很快就痊愈了。

我父的腿治好后，赴归绥上告侯秉成。但一连四年没有告倒。后来四处打听，得知归绥城里公主府有个文人叫薛其，我父登门拜访哀求帮助写告状呈子，薛给写好呈子后告诉他，必须到马都统那里才能告准。第二天我父为壮胆子喝了点酒（他本来不会喝酒的），又向别人借了一件长大褂子，打扮成一个公职人员的模样，闯进了马的都堂里。见门前吊着一个大堂鼓，他上去猛击数下，堂鼓响，惊动了都统马福祥，他慌忙连帽子也未顾戴上跑出来就升堂。我父将呈子递上，马接住呈子细阅后说：“你已告状四年之久，可我连一次也没有看到。”我父说：“禀告大人，我写过很多呈子，一直不见回文批示，最后迫不得已才击了大人的堂鼓，冒犯了大人的尊严，望大人宽恕。”马都统说：“按照本堂规矩，随便击堂鼓应重打你四十大板，但念呈子上所叙之事确实冤枉，故免打你吧，你先回去听候批示。”随之宣布退堂。

我父击堂鼓的消息迅速传开，同时也惊动了侯秉成，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不敢继续呆在县城，连夜把人马带上在萨、托二县之间徘徊辗转。不久，马福祥都统以开会为名叫侯去参加，侯一去就被逮捕。由于侯秉成民愤极大，关押不几天就被处决，从此这桩冤案宣告结束。

(三)

“七·七”事变后，固阳有个张国林，北京大学毕业后，根据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指示在固阳地区组织了一个“民众抗日自卫军骑兵游击第四师”，他任该师师长。把我父带领的第六区区兵队共一百多人枪马改编成他的三十三团，我父被任命为团长。仍原地不动住在我们地区，而张国林的师部驻固阳县下湿壕纳令沟村。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日本鬼子侵占了萨县，日伪李守信的第八、九师开往固阳一带。张国林看到他的部队已无法守住固阳，打算把他的全部人马带到河套。他对我父说：“别的团我要带走，你们这个团武器、鞍马都不齐全，留在大青山见势行事吧。”

我父按照张国林的指示，把部下分散开，士兵都化装成便衣。一天，得知日、伪蒙古军要来我们这里，连夜出发，到固阳下湿壕的东牛沟、石报兔，把长枪都藏在山沟里，把手枪带在身上。他们来后未找到我们。我们在山上转了几天，怕把长枪丢失，又把长枪都取上，白天在山上转，黑夜下山回家，就这样一直在山上转了几个月，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了日本人改编。

(四)

一九三八年以后，随着武装的逐渐扩大，相应地构筑了不少的防御工事。我们先后在村庄附近的山顶上和大门口构筑了碉堡七个，碉堡与碉堡之间都沟通了暗道。并从屋里院里的花池下面

也筑了通向山顶碉堡里的暗道。还构筑了从屋里的暗道通向屋后大山里的暗室一个。因此，鄂友三到处鼓吹说：李海龙把他们附近的山头全挖空了，山里尽是洞，进去就不要想再出来。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山洞，不过不仅把鄂友三吓住了，其他土匪也不敢轻易进山骚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萨县后，日伪萨县副县长丁绍先旧日与我父认识，他给我父写了一封信，要我们把队伍归顺了日本人，并且还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任何损失。我们正在犹豫不决之时，丁接着又接二连三地来信，要我们很快决定。于是我父提出归日后：1、属管不属调；2、不离开大青山；3、不能委派外人来领导。派韩副官给送去，丁绍先表示同意。并把 we 改编为日伪包头伊盟公署直辖第三警察大队，任命我父为队长。不久日伪萨县警察第三署署长宫玉林要给派一个副队长，我父表示坚决反对，没有派来。

(五)

我们改编后，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奉命从耳庆窑子村出发，到后山一带剿匪。这里有蒙古军的一个连，经常冒充土匪窜入村庄“请财神”要大烟，交不出大烟就割耳朵、割鼻子。一时老百姓惊恐万状，提心吊胆。一天黑夜，我们管辖地区的路丑挠、董兰生等人被请“财神”，要很多大烟，他们的家属要求设法营救。我父带领骑兵在固阳大庙的掌不浪沟与鄂友三部下周贵堂连相遇，没打几枪把连长周贵堂和他的部下八十多人全部活捉，处决在掌不浪沟。

同年六月间，鄂友三的一个旅长吕恒元，带领十几个人住在

我们附近的胡芦什太村，和老百姓要大烟，没有就吊打。我们带领人马把他们包围缴械，把吕恒元押到永合太村山口子枪决了，其余的官兵在返回的路上也逐个处决了。从此，鄂友三就和我们结下了深仇大恨。

(六)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国民党把我们的部队又改编为绥远省大青山地区“抗敌第二团”，这是一颗要收拾我们的信号弹。虽说我们独占大青山号称一霸多年，但和鄂友三结下深仇大恨，如果找不到一个牢固的靠山，总有一天会被他们吃掉的。

当年冬天，贺龙司令员攻打包头时，我父把伯父和我叫到后洞暗室里说：“现在八路军正在攻打包头，我们和八路军没有结下什么仇恨，如果这次打开包头，我们就出兵剿灭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向八路军表一份诚心；如果打不开包头，撤走了，先取得联系，见机而动。”并派亲信刘平（河北人）赴萨县城内联系，经他的旧友云昌秀引见，和共产党绥西专员李维中谈了我们的意图，李维中当即表示欢迎，让云进行两头联系。于是云昌秀去耳庆窑子和我们接头。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提意请云昌秀、李维中写个证明。李向贺龙司令员请示，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过了几天云昌秀又来，即带来贺龙司令员的“任命状”和李维中的证明信件，还有几张八路军奉劝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不打内战的布告。

贺龙司令员的“任命状”和李维中的证明是：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任命状第九〇五号

兹任命李海龙为我军大青山地区招讨司令特颁此状

司令员 贺 龙 副司令员 张宗逊 政治委员 李井泉
副政治委员 武新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兹证明李海龙部已与我军接洽编为绥远省招讨师。

特此证明

绥西专员 李维中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此后李维中和我们还有过几次信件联系。这是我们开始和共产党接触。

(七)

一九四七年元月，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以保安处命令我父把那些年轻力壮、枪马齐全的兵力编在察素齐的骑四师，年老体弱的留下，在地方上搞自卫。

据此，我们就挑选了一百多人由我带领到了察素齐，编在骑四师暂编一团，团长乔二安、副团长杨小三，我任连长。后来，又把我这个连分散开花编在其他连里。这样做是提防我们逃跑，我也调在团部当了少校团附。不久，我写了请假条要求探家，过了两个多月才批准，这次请假回家后就再没回去。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回到家里与父亲又扩充了四十多人，把原来家里偷留下的一部分武器归了东公旗赵福海。我们这几个人要了一个番号，编成“二大队六中队”。我父任中队长。这样我们又开始过着立杆为旗，在大青山为王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前后，萨县、固阳的县长、警察队长、自卫团团

长同我们发生矛盾勾心斗角，猜忌倾轧。在一次县长行政会议上，向董其武告我们抗拒公粮，包庇壮丁，私通八路军。董其武即命令固阳、武川、萨县三县的警察，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出兵攻打我们。

萨县的警察是由井得水带领。原来井是我们部下的一个小队长，后来他带了四十多人叛变，投靠了鄂友三。鄂将他介绍到萨县警察队当了一个队长。井对我们内部人员装备、防御工事了如指掌，所以他打我们是很积极的。固阳这次除杨迷窍带警察打我们，还有兰帅带自卫团共四路出兵。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在二月十五日去东公旗找到赵福海要求一旦打起来要派兵支援我们。赵当即表示到时可派一百骑兵支援，并送“七九”、“六五”子弹各一箱子。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晚十二时许，我的朋友杜二派人报告井得水带队伍已到附近村里，我立刻加强警戒，并给我父（因他后来住在巴总窑子）和得胜沟门我表兄弟徐庆和东公旗赵福海写信求援。信写好后就派人往出送。这时，就和警察们打了起来。我们在村北山顶的炮台里配备一挺轻机枪，一支步枪、一支手枪，双方一直打到次日中午，我的叔伯兄弟李秀珍有点动摇，问我怎么办？我说：“把武器交给他们，当兵的好说，咱们可不行。宁叫他们打死，也不能当他们的俘虏。”我俩说话间，看见警察们停止了打枪，向后撤退。这时东公旗派来了五、六十名骑兵支援我们。他们带队的对我讲：“你这里已经解危，去看看你父亲那里怎么样？”我走在半路上，碰见了我父亲，他说：他那里没有问题。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我们的队伍、家属人心惶惶，七零八落。我找了赵福海，对他讲，我的弹药已经打完，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步

路，投奔八路军了。赵福海给了我们一部分“六五”和“七九”子弹和一些手榴弹。我们把队伍带上，连夜从大青山里取道小路向东引进。路经红崖渠、老毛坝、孤山等地。走到岔沁村时，碰到了董其武部下师长王有功的一个团长刘龙镇。他说：“董主席有命令，叫我把你们接回来，无论如何不能叫你们从东走了。”然后他又把王有功的亲笔信拿出让我们看。信的大意是让我们回去，保证没有任何问题。我父怕他别有用心，要董主席的亲笔手谕。当即派了他的部下向王有功报告，王又向董主席报告，董立即写信说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当晚，王有功派人把信送给了我们。次日，我们把全部人马带上去了察素齐，见到了王有功。王向董报告后，董要我们当面对面相见。王有功和他的参谋长曹免泽两人感难以理解。为什么李海龙刚一回来，董主席就要亲自接见有无意外。董主席是命令，必须和我们讲，但怕我父脾气太僵，说不好出问题。于是就把我叫去讲了。经我和父亲商量决定只去一个人，防止他们来个斩草除根。王有功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我父在临走时安顿我在三天之内好好地打听消息，如消息不好，就立即爬大青山，千万不可作了他们的俘虏。

王有功把我父带上去了归绥（今呼市），住在潘先生的公馆。他先见董其武，董表示：“我叫他们来，是和他们疏通一下关系，并且还准备重用他呢！决无别的意图，你放心好了。”我父和董其武见面后，以巧言否定了以前县长行政会议上的“三条罪状”得到董的重用，在王有功那里编了一个突击大队，我父任大队长。

当我父头天回到归绥，第二天绥远日报上就刊登了“李海龙深明大义，悔过自新”的报道，我才放下心来。在察素齐住了一个多月，后被调到麻花板参加整训去了。

一九四八年冬天，杨成武将军率领大军第二次围攻绥远，我们住在归绥的南茶坊。王有功当时兼任归绥城防司令，每日强迫老百姓在城的周围修炮台，挖战壕，十分繁忙。有一天，董其武对王有功说：“李海龙对于修筑工事很有研究，你让他多想点办法，出点主意。”王有功把我父叫去，叫帮助他修筑工事。我父亲就仿照原来家乡的办法在修筑工事方面提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建议。工事竣工之后，董其武还亲自作过一次视察，他说：“这工事筑得基本可以，重火力抵抗不了，一般轻火力完全可以抵抗。”

（八）

防御工事完工后，进一步取得了董其武对我父的信任，但我们觉得国民党灭亡，已成定局。于是派部下刘海峰（萨县人）去旗下营和绥蒙军区姚喆司令员联系。因未找到姚司令员，而和原绥西专员李维中同志又联系上了。我们提出很快把队伍带过解放区，李维中同志要先把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住地、军事设施绘个图给他送去。我们把图送去后，李维中同志指示：“你们现在要保存实力，等到时机成熟再行起义。”

我们的队伍原住在归绥城里的南茶坊，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调在归绥的麻花板驻防。因为当时这里没有热炕，我父怕冷没有来。三、四天后，他打电话要我骑马去接他。次日未等我去，他就自己步行往麻花板走。走在街上，碰上了鄂友三派出的四个人，说他们的司令正要我父去，去后就被鄂友三关押起来。为此我先找王有功，后找董其武。董说：“你父的生命我完全负责，鄂友三扣押你父的主要目的是经济问题，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了他，要他在你父的饮食起居方面给予优待，至于你们私人的事要

通过有关人员协商解决。你也去见见你父吧。”董当即就给鄂友三办事处打了电话。后来又见到刘万春，刘对我们说：“鄂友三扣押你父主要是想要点钱，你们能给他点儿钱，他就会把你父放出来的，王有功和鄂友三的关系不错，你还是请王有功出面说合解决吧。”于是我和我伯父把王有功请上到鄂友三司令部。当时十三旅的旅长高理亭也在场。高理亭问鄂友三：你把李海龙叫来怎么办呀？鄂回答说：“李海龙带领他的队伍把我一个连的人全给打死了，家属们把我攻得不行。”高理亭在一旁说：“你抓回李海龙错了。他回到归绥，是董主席亲自叫回来的。如今你不通过董主席，怎么能直接办呢？”鄂原来本想把我父抓回来后暗害，来个先斩后奏。通过高理亭的这一开导，鄂才认识到事关重大不敢妄为。于是向董其武作了关押我父的报告，董命令他必须确保我父的生命安全，饮食起居务必给予优待照顾。

我父被关押半个多月之后，王有功给我和伯父李海云打电话说：鄂友三同意我们见我父亲并把我父放出来，但有几个条件。你们去了后，他讲什么条件，你们就先答应，不管怎么样先把人接出来再说。

我们去了以后，鄂向我们讲了如下几个条件：一、买檀木棺材八十具；二、被打死的士兵家属每户发给大洋一百元；三、给每户孝布三丈，纸火若干。上述条件我们全都答应后，由王有功当了保人，我父这才被释放出来。

接出我父之后，鄂友三来了个他请客，我们花钱。地点是归绥的“麦香村”、凤林阁”，吃饭的人都是鄂友三请的将官级军官。光吃饭钱我们卖了一头大骡子还不够，又向外借现大洋一百多元。

鄂友三要下的东西限期一个月之内送去。我父亲要我回老家

投亲转友，想尽一切办法把鄂友三要下的东西拿来。

我走后，我父亲把排级以上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说：我们不能长期住下去了，鄂友三不会就此罢休，搞不掉咱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你们要各抒己见，找出一个对付鄂友三的好办法来。但直到会议结束，谁也没有想出一个良策。临散会时，我父把一部分亲近的留下，对他们说：“现在再无别的好办法，只好向绥东投靠八路军了，你们看这个办法怎么样？”排长冠俊卿说：“这办法我同意。但是李秀元回去弄东西还没有回来，咱们现在要是走了，他回来一定会被抓起来。”我父听完后，也觉得这个意见很对，决定等几天再说。

我回到家里，费了好大劲才弄下贰百多两大烟。我把这些大烟带上回到归绥，见了王有功后，他说：“这点大烟太少，好似沧海里的一滴水，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管怎样吧，你拿来了我给鄂友三送去，如不行再说。”我说：“因为鄂司令限期太短，我怕误期限，急忙赶回来的，以后一定继续给他送。”

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我们仍驻归绥麻花板。此时已是收割大烟的季节，王有功知道那里种了大烟就把他的嫡系部队调到那里，他好顺便捞一把。唯有我们大队的人马一个也不让出去，怕跑掉。我们的士兵家里都种着大烟不叫回家收割，所以今天两个，明天三个的陆续逃跑了。当时，王有功派了一个甘肃人到我们大队里，名义上是当大队副，实际上是专门对我们进行监视的。

有一天后半夜，我父亲的勤务兵赵金挠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你父已经决定起义，叫把部队带上投奔解放军。”我说：“提前也没商议，应该好好地商议一下才好。”赵说：“商议也

没有用了，你父现已备好了马，让咱们赶快行动。”我们为了行动保密，便把那个甘肃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锁在家里。当时我们（能走一百五十多人），大小枪一百二十多支，当晚就向解放区出发。我们走到大青山附近时天已亮了。因为我们路线不熟悉，找了一个向导给我们带路。这个向导是国民党军队的亲戚（那时国民党的军队每日起来进行跑步、集合、升旗。邢培先带团附）一看我们的队伍没有来就派人找我们。去了一看人，马一个也没有了，只放着点给养。我们走了一段路，认为不再需要向导，就把他放回去了。那知他回去之后，就把我们的情况全部向保安五团报告了。与此同时，邢培先也把我们走的情况向董其武作了报告。并说我们以前就要求回家乡耳庆窑子去。他们认为我们是向西走了，因此就命令部队向西追赶。实际上我们是从东走了。我们走到黄花窝铺，已经是解放区的村庄了。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次日去旗下营，找到了解放军的二十二师和二十三师。当时有一个团长出来给我们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之后，一看我们队伍的帽子上还带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就让取下来，把我们安排在偏关卜子村。

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士兵们不安心，想回耳庆窑子割大烟。我父和武文斌（解放军派来的一个指导员）说了这个情况，武经请示领导后，批准了我们回耳庆窑子割洋烟的要求。我们临走时，他说：“现在究竟和与战还定不下来，你们走在路上要小心国民党队伍收拾你们。”当我们走到十字村时，就遇上国民党的军队，把我们打得过不去。没有别的办法又返回干杖忽洞村驻下。这时我们的番号仍然用“大青山招讨师”。

同年八月，姚喆司令员从集宁前来视察，还把我父请去会餐。当时姚司令员讲：“你这个部队编在野战军是不行的，没有经过训练，因此把你们编到包头军分区保安大队，编成一个连吧。”我们部队进行了改编，我父任了保安大队的大队长。

我与我父经过了无数曲折和斗争，从此，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黑暗走向光明。

原绥远省国术馆史略

吴秉孝 吴敬贤

武术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防卫技击、健身之道，深受各族人民群众的喜爱。在祖国北部边陲地区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经历代武林界名家高手在塞外收徒传授武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武术套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后经绥远省国术馆的组织和推动，武术活动更向前发展了。

绥远省国术馆成立前土默川一带 的武术源流

内蒙西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边塞要冲，为历代用武之地。随着和内地贸易往来频繁密切，城镇兴起，包头、托克托成为著名的水旱码头，萨拉齐、归化城(呼和浩特)一带是勾通西北、蒙古等地的重镇。城镇人口多而复杂，蒙古族、回族、汉族、满族居在一起。内地商旅来往此处停脚，特别是商旅长途贩运物资，多聘请武林高手为其保镖，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押送货物，销售于土默川、西北蒙古地区，并将皮毛、药材、土特产运往内地。

这些押运物资的武林高手，在闲暇之余，收徒授艺，或以武

会友，传播着武术套路。一些参与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人物，因斗争失败，隐姓埋名，潜入土默川这一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们有的武功很好，也收徒传艺。阴把缠枪传人赵老同，就是这样的人物。八卦掌师祖董海川晚年为京城某公府经营垦地，住在丰镇二道河子，也收徒传授八卦。托克托县吴英投师董海川学练八卦拳，从此后，八卦才在绥远地区流传。吴英、吴耀兄弟系武术世家，祖上从河北沧州来托克托县谋生，同时也传授武术。辛亥革命前，山西李懋德等人，以卖艺为名，联络武林界人士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吴氏兄弟曾被发展为同盟会员，以便作起义准备工作。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清咸丰、同治年间就有不少武林名拳师在塞外名噪一时了。他们都有一批武功很高的徒弟。到光绪年间象沙尔巴、沙六巴、花脸张（脸上有白癩疯）、花枪王、炮匠李、旋子张等绰号的武术拳师，多集中在归化城、托克托县、萨拉齐、包头一带。托克托县吴英、吴耀兄弟传授杨家大杆子和八卦远近闻名，归化城的苏二庆（绰号苏老虎）萨拉齐的陶大利、云连生，包头的孟三、托县的三免力都曾是吴英的门徒。晚辈吴桐承家传八卦、杨家大杆子，后又拜太极拳名家吴剑泉学太极拳等，又向云连生学八卦朝顶缠枪、剑点等绝技，成为塞外著名的武术家。萨拉齐赵老同传授给尤四喇嘛、关兴保、霍茂的武术绝技，声震清营。从山西来传艺的赵玉珂、杨一善（绰号杨圪旦）在萨拉齐授徒，⁶⁶使萨拉齐有武术之乡之称。归化城的武举武长耿、回族沙老三、邸青山及后来的马正英都是授徒传艺的名师。还有一些名人自家身传口授武术。这些武林前辈一代一代地把武术套路传给了后人，对土默川一带的武术活动，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绥远省国术馆的成立和汇集

各流派武林英雄

绥远省国术馆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即民国十八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占绥远后，省国术馆停止了活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八月恢复活动，一九四九年与省体育场、图书馆、文化馆合并为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同年“九·一九”和平起义，绥远省国术馆告一段落。前后共十一年，培养了一批武术学员，参加过四次全国和华北地区的比赛和表演赛，在绥远地区的武术活动中做出过一定成绩。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十月十日，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武术比赛（当时称打擂）。吴桐、宋标代表绥远省参加了比赛。吴桐一连三胜获得甲等，宋标一连两胜获得乙等。均获得大会奖状及奖章。载誉归来，声震塞外，名扬大江南北，为塞外武林争得了荣誉。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绥远省政府根据中央国术馆函各省市成立省国术馆的电令，决定成立绥远省国术馆。经组成的国术馆董事会共同推举吴桐为省国术馆馆长（呈报中央国术馆批准），并负责筹建和主持日常工作。经中央国术馆批复省国术馆长由当时的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兼任，吴桐被任命为副馆长。经筹备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四月正式成立。从此，国术馆开展了一系列武术活动，并参加全国和地区的比赛、表演赛，同各方面的武林名手建立了联系。

在筹备成立国术馆的过程中，还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

年)四月二十日在归化城北(即呼和浩特)小校场中山纪念堂前(现内蒙古医学院)举办了一次绥远省国术考试活动。经过比赛,选出了五十九名优胜者。其中甲等七名,第一名张永德;乙等二十九名,第一名杨荣;丙等十九人,第一名马正英;丁等四名,第一名杨效棠。据曾经参加国术考试的武术老前辈傅士魁回忆说:“当时考试比赛的情景十分热闹,先是徒手、器械表演赛,最后是散打。散打按抽签配对,有的虽然是师兄弟抽在一起对打,也是各不相让,各使绝技。他自己抽签和托克托县代表队白秉全(又名白五十九)在一起对打。他能回忆起来的有:孟三对古文中,旋子张(张永德)对张开印,张守智对杨荣,傅根罗对纪二,范凯对苏二庆。据萨拉齐代表队员胡文光回忆说:参加那次比赛大开了眼界,比试了功夫,结识了朋友,一辈子也难忘。”

绥远省国术馆纪实

绥远省国术馆设馆长、副馆长。下设教务、总务、编辑三科。各科设科长一人,科员、教练若干人(实际全馆正式工作人员八人),每月活动经费三百元(银元),其中一百元由地方实业促进社资助。

吴桐任副馆长兼教练,同时兼任绥远一中、归绥女子师范体育教员。从一九三三年以后,专职国术馆工作,传授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推手。吴式太极拳在绥远地区流传实始于他。

教练先设有宋标(一九三三年离去),苏二庆(一九三二年病逝),云连生、程全忠(一九三二年接苏二庆职)、马正英(一九三三年接宋标职)等。

省国术馆刚成立时,许久没有学员报名,馆内显得冷冷清

清。在这种情况下，吴桐求助于拳师马正英帮助。马正英割爱相让，将马印、白怀礼、王美等徒弟送到国术馆，从而打开了国术馆的局面。

省国术馆主要的学员有马印、王美、白怀礼、傅士魁、代俊等四、五十人。

馆里的武术教学活动从每天下午的三、四点开始，至晚上七、八点结束。有比赛任务的学员，有时练功到十一、二点才回家。教学与训练有计划地进行，要求是严格的。新学员必须从基本功开始练起，先练统一的十趟弹腿套路，也是基本拳术。从徒手到器械的教练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而且还根据学员的身材、特点、爱好及其它条件因材施教。

教学中充分发挥教练的专长。吴桐以教授太极为主，云连生教授阴把缠枪、剑点，马正英和程全忠教授各类长拳和器械。武术前辈吴耀也经常在内指点八卦和大杆子。马印、王美等也经常代师教新学员。

从国术馆传授出来的拳术套路有吴式太极拳、行意、八卦、十趟弹腿、查拳、太祖拳、少林拳、六合拳。

器械套路有太极剑、神禹剑、青龙剑、三才剑、春秋刀、普坛双钩、少林刀（十二趟）、青龙刀、双头蛇、阴把缠枪功法、剑点、四十枪、棍术等。

在省国术馆活动期间，一部分学员与教练曾多次代表绥远省参加全国和地区性的武术比赛、表演赛。一九三二年王美、白怀礼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国术表演赛；一九三三年程全忠、王美、潘德元、陈增福、代俊参加了青岛举办的国术表演赛；同年白怀礼、王美、刘恩绶、潘德元、张海参加了南京举办的国术比赛；一九三四年马印、王美、刘恩绶、白怀礼、代俊、吴占彪参加了

天津举办的华北地区国术表演赛。各次比赛、表演赛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多次的表演赛、比赛中，吴桐都被聘为国术裁判。

由于阴把缠枪功法奇特，实用性强，引起武术界的注意，要求绥远代表队多派使阴把缠枪的队员参加。为此，国术馆加紧对缠枪和其它套路的训练，但因时局紧张，比赛未能进行。

省国术馆除参加比赛活动外，还于一九三二年派刘恩绶去中央国术馆学习一年半。绥远地区流传的三才剑套路，就是刘恩绶从中央国术馆学回来的剑术套路。

同时还应各单位聘请，派出了不少学员去各单位教授拳术，增进人们的健康。如马印被聘到市电话公司当教练，王美被聘到电报公司当教练，陈增福被聘到政府机关当教练……。

一九三七年初，省政府抽调选拔了十七名学员分赴各县教授武术，参加练武的人总计约三、四千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了绥远，国术馆关闭了。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八月，省国术馆又恢复了活动。馆长由当时的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兼任，吴桐仍被国术馆董事会推选为副馆长。国术馆下设六个分场教练武术。教练有：本场的关德山、王美；一分场马正英、马印；二分场吴文魁、苏永成；三分场张振英、范美等。

在恢复武术活动后，国术馆还编了枪术、剑术。

县国术馆简况

绥远省国术馆成立后，归绥县国术馆也于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馆址设在归绥旧城西五十家街。馆长由当时的归绥县长郑直昌兼任，副馆长翟星五（后调绥远省国术馆工作），教练潘德

元、录天喜。入馆学员有百余人，所学的拳械有太极拳、八卦拳、弹腿、长拳、枪、刀、剑术等套路。

萨拉齐县国术馆于一九三三年成立。馆长由当时的县长李应道兼任，副馆长武继之。教务主任张全胜（拳师）兼教练。教练初期为胡文光、杨德山，后期为董吉昌、李振海。一切章程均按绥远省国术馆对县国术馆的要求办理。馆址设在县城东门奶庙内。学员多是学生和农家子弟。

其他各县因财力困难，未能成立。

（一九八四年三月）

绥远省体育往事回顾

赵允迪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民国成立后，绥远和热河、察哈尔一起被北洋军阀政府划为三个“特别行政区”，绥远特别行政长官所在地是归绥市，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我所写的绥远体育往事，以归绥地区为重点，时间从本世纪初期至解放前。

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绥远这个特区更是不断地走马换将。同时，外国教会势力不断扩大，教会开办的学校没有体育课，如归绥的培真小学、萨拉齐的育英堂学校。当时体育运动的范围和规模很小，参加人数也不多。以后，随着内地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影响，绥远的体育活动才有所开展，但参加者仅限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解放前，绥远体育极端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只顾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不管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即便搞一些体育设施，提倡一下体育活动也是沽名钓誉。因此，在旧中国体育事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体育事业有长足发展，真正成为人民的一项事业，是在解放以后。

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及孔博泉、吴懋功先生提供的一些回忆，从六个方面回顾一下绥远的体育概况。事久年高，难免有疏误之处，希望同行朋友指正。

学 校 体 育

解放前，归绥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只有一些师范和普通中、小学。这些学校有：归绥师范、省立归绥中学和县立一、二、三完小、土默特小学、回民小学、塞北关小学、铁路小学，冯玉祥创办的子弟中学——弘道中学和育德中学、五族学院（后改名中山学院），傅作义的私立奋斗中学，国民党省党部以私人名义建立的正风中学，天主教创办的恒清中学和普爱小学，耶稣教办的培真小学，以后又成立土默特中学、归绥女师、职业学校、省立归绥六所小学。共计有二十五所学校。

一九二一年，我在土默特旗毕克齐国民小学上学。这所学校比较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每天下午作徒手体操，还开展跳绳、踢毽子、拍毛蛋（皮球）等简单的体育活动。这些活动引起了我们对体育的兴趣，使该校毕业出去的一些人走上了职业体育的道路。这与当时学校的校长有关系。他是北京高等师范肄业生，名叫王轩臣，是个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

归绥城里的中小学一九一五年时仍没有体育教师和体育课，更没有运动场地和体育器材设施。只在课后由部分体育爱好者组织活动。学生们找一片空地，搬上两块石头摆成球门，用补了又补的破旧足球就踢起来了，这是当时小学体育的唯一活动。

到一九二五年，有的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当时归绥中学（现呼市一中）的体育教师是吴桐先生和云连生先生。他们精通武术，但所上的体育课，内容没有具体规定，随学生的兴趣出发，想活动什么就活动什么，经常上体育课的只有十几个人，还不到全班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他学生点完名就溜号了。因为学校领导

不重视体育课，对学生没有具体要求，形成徒有其名，放任自流的情况。另外，学校也没有体育经费，修运动场地、购买体育器械就更谈不到了。如当时归绥中学仅有单杠一副，绳拍式兰球架一副，学校西北的后沙滩虽有个运动场，但没有跑道，连足球门也没有。学生们分组进行足球赛时，只好用石头块作球门。

二十年代以后，学校体育有所起色。体育课上得较正规一些，竞赛也增多了。如土小、回小、满小、庆凯小学、塞北关小学、铁路小学相互之间利用假日组织兰球、足球比赛。一九二二年秋，首次举行了几所小学兰球和足球比赛。兰球比赛，土小和庆凯小学竞争很激烈，结果庆凯小学胜一球，夺得了冠军，土小获得亚军。足球比赛，土小夺得冠军，回小获得了亚军。

一九二四年春，举行了全市第一届小学运动会，会址在归绥中学运动场，会期两天。比赛项目有百米、百米绳赛跑、五十米障碍赛、五十米三足竞走、跳高、跳远、兰球掷远、拔河比赛，还有团体操表演。最精采的是庆凯小学的哑铃操，动作整齐、纯熟，姿势多样而优美，深得观众的好评。这套体操是由温玉如老师传授的。此外回民小学表演的棍棒操，做得也很整齐熟练，受到群众的称赞。竞赛结果：土小获得总分第一名，回民小学获得第二名。这次运动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收获很大。推动了小学体育运动的开展。

在这个时期，中等学校之间的体育接触也比较多起来，绥中与中山学院以及师范学校经常进行足球、兰球比赛。教育行政当局也定期举行田径运动会，开展兰球、足球比赛。一九二六年举行了第一届中等学校田径运动会，会址在小校场，会期三天，竞赛项目很全。比赛中竞争很激烈，绥中与师范学校实力相近，一些虎将选手崭露头角。如当时师范的短跑名手齐寿康，在一、二百米

决赛中都获得了第一名，归中的孔博泉获得五项全能的第一名，王典获得四、八百米的第一名，陈国珍获得跳高第一名。竞赛结果归中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师范获得总分第二名。在团体操表演中，师范学校的徒手操和民族舞蹈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民族舞动作结构完善，优美大方，表演得很熟练，加之有音乐伴奏，较为生动，博得观众的赞叹。该体操和舞蹈由天津市很有声望的老体育工作者张伯清先生传授。

这届运动会以后，学校体育工作得到普遍重视，特别是引起了各学校领导的注意：关心体育活动的开展，注意物色优秀的体育教师。各校为了培养运动员，还组织了各项运动代表队，并重视平时训练。总之，校方已认识到体育荣誉对一个学校声望有很大的影响。这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绥远学校的体育课程列入教学计划，配备专职教师是在一九二四年以后。体育课每周两小时，大多数学校有专职或业余武术教练。“九·一八”事变后，除每周两节课外还增添了两小时课外活动，高中班加强军事训练，初中班进行童子军训练。一九三七年暑假，中学全部停课，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课的军事教官，因中央全部调回，由当地政府给学校派遣。这种军训是强迫性的，对学校体育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社会体育

绥远的社会体育是在学校体育运动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当时社会上的体育包括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民族体育和民间体育。群众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也随着社会体育的开展有了一定的增长。但从根本上看，政府对群众体育根本不予重视。虽有一部分

体育爱好者提倡，但终因条件不具备而难于开展。比如有的人热心于摔跤和武术，官方却不提供条件，他们只好利用自己居住的院子，自己的器械和摔跤衣供来参加的群众使用。当时在新旧城分别设立了两个活动站，旧城是回民站，新城是满民站。这类活动站属民间性质，它为群众在劳作之暇锻炼身体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范围是很小的。

当时到大马路体育场活动的人简直是寥若晨星，因此公共体育场也就成了举办定期比赛的场所。每年举行中小学运动会一至二次，冬季足球赛与春季兰球赛、越野赛和自行车赛各一次。除此之外，为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还邀请北平中华中学兰球队、国民三十六军兰球队来进行表演比赛。民族体育的项目主要有摔跤、武术、赛马、马术表演、马球等。

一九三一年绥远组织了绥光兰球队，成员主要是中小学体育教师，球队队员有苑廷瑞、孔博泉、丁发善、张宝华、何继忠、刘继堂、张立朝等。绥光兰球队经常在假日同社会上其他业余兰球队进行比赛，是当时群众较为欢迎的比赛项目之一。特别是与铁路系统联队进行友谊赛时，因该队实力雄厚，观众特别多。中等学校较好的队是中山学院兰球队。该队有归绥兰球名手丁开贞、陈国治二人。

社会体育活动中，武术活动较为广泛。抗战前，这里就成立了“国术馆”（武术），馆长是全国有名望的吴桐（子琴）先生。由于他的组织提倡，每天都有不少人前去向他求教学艺。现在呼市武术界较有名气的人物，大多出自吴桐门下。同时由于吴先生的提倡，归绥和包头一些中学都聘请了武术教师，并在课外增添武术课。吴子琴先生在武术方面造诣很深，可惜他的研究成果还未及撰写，就不幸过早逝世，这是自治区武术界的一大损

失。

其他方面还有：如冬季踢毽子、春季爬山、放风筝、夏季玩石锁等民间体育活动。

体 育 竞 赛

为了提高绥远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开扩运动员的眼界，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经常从学校和单位选拔运动员参加华北区和全国的一些体育竞赛。

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华北区全国运动会预选，绥远省派齐寿康、孔博泉、王典、乔炳华等五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预选赛。

一九二七年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华北区篮球比赛，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有苗时雨、赵允谐、赵允迪、刘景阳、张为义、吴真、乔明珍等，我们参加了中学组的比赛。比赛时遇到两个强队，通县潞河中学队和北京育英中学队。赛前认为差距很大，跟人家无法比赛，但在比赛中我队越战越勇。打出了较好水平。

一九二八年在沈阳举行华北区大学、中学田径运动会，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有张维义、赵允谐、苗时雨、赵允迪、刘绍堂、鄂文轩等十二人。我们参加的是中学组。这个时期举办这次运动会很不容易，因正值“九·一八”事变前，是一个非常时期。日军反对在那个地区举行运动会，运动员为了安全不能在沈阳车站下车，是在未到沈阳的黄姑屯车站下的车。下车后，直接用汽车送到东北大学。这件事使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每个运动员很气愤，印象很深。这次运动会的主持者是张学良。他是爱国的军

官，受到了运动员的尊敬。

一九三一年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绥远省参加的运动员有武达平、杨国兴、任双弼、李继美等十人。

一九三二年在河南开封举行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绥远省参加的项目除田径外还有女排，运动员有阎秉贞、宋守莲、狄锦荣、徐兰、李致祥、张秀英、段锦花、李彩霞等二十余人。

一九三三年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绥远省代表队由十名队员组成。

一九三四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和兰球。绥远省参加的运动员有丁开楨、李鸿全、余俊祥、段成栋等十七人。

一九三〇年在杭州举行第四届全运会，绥远代表队参加田径、武术比赛，队员有吴桐、宋标、刘恩绶、王美等十二人。

一九三三年在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绥远代表参加田径、武术和足球比赛，队员共三十六人。武术队员吴桐、刘恩绶、宋标等以打擂台方式参加比赛，吴桐用太极拳把山东名将从擂台打下，取得胜利，声振全国。当时武术界领导人张之江对吴桐特别器重，返绥后即成立“国术馆”，任命吴桐为馆长。

一九三五年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绥远代表队参加的项目有田径、武术、排球，代表队共十八人组成。

一九四八年参加华北区第十四届奥运会预选兰球赛，地点在天津。领队苗时雨，教练孔博泉，队员侯志超、阎秉义、张静、武士松、张国权、阎秉昌、铁青等人。

当时在体育竞赛中风气不好，有些运动员和教练员在比赛中为了争名次、争锦标，动作粗野，不服从裁判。也有的观众蜂拥入场围攻殴打队员或裁判员，使得一些比赛无人敢作裁判。比如

在绥远第二届田径运动会上，西北军的“弘道”和“育德”这两个干校的运动员，为了争名次、争锦标，打伤裁判和大会工作人员，把一个很好的运动会搞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不仅影响大会进程，使大会不能圆满结束，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体育场地

抗日战争前，绥远体育工作条件十分落后，尚无一处象样的公共体育场，仅有归绥中学后沙滩那片场地。一九三一年，师范学校修建了一处较为规格的场地，包括有四百公尺跑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地、网球场以及体操器械活动场地。

一九三三年，绥远建立第一个公共体育场，名称为“绥远省立公共体育场”。第一任场长是北师大体育系毕业生赵允潜。赵任场长仅一年，次年就任商震部队三十二军体育部主任，辞去场长职务。后由体育场指导田永安暂代场长。

体育场成立时因属白手起家，所以只好先借了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的两间房作办公室。编制为场长一人，指导一人，文书一人，勤杂员二人。一九三五年吴耀成接任场长，吴也是北师大体育系毕业生，吴任职不久，指导员田永安应外地之聘请而辞职，前往东北执教。吴乃聘请孔博泉为体育场指导员，吴任职后即大兴土木，着手建场。经过半年多时间，在大马路赛马场跑圈内建成四百米田径场，足球场一个、篮球场四个，又在大马路南毛织厂对面建成办公室三十间。后来“七七事变”，归绥被日寇占据，日寇修筑工事，把体育场完全给破坏了。日本投降后，又重建一东西四百米的简易田径跑道，以及篮球、排球场地。到解放初，因举行华北第一届田径运动会才建了一个可容三万人的砖土结构看台和

四百米田径跑道，算是第三次重新修建了。

体育领导体制

一九四八年以前，绥远的体育领导体制，属省政府教育厅领导管理。教育厅专设社会教育处掌管绥远省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体育场、国术馆的工作，同时也管学校体育工作。各学校均有体育教学组织，体育组织机构多则三、四人，少则一至二人。中学和中专一般设体育主任。

一九四八年董其武任绥远省主席时，这里的文教机构曾进行过一次改组。将原有国术馆、体育场、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四个单位合并在一起，组织成绥远省社教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吴桐，委员吴桐、赵允迪、陈维城、弓玉书，各口工作仍由委员负责领导。推行委员会成立后，体育场举行过一系列体育比赛，小学举行过兰球赛，中等学校举行兰球比赛和足球比赛。冬季还举行过越野赛。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

昙花一现的西北实业促进社

张 万 仁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拥阎（阎锡山）派一些残兵败将组织了绥远西北实业促进社，在扩大会议失败后藉以对抗拥蒋派。它是绥远地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以促进实业为名义，以兴办实业为掩护，暗中联络党羽，组织力量，在绥远地区各族各界大量吸收和团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成了一个国民党在野派的政治团体。其中少数头面人物，是当时政界中的显要人物，大部分是些失业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在校大学生和中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从政治面貌上来看，以国民党员为主，也有不少无党派人士，学生中以激进青年为多。他们以推翻当时地方上国民党当权派为共同目标而临时纠合在一起，因此这个团体成分非常复杂。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失意分子的大联合，外人给它一个浑名叫“失业社”。

西北实业促进社（以下简称实业社）既以反对地方国民党当权派为目的，国民党当权的党部对他们这一派稍有不利，立即可以爆发一场群众性的反抗运动。原因是实业社的分子及其大量的同情者，分布于政学各界、工商各业。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当权派排除异己，结党营私，贪污腐化，群众对之怨恨极深。例如教育厅长一职，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潘秀仁所把持，非其党羽，想找一个当教师的位置都十分困难，至于校长之类的职务，更是毫无希望。潘上台之后，

原有的各校长，凡与该派无关系者，逐个予以撤换，弄得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敢揭竿而起，随声附和者便立即蜂拥而来。所以在潘、赵派当权之日，各种反抗运动此起彼伏，闹得绥远省党部经常处于惊慌失措，风声鹤唳之中。一九三三年绥远所发生的“驱潘学潮”规模最大，声势最为煊赫，震动了华北地区。这次学潮的幕后策划者和从中鼓动者，以至临时指挥者就是实业社。当时晋绥政学各界人士，几乎无人不知有“西北实业促进社”，并惊叹其势力之雄厚，工作之深入。但该社内部情况，始终对外保密，不作任何宣传。除了个别人之外，很难了解其详情。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它所鼓动的一些运动，很能博得许多旁观者的喝彩，颇有大快人心之感。

一九三三年，我以绥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驱潘学潮”，开始和实业社的一些人有接触，成为他们所利用的一名小帮手，虽非该社的成员，但对该社的情况尚能略知一二。现在就所知，略述其端，以为地方史料之补充，希望曾亲身参与和熟知其内幕者，给予指正和补充。

西北实业促进社成立的缘起

一九三〇年三月，阎锡山、汪精卫等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扩大会议，宣言反蒋，另组国府。当时绥远省国民党党部内也分裂为两派：以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等为首的拥蒋派，一时销声匿迹，避居天津外国租界；以祁志厚、焦守显、于存灏等为首的拥阎派，夺得了党权，成立了各县市党部临时联合办事处，并指派了自己的干部为各县的临时指导委员，公开活动。不意到这年九月，阎汪联合政府因军事上的不利，宣告失败。拥阎派的所

有党政人员，也随之鸟兽散。而拥蒋派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于一九三一年二月遂出现于绥远，进行党务整理，将前各县市联合办事处的党员，或拒绝登记，或尽予开除党籍。“九·一八”事变后，在团结救国的号召下，虽恢复了一些人的党籍，还开除了九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了省党部，以赵允义、潘秀仁、乔秉华、陈国英、曲步霄为执行委员。拥阎派都被摒于党部之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虽然被夺去了党权，在别的方面仍有活动余地，他们之中一些上层人物便在其他各界谋得位置，拥蒋派虽掌握党权，军政各界一时尚未取得大权，互相争夺，形势颇为紧张。

阎锡山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一度下野，避居大连，和日本帝国主义暗中进行了勾结。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全国人民团结救国的呼声中溜回山西，并得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宽容，东山再起，又登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蒋政府给阎以晋绥两省绥靖主任的职位，仍然是统治两省地盘的首领，威风并不减于当年，特别在山西省军政方面，向来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南京政府亦无可奈何。一九三一年以前，山西也有过国民党党部的设置，党权在拥蒋派的手中。以一九三二年阎派要求抗日救国，鼓动学生群众请愿，造成流血事件为由头，遂将省党部打跑，后来阎锡山屡次图谋建立他自己的省党部，而国民党中央党部不许可。一直僵持到一九四九年，终未得到解决。

阎锡山的势力，从一九二八年起就伸进绥远，但控制力比在山西要薄弱一些，尤其在扩大会议以后，党权完全被蒋派夺去。虽然一九三一年以后，傅作义任了绥远省的主席，但当时傅作义自以为这个主席位置的得来，并非由于阎的力量，对阎的忠诚，

已不似从前那样强烈，对蒋介石则力图靠近，诸事既不得罪于阎，也要讨好于蒋。因之，绥远的政局和山西有所不同，阎派的气焰虽然大为消沉，但潜在势力还继续存在，蒋派虽然得势，但对反对派还不至于赶尽杀绝。经过一个时期的调解协商，局势暂告缓和。南京政府把祁志厚升任为立法委员，张钦出任了绥远禁烟稽察处会办，于存灏出任了绥远省地方法院院长，焦守显最后被委为山西太原西北实业公司炼焦厂厂长，其余一些人物，则凭个人的活动能力寻找吃饭之地，或者处于失业状态。由于潘赵派的多方排挤，拥阎派的许多小喽罗濒临饥饿境地。虽然拥有象禁烟稽察处、地方法院等几个机关，但有位置的人也为数有限。尤其禁烟稽察处是直属山西禁烟考核处的一个机关，总办李居义是山西人，重要职位自然为山西人所占据，留给绥远地方的名额已没有几个。地方法院能有位置的，只限于专门学过法律的专业人材，而这种人才又不多。在群众的压力下，作为这个团体的头头们，必须奔走呼号，想一些办法来解决，免得使这个凑合起来的团体涣散，甚至可能由于对方的利诱，把一些骨干拉过去，削弱了自己的势力，在当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西北实业促进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实业社的组织概况和山西“中社” “青年救国团”的关系

实业社的头面人物，如焦守显、张钦、于存灏等，在扩大会议期间，和山西李江（字冠洋、灵邱县人）等在一起为阎锡山摇旗呐喊。失败以后，阎仍不死心，卧薪尝胆，图谋在有利时机东山再起。于是筹拨巨款，让他的那些死党，组织了五个团体。这五个团体的大致情况如下：由李冠洋主持成立了“中国青年

救国团”（简称为青年团），邱仰澹、张至心，王谦等组织了“建设救国社”，张蕩等主持成立了“山西人民监政会”，李畅生、杨贞吉等组织了“山西民众监政会”，杨集贤领导组织了“晋绥人民监政会”。这三个会，外人统称之为监政会，当作一个团体来看待，实际上三方面互相斗争，权利冲突不断发生。续如楫、阎世英等组织有“文山读书会”，最后还有冯司直所组织的“植社”。其中李冠洋所领导的青年团最为庞大，人多势众，每月由阎发给三万余元的经费，其他四个团体的经费，则为数较少。

青年团的总团长是李冠洋，下有青年干部十八人（其中有梁子材，绥远丰镇县人）。在总团部之下，有一个核心组织叫“中社”，负责人为张隽轩，青年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下设干部委员会，李冠洋、杨集贤等七人为总干部委员，还有焦子明（即焦守显绥远托县人）、李济生（亦名李世忠，绥远凉城人）、张隽轩等九人为山西干部委员，于存灏、寿松年、张淑良、杜宣德、李颢等五人为绥远干部委员，由于存灏负责。

“中社”下设理论委员会，有委员若干人，张子佩（绥远丰镇县人）为委员兼秘书长，梁子材为秘书。这个理论委员会，是给阎锡山创造什么“唯中论”，“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谬论的一个机构，企图与共产党的唯物论来对抗。传播仅限于山西，外间几乎无人注意。

“中社”在山西亦有“中报”，北京亦有“健报”，绥远人任鼎生、杜宣德，李仲深都曾在该报作过编辑。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来，实业社的一些头子们，都和李冠洋有历史渊源，曾经为阎锡山的事业共同奋斗过。

绥远这个地方是阎的领地，也需要一些人去从事工作。因此在青年救国团的经费中，分拨了一小部分，组织了西北实

业促进社，最初每月只给两千余元，一九三三年学潮爆发后，增至三千余元。

实业社的成立，约在一九三一年初。为了名实相符，曾在旧城小东街办过一个实业工厂，有工人二十余名，使用落后的手工机具，生产一些粗糙的毛布毛毯，生意清淡，并不赚钱，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图维持门面而已。

实业社初开张的前半年，为了扩大影响，招徕青年，每星期日凡来社串联的青年学生，供应馒头肉菜一顿。为时不久，这种舍饭宣传的方式，因经费不支，便宣告停止。只把这座院内的房屋作为一些失业候差者的临时公寓，免费寄宿。

实业社经费开支的一大部分，是实业社理事的津贴，每人每月四十元，约有理事二十余人。担任常务理事的几位头子，各拿百元以上。对社内的一些失业青年，有选择地发给一些生活补助，每人每月十元或十五元不等。另外拿出一少部分，津贴若干名旅平学生（大学）和第一中学、中山学院等校几名学生，藉以收买，为数有限。其余之数则以公杂费、交际费、活动费等名目，由几位头子们挥霍了。

实业社的负责人，初为于存灏。到一九三四年，因为经济不公开，内部分赃不均，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结果实行改选，由焦守显负责，财务由班浩来管理。为时不久，到一九三六年春季，阎锡山为加强和共产党的斗争，成立了主张公道团，把以前豢养的各团体都解散，停发经费，西北实业促进社也与李冠洋的青年救国团，同时寿终正寝。

“中社”在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包头南黄河对岸）建立过一个“求对新村”，曾拨款十万元，由大同人庞善守主办，成绩不甚显著，在绥远几乎无大影响。未闻与西北实业促进社有过什

么关系。一九三六年以后亦无下文。

西北实业促进社一些人物的下场

实业社派最初的领导人是祁志厚（字定远）、焦守显（字子明）。祁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出任过绥远省教育厅厅长，并依附于阎锡山的势力。祁焦之间，因权利冲突，曾发生过内讧。扩大会议后，因政局的变化一时退入幕后。蒋政府为削弱对立面的势力，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拉拢手段，就把祁志厚提拔为中央立法委员，藉以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此后祁便一直在南京活动，对于地方事务就不直接插手了。

焦守显，绥远托县人。从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国民党的活动，虽然不学无术，但锻炼成为一个典型的政客、党棍。活动能力很强，交际也很广，并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等都有联系，在地方上是依靠阎锡山的势力。扩大会议失败后，与李冠洋等组织了“青年救国团”，完全倒向了阎的卵翼之下，在绥远创办了西北实业促进社，为巩固阎在绥远的统治而努力。但在绥远的政界中，没有捞到一席重要位置，为此郁郁不乐，多次向阎提出要求，但因傅作义对他不感兴趣，终未达到目的。一九三四年，阎锡山给了他一个西北实业公司炼焦厂厂长的头衔，坐领干薪。终以不甘寂寞，要求阎给以巨额旅费，以考察的名义，去日本、美国玩了几年，一九四一年以后回国。当时阎锡山局处于陕西宜川，局面已非昔比，他就投奔了二陈，打了一个西兰公路特别党部的主任委员，在抗战胜利之前病死于兰州。

于存灏字静漪，绥远武川县人，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在学生时代即参加国民党的活动。此人深谋远虑，工于心计，深

得李冠洋等人的赏识。扩大会议失败后，和李冠洋、张隽轩等组织了“青年救国团”，是“中社”绥远干部委员会的负责人，又是实业社初期的负责人。扩大会议后任绥远省地方法院院长。一九三三年绥远学潮平息后，被傅作义委为绥远毛织厂厂长，实业社的负责人办实业，既名正言顺，又是义不容辞。因此虽心中不愿，也无话可说。傅采取这样的办法，目的是使拥护阎锡山的分子成为自己的拥护者，其用心亦可谓深远矣。抗战时期于任民众抗日自卫军副总司令，胜利后出任绥远高等法院院长，直至解放。

张钦字敬亭，绥远凉城县人，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早期毕业生。多年从事政治活动，曾被选举为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众议员，为绥东政界的领袖（当时属察哈尔），划归绥远省后，成为绥东五县的领导人物。又因他和山西多年的历史渊源，自然和实业社一派的人物亲密合作，成为实业社领导者之一，并受到于、焦等人的尊重。一九二九年曾任绥远教育厅厅长，后任禁烟稽查处会办，实业社垮台以后，被傅委任为地政局研究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任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胜利后被举为省参议会议长。

白映星字镜潭，绥远萨拉齐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与祁志厚关系密切。在祁任教育厅长时，白被任为中山学院院长。实业社组成后，成为该社领导层的实力人物，一九三三年“驱潘风潮”结束后，被撤去院长职务委以乡村建设研究会主任。傅作义主绥政以后，锐意兴革，参照山东梁漱溟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晏阳初在邹平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些作法，创办了绥远乡村工作人员训练所，每期约半年上下，培养了几百名青年，分派到各县各乡，搞新的乡村建设，解决了当时本省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实

业社的头子中，白所拥有的这个地盘最有发展。抗战爆发后，白参加了民众抗日自卫军的领导工作，其后流落于沦陷区，染病身亡。

班涉字养吾，绥远丰镇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在张钦任教育厅长时，曾一度出任过绥远第一中学校长，旋任财政厅科长。焦守显继于存灏担任实业社领导之后，他是该社的财务主任，抗战期间逃亡北平，客死异乡。

张淑良字可旌，绥远丰镇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绥远各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因与李济生、张子佩、寿耀南等有同乡同学的关系，遂成为实业社领导层的一员，并是实业社领导下的绥远省教育会的负责人之一兼任晋绥绥靖公署参议之职，月领干薪大洋五十元。还有曾任绥远第二师范校长的米增兆，也在绥署领有一份参议的干薪，直到抗战以后才停。当时在实业社的人物中，如辛崇业、陈志仁、寿耀南、宋志刚等，在绥靖公署都任参议之职，因不公开鲜为外人所知。张淑良在实业社解散不久，抗战开始，逃难到绥西。先在骑四师工作，一九四〇年出任陕坝国立绥中校长，直到胜利以后。“九·一九”起义之际，教育厅长苏铤逃往台湾，张升任厅长。

李世逵字致方，归绥县人，绥远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毕业。又曾于太原党政学院进修，为实业社创始人之一，和于、焦等人关系极为密切。李为人多谋善断，有“智囊”之称。曾一度在该社所办实业工厂负责。又与同学柴生华合力创办了“名言小学”，先在呼市巧尔齐召，一九三四年由黄齐生先生介绍，李、柴二人到上海陶行知办的工学团学习了半年，返绥后将所办名言小学，迁到城东保尔合少村，改变方针，依照陶行知先生所提倡之知行教育学说办学，为当时绥远教育界放一异彩。抗战期间李在自卫军总部、第八

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处工作，胜利后任绥远模范监狱典狱长。

寿松年字耀南，绥远丰镇县隆盛庄人。中学毕业后，曾参加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并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西北军失败后，消极脱党，与同乡张子佩、李济生等在山西参加了李冠洋所组织的“青年救国团”，为“中社”绥远干部五人之一，同时也是实业社的理事之一。一九三五年回到山西，出任陕北剿匪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一度任山西大宁县县长，其后一直在民族革命同志会工作，一九四八年返回绥远，参加“九·一九”起义。

贺青寿，土旗蒙族，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任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参事。精明干练，是实业社的一名干将，在该社的支持下从事团结蒙旗势力的工作，影响很大。一九三五年主办《蒙古向导》周刊，以汉文自撰自编，由伊钟秀先生译为蒙文，石印出版。每期四开一张，为当时绥远唯一的蒙文报纸，实业社垮台后停办。抗战期间，在伊盟左三旗，从事团结蒙旗王公、坚持抗日的活动，一九四二年伊盟事变中，被陈长捷杀害。

樊殿襄字赞卿，绥远和林格尔县人，亦属实业社的一员干将。曾在社会教育所工作，与刘继汉负责社会日报的编辑。扩大会议期间，为祁、焦派反潘、赵的急先锋，令人谈虎色变。因之潘、赵把持党部之后，首先以暴徒的罪名，把他开除出党。实业社成立后，把他安排在和林作为地方势力的骨干。

辛崇业字及山，家为山西河曲的大地主。因在后套五原县拥有大片土地，所以也算绥远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绥远政学各界活动。实业社组成时，即为理事之一，一方面又在绥靖公署充任参议，也是阎锡山收买的对象。与祁、焦等人关系甚为密切。一九四〇年，绥远省党部改组时，由于祁派干将刘贵（字福斋）的支持，出任了省党部的委员，兼任第一督导区的督导员（第一督导

区为后套五临安三县)。抗战胜利后，南京召开伪国大，辛为国大代表，会后被选为立法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九年留绥参加起义

陈志仁字之的，绥远萨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学识丰富，长于文学，有才子之称，曾在绥远省立一中与师范、中山学院等校任教，为实业社理事之一，为人倜傥不羁，喜放言高论，指斥时政。因此触犯了傅作义之忌，对他极为不满，在政界一直不给任何工作，只靠实业社来维持生活。抗战时期，流落绥西陕坝，困顿不堪，竟至不能举炊。幸有友人的周济，才不至成为饿殍。一九四二年以后，曾一度前往兰州，投奔焦子明，在西兰公路特别党部充任执委。焦死之后，复返绥远。抗战胜利后，在省参议会任秘书长。一九四八年以国民代表之资格，出席了伪国大，在祁志厚、刘福斋等人的活动下，得被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九年返绥参加“九·一九”起义。

还有依附于张钦势力的一些绥东人士，如曾任第一师范校长的刘汉，第二师范校长的郭际枚，第二中学校长的刘和义，曾任社会教育所所长的樊库，曾任第一中学校长的郭良田。这些人由于有张钦的关系，起初都是实业社的拥护者，在一九三三年“驱潘学潮”中，除了二中、二师两个校长积极参加外，其余如刘汉、樊库等都态度消极，表现不力。自那以后，就开始分化，有的逐渐倾向于潘赵，如刘汉即是。有的被傅作义以县长为诱饵，一个一个地拉了过去，最后成为傅的拥护者，和实业社的关系就疏远了，甚至成为反对者。

实业社解散以后，一部分靠领津贴生活的如任大光、任永春等，一时生活无着，立即转向省党部，向陈国英靠拢。当时省党部内部，以潘秀仁、赵允义、纪守光为一方，与陈相对立。陈兼任调统室主任，掌握着武装特务队。在一九三六年冬季的一次

秘密会议上，陈率领了一些武装特务，当场开火，将纪守光打死，潘秀仁负伤。参加开火的积极分子，就是任大光、任永春等人。他们原为实业社的干将，一变而为陈国英的打手。可见这些人原来并无任何立场，正所谓“有奶便是娘”者也。任大光在抗战后期，又投到张庆恩的调统室，作了反共特务，最后的下场是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一九八四年）

从瑞兴泰看旅蒙商

陈福义

清朝康熙年间，旅蒙商来呼伦贝尔牧业四旗及海拉尔市作生意的，多数是从北京、张家口、多伦县来，少数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商号。初期，一般春来秋归。每年旧历八月初一甘珠尔庙那达慕大会上处理剩下的商品，交换牲畜皮毛。会后就要返回原地。一年一度的那达慕给旅蒙商带来很多便利。

来此之商人，因年年获利颇厚，人数逐渐增多，大部分商号集中在海拉尔市内。较大的商号逐渐在草原上设立定居点和门市部。海拉尔市是草原上最早的设点之一。货源多数来自北京、张家口、多伦县及齐齐哈尔等地。随着商业的发展，海拉尔的木器业、毡业、铁业、制鞋业、铜器业、金银器具等手工行业也逐渐增多。海拉尔遂成为呼伦贝尔草原商号最集中的城市。

海拉尔瑞兴泰旅蒙商是在一九二〇年成立的。经理、柜夥来自多伦县。经理武魁立别名哲臣，原系多伦县长盛魁商号驻海拉尔的推销员。

瑞兴泰开设在海拉尔市正阳街路西，经营绸缎、布匹、米面等商品，资本金四千元（当时黑龙江省广信公司票券每元折合银元八角）武魁立本身出资两千元，外东武泰贵出资两千元。一九二一年外东武泰贵将资金抽出，剩下武魁立独资经营。开业时共有六名人员，柜夥二名，店员三名。柜夥顶身股者，有武魁立

叔弟武魁群和，张三娃。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出外旗推销商品，收购牛、羊、皮张等。一九二〇年出外旗作生意一次，就交换牛羊数百头，皮张数百张。

武为了更多地获得利润，在海市设立了门市部，辅助外旗行商推行商品和交换皮毛、牲畜，这样就能够在外地和本市多赚些商品作为资金，多出些货物到外旗换取皮张、牲畜。同时，也能借一部分牧民的牛羊作为资金，扩大经营。

瑞兴泰初期出外作生意仅有牛车八辆，骑马一匹，出货数量也不多。一九二〇年由于出外旗行商获利，秋季在海拉尔市成立瑞兴泰门市部，人员随着经营扩大也增多了。到一九二二年，人员增到二十五名以上。出外旗推销商品的车马、货物等也有大幅度的增加。据武魁立讲，一九二五年大清点时，有十三万两银子的存货，并在海市买房子一所（四千两银子），在原籍买土地四十多亩，在西新巴旗阿尔嘎汗设立总分销店，并有流动车随牧民流动。售货人员也增加到四十多名。他们随着牧民流动，其中能买能卖，言语精通者，每年工薪只有一百多元，店员工资更是了了无几。

到一九二六年左右，即能出车七十至八十辆，骑马四十匹以上。夏季收购羊毛时还需要临时雇用脚车数十辆来往运送商品。冬季自备骆驼车四十辆运输货物，并赶牛羊进街出售。

每年春季，瑞兴泰向十余家毡业商号佃付资金以及商品、粮食等，换取毡业商号得来之羊毛，收购的条件很苛刻。每一家毡业商号都有二、三十名工人，每年所换得的羊毛都在万斤左右。由于使用瑞兴泰的资金，商品就得受瑞兴泰的限制，每家最低交售使用资金数一倍的羊毛。售价低于市行百分之十至二十。而春

季所用的商品货物则高于市行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因此每年在秋天结账时与毡业商业争吵不休。

瑞兴泰每年春天借用外国信济洋行、秋林洋行贷款，也受条件限制。使用贷款必须交给洋行羊毛，或按当时情况定价，或低于市行百分之十左右售给洋行。

瑞兴泰经理武哲臣，口头上假仁假义，实质上对待职工是没利不干。对待柜夥张三娃就是一个实例。在张三娃出号时，不清点货物，只按应得红利结账。张闹了一年的时间，经人说合才给了几个钱了之。

武在伪满以前系旧街商务会董事，他依靠旧官僚作为后盾。在伪满时任保甲长、伪协和会分会长等职。他一贯联系拉拢牧区上层人物，与章盖、哈丰（均系旧社会蒙旗官名）都有来往。特别是对上层乌哥尔达（官名）和正堂（官名）之流，每逢节日馈赠厚礼。每年在春夏之际去外旗一次，亲到上层人物及富裕牧民家中送礼看望。此时，正是羊毛即将剪绞的季节，藉此可以多买些羊毛，获得更多的利润。为了得到牧民的信誉，每遇牧民婚丧也必按牧民风俗赠送不同礼品。这样也能多做些生意。

在收购羊毛的季节里，各大商号以及外国洋行、外国商人都要大力收购，甚至互相争夺排挤。羊毛初开行时，把行市等级提高，当牧民知道行情高于其他人家后，拿去出卖时，即将价格等级压低，到收尾之际就压得更低。牧民拉来毛，价格由他们定。精明些的可多卖一点钱，诚实的就要少卖钱。有时将一级说成二级，甚至估车时故意压低重量。在过秤时也是用大秤，加五至加十。收购皮张也是压等压价，十张大皮，却说只能挑出三至四张。以此，谋取不合理的利润。

在外旗，多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商品，现金交易比较少。冬春两季，流动车出草地的次数较多，在中心地带设立定居点，牧民冬季所需要的商品，较远地方尽量在大雪以前用流动车运到，并出流动车到各牧民家里交换皮张、牛、羊等。交换后及时地和集中点联系，补充货源，运回皮张。冬季，多数牧民要到外蒙古边界放牧，路途远，下雪多，不易行动，所需的物资，大部分用皮张在当地交换。小商小贩货源不多，运输力薄弱，此时恰是瑞兴泰的黄金季节。他们乘机把商品价格提高，把皮张价格压低，从而取得高额利润。

春夏秋三季收购牛羊比较多。春天雪化草长，赶牛羊也比较方便，冬季收购的羊多数在春天运回，尤其是春天收购的二岁羊，到夏季就成为三岁羊，吃上青草上膘，体重增加快，利润更多。当时商人有一句谚语：“买瘦放肥，强似做贼”，其得利之厚就可想而知。

春季牧民们就要从遥远的边境回到内地来放牧，因此，在雪化以前，大量准备商品。此时，流动车也就出得次数较多，大量收购牛羊。同时，将远出的定居点全部搬回分店，随着牧民流动。此季节所出的大部分商品是白面、糜子米、靴子、砖茶、酒等货物。因为冬天行动不便，沉重的商品更是缺乏。为了争取时间在清明节前后赶到目的地，多收购些牛羊，各大商号都要到草原行商，稍迟一步在利润上就有差别。外旗行商，春天出车到草原后，住在牧民集中点，先行探听商品缺余情况，而后定价出售商品。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交换行市概况如下：每疋三分曲绸换大羊二只、二岁羊一只。每疋五分曲绸换大羊三只、二岁羊一只。每双蒙古靴子（海市出品）换大羊一只、二岁羊一只。多伦

出品的透油底蒙古靴换大羊两只。透油裤一条换大羊二只。三六块（一箱）砖茶五块或六块换一只。每件好褙裤布料换二岁羊一只。每袋白面（三十斤）换二岁羊一只。每袋糜子米（亦称稷子米一百六十斤）换大羊二只。每疋白细布（一百〇八尺）换羊二只。当时每一头大犍牛可以换羊九只至十一只。每头乳牛换羊五只至七只。马的价格不等，看马议价，一般在六十元至八十元左右。特别是羊毛价格更不正常，多以海市外国洋行牌价与天津牌价为主。

由于各商号互相争购，以及外国洋行的排挤，因而当地有不少民族商业被吃掉。一九三〇年就是一个例子。羊毛初开盘之时，价格很高，羊毛收进后，即将价格降得很低，一百斤羊毛不到三元。海市多数商号受到排挤，瑞兴泰也是受排挤最严重的一家，当年全部盈余弥补了羊毛的亏损，尚感不足。流胎羊皮及马驹皮、狐皮、狼皮、羔腿、细毛皮张都是按洋行行市销售，总是忽涨忽落的。如狐皮常常一日有三个行市，早晨每张三十元到晚间就落到十元，羊流胎皮更是如此。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瑞兴泰在海拉尔是收购牛、羊、皮张最多的一家。每年收购羊毛最少在五万斤以上，最多则达十万斤以上，收购羊三千到六千只，收购牛两百头以上。因为海市牛羊价格较低，又经常销售不出，所以每年集中在甘珠尔庙，待庙会结束后再到外地出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去张家口、多伦等地出售。去张家口六次，每次去，羊都在两千只以上，牛一百头左右，加之皮张等物，获利甚厚。但恰值日寇侵占张北，也受到了损失。一九三三年以后，由于日寇侵占我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关内外经济封锁，不能前往张家口推销。牲畜皮毛相继由日商关武商店、伪满皮毛合作社与伪满畜产公司三家

垄断，不许其他商号买卖，旅蒙商只能交易部分现金。到了一九三八年，大部分是分配商品和商品统购，又加上七月二十五日定令货源不易组织，同时受到经济警察、宪兵、特务的摧残，瑞兴泰在海市的门市部只得关闭停止营业，只剩外旗部分人员维持现状。虽由沈阳盖平等处组织部分货源，丝绸商品都是瞒着日本人私自运进来的，但数目很少，到一九四五年解放前夕，外旗仅剩一人看摊，不能进行营业。

另外一九二九年由于中蒙边界战争，瑞兴泰海拉尔及草原的人员逃往昂昂溪、哈尔滨。因无人看管，海市及草原的货物受到了损失。这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次。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海拉尔市，数月后人民解放军进驻，海拉尔市的商业逐渐恢复。一九四六年四月在原来的瑞兴泰旧址，由赵福义主办并投资五股，武哲臣投资二股，用瑞兴泰的铺垫、货架子、栏柜，将瑞兴泰改为瑞蚨昌。当时所投的资本都以物折合，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左右。之后，倍资五千元。在清产核资合营时，为九千元。

瑞蚨昌于一九四六年初开业。当时由于资金有限，经营以糕点加工和鞍鞴加工为主，并有部分布疋等杂货。当时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一九四七年春季以后，货源日见增多。曾试图到草地行商一次，带了毯毯、湖绉部分商品等，由于颜色比较好，看价格也比其他行商低，只到了一个牧民组，就推销一空，在牧民中印象很好。由此以后，每年都在春天出外旗行商，秋天全部回来，冬季只剩一人收购部分皮张。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即以经营民族商品为主，兼招待来街牧民居住。鞍鞴和糕点逐渐缩小，一九五〇年以后即不再经营糕点。

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每年接待牧民很多。进街的牧民主要是

购买烟、酒、米、面及绸缎布疋等日常用品。牧民带的多是牛羊及皮张，每次进街大多数住五、六日。住宿虽不收住宿费用，但牧民所带的牲畜、皮张都交付过栈费，每只羊收五分，每头牛值一百元的皮毛收百分之五。所得的利润，比收宿费还高出几倍。牧民来往，大多数需要的商品都要在本店购买，能得到很多的利润。

每年春季化冻之前，即去草地行商。主要以西新巴旗、宝东、宝西、河南三个索木（区）为主。任务是收购牛羊和皮张东至夏秋之际，收购羊毛。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收购羊毛最多，达三万斤左右。收购的牛百头左右，羊五、六百只。收购的方法也与过去略有不同。主要是春去秋回，冬季雪大不易行走，影响资金周转，即不去草地行商。其它三个季节去外旗行商，行动加快，资金的周转也灵活，随收购随进街出售，随着增添货源。经常有牛车和四轮马车来往不断。因主要以快销为主，所以利润方面比其他行商略低一些。但商品在一个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往返周转一次，并得到草地牧民的信誉。另一方面，来往行动快，能够随时了解海市牲畜皮毛价格，摸清草原上所缺商品情况，以及时运到销售。

春季到草原，首先以拜访主顾为名，拉拢交情，并送些礼品（如糕点、果匣子之类），实际是摸摸物资情况，然后将商品定价。出手快的货物略定高些，出手慢的商品略定低一些。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交换牛羊概况：每一袋白面（四十斤重）换四岁大羊一只。每一麻袋糜子米（一百六十斤重）换大羊二只。每二块砖茶（系二十四块一箱者）换大羊一只。每支藤子马鞭（十六把的）换二岁羊一只。每十八尺斜纹布换大羊一只。每五尺春绸换四岁羊一只。每一疋曲绸换羊三只。羊毛价格，多

是以海市市价为主。关于玉器、烟咀等物、利润都在百分之五左右，春绸的利润有时也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解放后，瑞蚨昌在党的领导下，接受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一九五五年申请公私合营，一九五六年被批准，走上了新生之路。

备注：正堂，系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之厅长，满清及旧中华民国时代副都统之下设左、右两厅，厅长沿清朝官名称正堂。乌哥尔达（汉名为总管）系旗长。章盖（汉名为佐领）系索木达，相当于现代之区长。哈丰（汉名骧骑安）为一般之官吏，章盖之下暨哈丰一人。以上均系满清时代之满州语官名。

内蒙西部戏曲史话拾零

刘 映 元

前 言

内蒙西部在辛亥革命以前，没有遭受战争骚扰，特大自然灾害也较少，蒙汉人民生活在这辽阔的土地上与安定的环境中，经营着牧业和农业生产；同时绥包两地已经发展成为沟通新疆和外蒙古的商业城市，所以当时一般人的物质生活都比较优越，随之在精神生活上也要求迫切了。不象军阀割据、国民党统治一直到绥远沦陷被日伪侵占期间那样煎熬愁苦。

因此，内蒙西部的戏曲活动，曾经有过一个繁荣的时代。不但城市剧场中唱戏，街头唱戏，而且乡村也经常唱戏。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艺术享受，除好多专业戏班之外，大一点的乡村都有业余剧社。凉城的石匣沟，还有过培养艺人的科班，培养出驰名三晋和察、绥的狮子黑。当时各戏班为了竞赛，除用重金聘请内地的艺人，还用暴力劫夺别的戏班的名角。

提到内蒙西部的戏曲史话，是相当复杂的。由于文献没有记载，难以把辛亥以前的全盘情况有系统地加以介绍。我走访了托县霍国珍和呼市从前“大观园”经理王泰和，现将他们介绍的情况，记述整理如下：

由同和园谈起

呼和浩特大西街的同和剧场，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戏园。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霍国珍先生初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时，那里称公庆戏园；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霍国珍再来归化城时，公庆戏园因戏楼和舞台年久失修，行将倒塌，已经关门不演戏剧。

同和园原来是本城陈二挠所开的黄酒馆子的字号名称。陈二挠除了酿造黄酒，还出赁青瓷器皿，很熟习梨园行的业务，并认识山西帮的许多金融资本家，所以领了法中庸银号老板贾宏的本钱，将大西街公庆园的旧址买下重加修葺，把黄酒馆子发展成为一个设有酒座饭局的戏园。同和园落成于何时，霍国珍也记不清楚，只知道当时不注意安全生产，修建同和园时曾经跌死过一个工人。同和园开业演剧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接着市内百业萧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戏剧活动横加摧残，故同和园时常停演。日伪时期，同和园变成放赌的“俱乐部”。抗战胜利后，又酿造了四、五年黄酒，并出赁家俱器皿。到一九五〇年，经济逐渐恢复，戏曲开始繁荣，同和园方重整旧业，并成为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演戏场所，改名“同乐剧场”。从同和园的开演时停，可以回想起内蒙西部的地方戏曲是在怎样地变迁，特别是山西梆子是如何地发展。

内蒙西部的汉民，多半是由山西迁来，所以山西梆子就是内蒙西部的地方剧种。可是在同治年间，山西梆子遭受政治势力的排挤，因此归化城最早的公庆园、庆喜园、嘉乐会馆等演戏场所，开始都演称为“徽班子”的“簧戏”，因为当时的官兵大多是由

北京方面来的，尤其左宗棠攻打马化龙、白彦虎时，把“湘军”“淮军”和“水师营”与“洋枪队”开来归包一带，并在河口和善岱驻防，“徽班子”因而在城市盛行，并且跟着军队到乡下演唱。“徽班子”的艺人不喜欢吃莜面羊肉，白面洗成面筋才吃，农民很难支应，对他们的印象非常不好。光绪四年塞北大旱，各处饿死的人很多，农民不知道这是由于官厅不修水利和奸商囤积粮食的结果，却异口同声地说是“徽班子”给造下的罪孽。

自从“徽班子”跟着“水师营”和“洋枪队”回到南方以后，山西梆子才重新抬头。同和园和燕美园（以前叫嘉乐会馆，以后改为大观园）那时演的山西梆子叫“山陕梆子”，它是山西“蒲剧”和陕西“秦腔”艺人在晋北二州五县与大同地区唱的一种腔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北路梆子”。他和“蒲剧”、“秦腔”，“河北梆子”非常接近。由于“秦腔”经过蒲州而到达太原以北，又伸入到河北省地区，所以秦腔、蒲剧、河北梆子的艺人都能改唱山西北路梆子。不过河北梆子的艺人改唱山西北路梆子时，由于咬不清楚入声的字眼，往往会露出马脚。清末民初时候，归化城有一个著名的演北路梆子青衣戏的艺人飞来凤，他从前唱过“河北梆子”，本地人评论飞来凤时常说：飞来凤什么也都好，就是道白有些牛头味。长安和蒲州的艺人改唱北路梆子，便没有这种说法。山西北路梆子，最适合忻县专区的人演唱，因为忻县人的“刚口”很好，已故的金兰红，和现在的王玉山（水上漂）等，都是这一地带的人。

目前在太原附近唱的山西中路梆子，它形成一个剧种，要比北路梆子晚。它是由祁县渠家创办的“十万班”发展起来的。渠家在清朝是山西的首富，有个渠本桥中过进士，任翰林院侍读。他有两个叔父，一个乳名万万，一个乳名金金，当时人们称为万

财主和金财主。金财主鉴于侄子在朝廷做官，伴君如伴虎，恐怕一旦得罪了皇帝，全族人都要跟着受害，所以把自己那一房的家庭成份，由商贾改变为优倡，用十万两银子成立了一个科班，聘请名师和文人训练演员和编写剧本，名曰“十万班”。据说“十万班”的戏装道具和宫庭中的御戏一样讲究，使用的笏板都是用象牙雕刻的。这个科班确实培养出不少著名演员，给山西的中路梆子奠定了后来居上的基础，并随着山西中路商人的势力推广到许多地方。中路梆子是用太原附近的口音唱的，里边溶化了不少太谷秧歌的韵调，它不同于蒲剧和北路梆子，所以又称“下路调”。下路调是两个半板眼，比蒲剧和北路梆子省嗓好唱，腔音非常圆润，因此它逐步发展成山西梆子的正宗。

在归化城同和园和燕美园演“山陕梆子”的时候，张家口的大丰园就演中路梆子，故下路调在河北省的宣化地区比在内蒙古西部还要盛行。自从北路梆子呈凋谢衰零之势，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中路梆子艺人丁果仙、盖天红、毛毛旦、三儿生、筱桂桃等在“百代公司”灌了唱片，中路梆子更风靡各地。山西忻县、大同和归绥（呼和浩特）唱北路梆子与唱河北梆子的艺人，也差不多都改唱了中路梆子。因为北路梆子是一个半板眼，结果弄得非驴非马，成了一个“四不象”，单是道白中的一个“我”字就有五、六种念法，既不是“蒲白”也不是“京白”。据霍国珍说：“好像是醋溜红薯加山药旦，着忙的时候连我们托县的酸捞饭也端上来了”，已经失去了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原有的味道；这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很需要纠正，否则就失去了各个剧种的独特风格。

山西梆子在归绥，解放前主要是供山西商人享乐。清朝时同和园和燕美园为商人独占。他们的饭座固然谁也能订，可是经常被一些大商号完全包下。穷人进戏园“贴对子”（没有座位站在

支柱底下好象贴上对联一样)看戏,常常被跑堂看座的用油布甩打。商号每逢四季过鏢,三年算帐,尤其在冬天从“外路”满载而归,都要在戏园大摆宴席请客,许多掌柜的一天能接两个戏园和三个“小班馆子”的请帖,所以到戏园看戏要派伙计们出席顶替。用钱捐上功名的财东或是经理,在请客时还要穿上官服顶戴,跑到舞台上用“宝瓶壶”向客人们表示敬酒,以示排场阔气,实际也算一出丑剧。

社戏和官戏

归化城在清末民初,除了十冬腊月,人们每天都可以不用花钱,到各个庙上看“社戏”。这些戏剧的演出,由各行各业的会社所举办。归化城的工商业,在没有工会和同行业公会以前,就有社团的组织,选出乡耆、统领和会头,在供奉祖师的庙内办公。除了纸匠的公义社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外,其余的会社主要是给清朝和民国的官府支应差事,并调解行业内部的劳资纠纷,有时也办理一些福利救济公益事业。每逢祖师圣诞或在固定日期,由商号按厘股摊钱唱戏,亦是这些社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归化城当年的“坐商”,在旧城三贤庙“乡耆府”(即以后的商会)顶厘股的共有七大社和八小社,还有顶不上厘股的外九社。“行商”七十一家也各自有社。连同理发馆、靴匠铺、银匠炉的“净发”、“靴匠”、“银行”等社,以及街道上的“平安社”与各处的“同乡社”合在一起,清末民初时归化城共有二百多个会社。单是臙旦街玉皇阁一个庙内,据现在的碑文牌匾记载,就有“福虎”、“敬仙”、“三皇”、“骡店”、“车店”、“饭行”、“马王”、“大仙”、“公和”、“公议”“义仙”、“崇

丰”、“长寿”等十二个社的名称。其它各庙也都有好几个社或十几个社供奉祖师。各社每年至少唱一台戏，所以新旧两城几乎天天有社戏可看，加上梨园行白尽义务唱的“官戏”，有时一天之内有好几个庙唱戏，象三官庙、什王庙、南茶坊庙、一庙之内甚至有好几个剧团唱对台戏。

每年阴历正月初四，旧城由上栅子的平安社开始唱戏。紧接着各庙都连续不断地唱戏。小东街的关帝庙在五月一个月內，只有三天歇台。新城正月初八在东西落凤街口搭台，给鼓楼的玉皇阁唱“八仙戏”。元宵节，五月十三、六月六都在关帝庙唱戏，正月间万寿宫（现内蒙印刷厂）亦有戏唱。其它如三月初三在北街，四月十八在东门外，七月十五日在北门外城隍行宫，财神圣诞在财神庙，以及家庙街的家庙中都有“绥丰”等社主办的社戏。新旧两城到天寒地冻，社戏才停演。每次演戏都是三天，谓之起唱、正唱和末唱。有些个别的社，还在中午和黄昏大戏休息期间，请外号叫“四十九两八”及“花花”、“翠翠”这些当时的土娼表演“二人台”，称“小班儿接台”。

官戏是剧团给官厅白尽义务唱的戏。演员除由官方供给伙食，还能得到一些官吏表示阔气的“赏赐”。如果是单赏给某一演员的，仅是奏乐和管箱的人能分一点。要是赏给全剧团的，按箱子顶六股，班主、“成事的”（导演）和管衣箱的各项两股，其余每人顶一股，叫做“人头股子”。管衣箱虽然顶两股，但是只能落一股，另一股是替“大师兄”（狼神）顶的，以供修补戏装的针线开支。官戏在清朝时，新旧两城照例共唱四台，新城在将军衙门，旧城在道台衙门，副都统衙门和二府衙门。有时因为临时酬神，也常“拉官戏”。民国成立以后在衙门口唱的官戏已经取消，但酬神的官戏仍不断演出。一九一五年新城北门外发

大水几乎灌入城内，曾请叫海棠花的河北梆子演员演唱酬谢过河神；一九二九年口外抗旱，大观园的山西梆子在新城南街搭台演戏祈雨。

不论社戏和官戏，虽然每一个市民都可前往观看，但是工人、店员和负担家务的妇女，很少能够获得看戏的机会。天天看戏的多系一些“有闲阶级”。清末民初时，归化城是一个剥削和消费的城市，商人除在这里把牧民农民的牲畜粮食变成银钱，大量汇往“府十县”和“二州五县”^①，还在本地养活了不少寄生在商业基础上的闲杂人员。这些闲杂人员也都是一天两顿馆子，抽足大烟便以看戏消磨时间。原先皮毛行的“兴隆社”和羊马店的“京羊社”在北茶坊羊王庙唱戏，大同同乡会的“云中社”在旧城北门里给北城楼上的神象唱戏，以后因为剧场过小，容纳不了一年比一年增多的观众，“兴隆”和“京羊”两社移到后沙滩北边的康三圪旦演戏，“云中社”移到观音庙南边的孤魂滩演戏。社戏正在朝“外台子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由于外蒙古的商路断绝和内蒙古的农牧业的凋敝以及资本主义商业的衰落而垮台，在三十年以前即行停演。

“外台子戏”与“踩青儿”

归化城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不仅新旧两城于春夏秋三季由工商业的会社轮流“写戏”演唱，郊区东西乌素图，前后巧尔报、大小台什、以及土默特旗有戏台的村庄，也都于草青杏黄和麦收瓜熟以后，由村社邀请剧团给龙王唱戏。从阴历四月初到八月下旬，

注①：清代，太原府属十县称“府十县”，忻、崞二州及附近五县称“二州五县”。

可以说城里城外天天都有社戏可看。这时商贩、土客、流娼、赌徒和浪荡子弟，一股劲地跟在戏班后边到处乱窜，许多“耍剥人儿”的流氓地痞，亦要在这种旺季中弄够一年的吃喝，老归化城人称乡下唱的戏为“外台子戏”，到乡下看戏叫“踩青儿”。

“外台子戏”名目上是为了酬谢神灵，戏台上还吊着“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的大字横额，实际上是大户们藉唱戏向农民敛钱，给自己摆谱。唱戏的前五、六天由村里大户人家出的“会头”们就到庙上起伙办公，社房外边挂出虎头牌与黑牛皮鞭子，厨房中有跑村的给宰猪杀羊，如同张罗红白喜事。农民把这称做“灰人上庙好人上吊。”城东三和渠灌区的“上四村”和“下三村”，会头们唱戏上社，早晚两顿饭都开海菜宴席。因为不掏自己的腰包，对于戏班的供应也特别优厚。艺人们下马后头一顿饭是肉丝粉汤烙糖饼，另外唱三天戏，还送二百斤重的一口肥猪和两只四五十斤重的大绵羊。其它村庄每逢唱戏，亦都在庙上的禅房或大户家里布置成精致的客厅，招待省县的委员、地方的士绅和军队的官长，烟茶酒饭的开支，以及“跳加官”的赏钱和“叫条子”的局钱，最后都摊派给“花户”。

旧社会领戏的班主，多系赌博起家的“白花”。他们领戏只是一个幌子，主要是依靠放赌赚钱。戏台附近都有“宝棚”，雇着“扣假盒子”的“宝馆”哄人，只要下注就会上当，如输了牲畜粮食，派出亡命徒去登门索要。所以常常在唱社戏后，有些普通农民倾家荡产。辛亥革命以后，归化城大召前的公开“宝店”取缔，许多“赌博汉”都依附戏班到乡下活动。班主为了达到放赌的目的，除了给官人们开“好汉股子”，有时还强迫剧团的坤角和旦角陪伴这些家伙们玩乐。城东徐家沙梁村恶霸地主徐福安家中，有一个领戏的四寡妇，人们都叫她“四班主”，出门时骑着

大个儿叫驴，身上带着八音手枪，坐在“宝棚”中比光棍还要泼辣，拿起皮鞭叫帮凶的小子吊打艺人，较土匪尤为凶狠。

“踩青儿”在其他地方叫做“踏青”，是城里人郊游的意思。从前归化城的商人富户，最讲究乡下唱“外台子戏”时“踩青儿”。起唱以前就派人先到戏场搭好帐棚，上边盖着帆布、油布，底下铺着骆驼屉和马褥子，外面安好地灶和茶汤壶，出行的时候坐着轿车，带着食盒，还随着眷属或邀着亲友，连仆役伴当黑压压地相随着一大帮。他们到了戏场，并不挤到人群里边看戏，先是躺在凉席上抽鸦片烟吃点心，然后摆好宴席或升起火锅子请客。不带女眷的，叫“平康里”的妓女侑酒。当吃饱喝足以后，才摇着团扇到外边转游。

在唱“外台子戏”的时候，农民正是夏锄紧张或是秋收繁忙的时候。很难抽出工夫看戏。按照归化城从前工商业的陈规，阴历五月十四到七月十五这两个月期间，允许学徒夥计和老师傅轮班在下半天放工，去乡村看“外台子戏”，并由资方发给每人五个制钱（以后是五枚铜元或五分平市官钱局的票子）。但许多工人、店员不愿灰溜溜地挤到戏场当中，多是利用放工的机会，在家休息养神，至于贫雇农和城内平民家的年轻妇女，到了戏场因为没有车辆保护，裹到人群当中，常受恶少们凌辱，她们被脱掉绣鞋，得赤着小脚往回跋涉。因此城里的寒苦良善人家，不许闺女、媳妇看“外台子戏”，只是黄昏的时候，到南北西三茶坊庙附近“赶小会”，权当下乡“踩青儿”。“赶小会”也是归化城从前的风俗。即当“外台子戏”下午散了以后，有钱人坐着轿车回城，车夫们互相竞赛，看谁的骡子好车快，两旁站满密密麻麻的人群，如同赶会似地参观这种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情景，故谓之“赶小会”。

大秧歌

“大秧歌”是保存于山西晋北朔县和繁峙一带的一个古老剧种。曾经流行于我区乌兰察布盟，特别是土默特平原，开始叫做秧歌，为了区别于街头扭的秧歌舞和高跷、旱船、车灯唱的秧歌，故改称为大秧歌。据老艺人们传说，在残唐五代时，被北汉统治的现今晋北地区，农民中就有了多种多样唱法的秧歌，共七十二调，后来受了元曲的影响，才由田野和街头走上舞台。大秧歌不同于太谷、祁县的秧歌和应县、怀仁的“耍孩儿”与“道情”，目前只有山西上党地区的襄垣秧歌跟大秧歌非常类似、接近。可见在明清时，山西的许多县都有过“大秧歌”。内蒙西部的人多系晋北地区的移民，故于乾隆以后把“大秧歌”也从口里带到口外。因为秦腔由陕西过河，发展成蒲州梆子、上党梆子、北路梆子和以后的中路梆子。大秧歌被排挤到偏僻边远乡村，变成了不能跟大戏竞赛的小戏。

全国各个剧种的艺人，多是供奉唐玄宗李隆基为祖师，唯独“道情”艺人供奉八洞神仙为祖师，大秧歌艺人供奉天官、地官水官所谓三官大帝为祖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它剧种都发端于城市，“道情”出于庵观寺院，“大秧歌”则是来自农村。“大秧歌”除了职业戏班，在山西朔县、繁峙、山阴等县的各个村庄，以及我区土默特旗不少乡镇，过去都有“大秧歌”业余剧团。他们都是在冬天农闲时排练，到春节以后的元宵节表演。土默特旗各乡镇的业余剧团常打“坐腔”，有时也借上行头登台。朔县一带的业余剧团则是在阴历正月十五前后，村村都打成“土摊”装起身子在街上表演，据说供奉三官大帝为祖师，亦是从这种“胡闹三

官”而缘起。“大秧歌”在朔县一带的农村中是根深蒂固的，过去的男人们，差不多都曾参加过这种剧团。土默特平原的农村中，直到现在仍没断绝了“大秧歌”的清唱，有好多人都会有“大秧歌”的丝竹和打击乐器。呼市郊区西菜园乡的淌不浪、攸攸板乡的塔布板曾恢复了“大秧歌”业余剧团。太平庄乡五路村过去的“大秧歌”业余剧团，是在阴历腊月初三上庙排练，每天由“社上”供应一顿夜饭，正月初五起先装上身子“跑街”，到元宵节前后登台三天即行结束，至今还留下两顶戏箱。可见“大秧歌”在呼市郊区和土默特旗也盛极一时。

大秧歌在乐器上有横笛伴奏，外边的人猛一听好象是山西北路梆子，其实它有自己独特的板眼韵调。“大秧歌”和“北路梆子”由于互相影响，秦腔和蒲剧由“山陕梆子”形成“北路梆子”也受了大秧歌的许多影响。因此，“北路梆子”艺人和“大秧歌”艺人，都可以互相改唱，只是“北路梆子”用“蒲白”，“大秧歌”的道白可以用本地话。现在山西梆子（包括中路北路）唱黑头戏的名艺人张家口晋剧一团的金铃黑和包头晋剧团的三娃黑，就是出身于当年萨县章圪台村土旗蒙人转转所领的“大秧歌”班。“大秧歌”三分之一以上的剧目，是由晋剧搬来的。自己的传统剧目，现在由山西文化局整里出来的有七十多个。里边包括从列国伍员的“过江”，到明朝王景隆的“关王庙”和何文秀的“三复生”等本戏和出戏。我国各朝各代在民间流传的故事过去多能在大秧歌里边看到。解放以后，“大秧歌”也吸收了昆曲的“十五贯”和豫剧“审诰命”等优秀剧目。因为演员正在青黄不接阶段，还不能演象“小二黑结婚”一类的时装现代戏。

在“大秧歌”的传统剧目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充满了代表农民思想感情的主题。“水浒”戏在全部剧目中所占的比重很

大，并且丰富多彩，有我们在其它剧种里看不到的“刘唐下书”、“李逵搬母”和“雷横打枷”等戏。“宋江杀楼”中阎婆有很长一段快板，多了唐牛儿和名叫冯商的衙役这两个角色。“雷横打枷”本戏中有好几出戏。“小嫖院”很形象地刻画出郟城知县石老爷嫖院和白秀英在枕头上陷害雷横的丑态。此外在“大秧歌”的传统剧目中，还有有关刘秀的“李大开店”、姜维的“安安送米”、郭威的“草场”和“乌玉带”、以及“王宝钏搬窑”、秦雪梅“教子”等一些在别的剧种里不常演的剧目。山西朔县的农村中尚有三十多个一直在街头表演的“大秧歌”剧目，始终没有走上舞台。“大秧歌”的老艺人，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期间转业改行及穷困死亡的很多，目前健在的很少。朔县“新乐剧团”只有一个任广禄，艺名梅梅旦，过去常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附近演唱，本地的大秧歌艺人，只剩下白海纳等少数人了。

“字号班”与“娃娃班”

清朝时的纨绔子弟，除因吃喝嫖赌变得窘困潦倒而外，也有由于领戏当班主而倾家荡产。领戏当班主这一行当是“好人的害，灰人的菜”。他们固然剥削艺人，许多流氓闲汉亦剥削他们。在旧社会很少有领戏暴发起来的人家。可是好多人为了贪图眼前的红火热闹，明明知道领戏赔钱，亦愿意过一过当班主的瘾。并且班与班间竞争非常激烈，甚至结下你死我活的扎刀仇恨。当时不仅是地主老财领戏，手艺人 and 蒙古人里边也有当班主的，如归化城的刘靴铺家、羊盖板的蒙民海旺（旺盛班的班主），究竟内蒙西部先后有过多少戏班，还没有切实数字。不过这些戏班共有三种类型，一种叫“字号班”，一种叫“娃娃班”，

一种是既有字号也有娃娃的戏班。

“字号班”是立有字号的戏班，多半财力雄厚，虽然自己没有戏园，但是置有戏箱。归化城的“字号班”，现在能记起的，只有吉升班和长胜班，当然在很早以前还有许多“字号班”。这些戏班经常在城市演出，春夏秋三季在各庙唱社戏，有时到近郊和远郊的富裕村庄唱“外台子戏”，到了秋天，才进戏园。当班主的是在每年春节以前搭班，用包银约聘演员，到春节以后出台，所以必须先垫一笔很大的本钱。光绪年间誉满塞上的千二红，就是因为每年包银一千二百两而得名。在乡下演唱的也有“字号班”，每年秋末唱完“谢茬戏”后，没有下处养活“班底”，亦得供给柴米油盐，否则到了忙时即无法搭班。著名艺人是先付全数包银，普通艺人只能预支三分之一，遇到班主亏累，或是艺人出了其它问题，便彼此无法偿还，到了民国以后变成了月薪或每台每天分股子。

一个字号能否兴隆，看有无好的演员。象千二红、金兰红这些人，只要有一两个在班内，便能提高“字号班”的声誉。红黑生旦都是班子里的名角，很不容易搭凑。因此好演员成了班主的眼睛珠子，用尽各种方法网罗保护。李世芳的父亲李子健，少年时在丰镇的“字号班”演唱山西梆子(艺名满庆)，张家口的“字号班”看见是一株摇钱树，但是已经支了丰镇“字号班”的包银”出多少钱也得来年才能拉。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便不择手段，让参加过包萨辛亥革命的胖挠子张万顺去抢劫，酬金是五百两白银，结果李子健由丰镇被抢到张家口。其它地方的戏班，也有类似情形。有的“字号班”抢名角得不偿失，但是为了打赌气，虽然赔钱也要如此蛮干，因而时常发生械斗。过去的戏班就是赌窟，除了艺人而外，还有好多赌徒担任打手和保镖，连同闲杂人等，那一

个戏班都有一百余人吃饭。所以班主徒有虚名而无实惠，不如园主和箱主坐享其成。民国以来，人们只知道戏园的名称，不大提及戏班的字号。象大观园的戏，班主是忻县人王泰和，园主是新城的满民关姓，箱主是大同人魏殿臣，王泰和领了一辈子戏，结果欠了不少债，而关姓和魏殿臣却都置有产业。

乡下的领戏班主没有资力到外地聘请名伶，同时打手也软弱，无法向别的戏班抢人，便自己培养人材，这种班子就叫“娃娃班”，学戏的娃娃都是少爹没妈的苦寒孩子，有的写给班主，有的卖给班主，由班主派师傅教练。写给班主的学成以后，白给班主唱戏三年，卖给班主的成了班主的螟蛉子，终生受班主剥削。“娃娃班”起初多半是以成人演唱为主，娃娃演唱为辅，到了后来逐渐以娃娃演唱为主，成人演唱为辅了。清朝时候的衣食特别便宜，乡下唱戏都由村社支应伙食，冬天“码戏”以后，也用不了多少钱在下处附带养活娃娃。因此乡下演唱的“人名班”，差不多都收容着贫穷儿童，赶到三年五载学成以后就可替班主赚钱，平时跑龙套也能节省雇用成人的开支。

归化城附近领“娃娃班”的，在光绪年间以侯攀龙最为著名。侯攀龙最后倒了运，流落在河套，把买下的娃娃都给卖了，其中的一个便是王同春的干儿刘九小。刘九小依傍王同春也成了大地主，在五原城西北立有“继荣堂”牛旗。他的儿子刘子俊还算是地方绅士。刘九小有一次惹怒王同春，王同春才当众揭了他的底，说他原来是侯攀龙戏班的娃娃，买的时候用秤称了一下，只有十九斤重，共花了九两银子，故给起名为九小子。由此证明侯攀龙红旺过一时，最后穷困到卖娃娃的地步。除了侯攀龙而外，和林的“二八怪”，凉城石匣沟的“老狗头”，东山沟的丁考子和奇汉子都领过“娃娃班”。

“二八怪”的“娃娃班”又称“贵贵班”，打出卢三红、董万年

和老福义等名艺人。卢三红和董万年是“隔山弟兄”，一个是胡子生，一个是青衣，他们都是东山沟代州窑子的人。卢三红曾经驰名归、和、萨、托四县，六十岁以后入了王泰和的大观园戏班，叫座力仍然很强。他因为出身寒苦，在未进城以前，每年冬天“码戏”之后，回家上山割柴草，生活特别简朴。闺女和儿媳妇也学过戏，但他不许搭班登台，怕受旧社会流氓地痞们的欺侮。他说过“我拿老骨头赚钱，养活你们”的血泪话。老福义是山阴窑子人，肚里记的剧目戏词很多，是民国以来很有名的“成事老板”（导演），连太原的说书红和盖天红，都不敢小瞧。老狗头是石匣沟阳坡窑子附近大南沟的人，在自己家里打了一班娃娃，聘五秃红担任教师。最著名的有三子、根换子和金锁子。这几个娃娃打成以后，轰动了整个土默川，引起归化城杏升班的嫉妒和羡慕，派出二十多个打手，硬从石匣沟抢到城里。三子学的是须生，因为往回逃跑，被班主捉住将嗓子弄坏，再不能登台演唱。根换子艺名筱蝴蝶，因为演唱卖劲得了痲症而死。金锁子就是狮子黑，以后成了山西梆子的名净。“老狗头”经过这次打击，便再不领班。东山沟的丁考子和奇汉子，他们打出的娃娃很平常，只是出过路膊生一类的普通演员，不象“八二怪”和“老狗头”培养出的人材多。

民国以后，娃娃班已不多见，艺人带徒的较清朝时增多，特别是女艺人怕年老色衰生活没有着落，在红旺的时候就收买贫寒人家的女娃娃做为养女，除了唱戏还逼着卖淫。养母一家许多戏班的坤角因为不堪养母虐待，成天吵架斗殴，有的跟人潜逃，有的服毒自杀。解放以后，她们才跳出火坑，有了人身的自由。

（一九六一年）

晋剧名伶趣闻琐谈

蔡凤岐

前 言

前年，报界老前辈刘映元先生写了“西口菊部旧闻”一篇长文，我如获至宝，一连看了三、四遍。先生广闻博采，文章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我为了弥补山西梆子在西口活动的史料空白，再作一些补遗。

我仅仅是一个山西梆子爱好者，严格说来，对戏剧是一个外行。但由于喜爱，加之多年来的耳闻目睹，也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在搜集过程中，我深感资料的贫乏。这是因为过去的士大夫阶层把它视之为“下九流”的玩艺儿，再者，过去梆子戏的大多数观众、演员，或目不识丁，或粗通文字，当然更谈不上为其树碑立传。这样，导致好多事情失传。眼看老艺人、老观众一年比一年减少，再不抢救，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仅有的活资料也怕保不住。因此，我感到有一种十分紧迫的责任感。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经过一个不算短的业余时间的紧张搜集，终于抢救了一部分宝贵的资料。我把它公布于众，权当抛砖引玉，希望有识之士写出更完美的续集来。

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的关系

我们现在听到的晋剧，正是山西的中路梆子，俗称山西梆

子。

中路梆子大约在光绪年间形成它的雏型。关于中路梆子的来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北路梆子名艺人“捞鱼鹞”因坏了嗓子，不得已降低调门，逐渐赢得观众，从此发展成中路梆子。

另一说法是：晋中宁二少爷渠本翘考中进士，其叔渠筱州怕他以后官大犯法，连累满门，于是出银十万两，组班领戏，揉合晋中秧歌，改用新调，听起来柔和舒展，得到富人、市民的支持，不久之后，囊括韩侯岭北，石岭关以南，把北路梆子挤到石岭关以北。

北路梆子要比中路梆子古老得多。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中路梆子正是从北路梆子分化来的。北路梆子早期的艺人们多在农村演出。那时没有扩音设备，为使观众听清，文武场面调门相当高，艺人们不得不用背拱音的唱法，听起来高亢激越。后来进入城市后，在园馆唱戏，再用那种唱法人们就嫌吵得慌。于是调门也渐渐低了，手提的小锣也换成挂吊的大马锣了。这在客观上对中路梆子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正因为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有很深的血肉渊源，所以过去人们把北路梆子统称为山西梆子，这是很有道理的。抗战期间，北路梆子因失去了活动的地盘，更加衰落，很多北路梆子艺人改唱了中路调，如刘明山、刘宝山弟兄，水上漂、三女红等，很快就能转到中路梆子的阵营。这也说明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是如何地接近。

即便同是中路梆子，因地区的不同，风格也有差异。如太原、大同、呼市、张家口的中路梆子，风格就有明显区别。

同是北路梆子，也有大北路、小南路的区分。再细一点，还

有代州道、云州道、蔚州道的分别。这有待于专家们去深入探讨，本文就不多谈了。

本人认为，北路梆子是源，而中路梆子是流，两大流派都应称作山西梆子。

我所知道的北路梆子早期名伶有排场红、挖料红、金镜红、一枝梅（名伶刘德荣的过门师傅）等。稍后有十三旦（侯俊山）、盖北京、盖七省、玉印黑、两股风、三盏灯、玉石娃娃、要命旦（刘德荣，刘明山、刘宝山之父）、飞来凤、千二红、十三红、九条龙等，再往后则有金兰红、八百黑、十六红、十八红、卢三红以及北路梆子第一代坤伶女白花（生角、大同人），中路梆子第一代坤伶大牛牛、二牛牛等，再往后则有花女子、腊玲子、鱼儿生、水上漂、刘明山等人。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一一追述已不可能，我只着重谈谈西口外以及对西口外山西梆子有重大影响的部分名伶的身世、轶闻和有关他们演出盛况的一些精彩场面。

一代宗师金兰红晚年轶事

“西口菊部旧闻”一文中说，金兰红本名叫赵雨亭，生于光绪四年。照此推算，他是一八七八年生，正好和京剧名武生杨小楼同庚。据我所知，收养他的人名叫“玛瑙子”，是当时著名的好汉。赵雨亭稍大一点，就拜在张家口十七生的门下学了戏。

金兰红是须生行当中的全才，文戏武戏都很出色。不悉是民国三年还是四年，金兰红和师兄二奴旦（姓范）来归化城唱戏，戏台就搭在玉泉井以北，大召以南。看戏的人山人海，第一天就挤倒了

召庙前的一个石狮子，砸死一个人。为此，当时戏班停了一天戏。

当年金兰红在西口外影响非常大。那时人们形容一个人心眼多，往往说：“你这人肚里的弯弯调调比金兰红还多哩。”

呼市晋剧团打板的祁顺，他的师父小名叫“团儿”，给金兰红打了几十年板。祁顺有一次给我学唱了金兰红晚年的唱腔。他的唱腔和现在忻县著名北路梆子须生李万林的唱腔很相似。他唱时只唱半口，拖腔往往由丝弦带过。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年纪大，气短累了的关系。有的资料说他是用本音演唱，但祁顺一口咬定他是用背拱音（待考）。

金兰红死的那年，祁顺年仅十三岁。一九三三年旧历七月十五日，金兰红、小翠仙、花女子等在大同西门外龙王庙会上唱了几天戏。头一天演全本“汴梁囚”，金兰红饰刘王，小翠仙饰东宫花女子饰西宫，杏娃黑饰白脸。“杀宫”一折，金兰红发挥了搦子功的特长，表现刘王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博得了台下雷鸣涛吼般的彩声。以后又唱了一天“十王府”，金兰红饰十王。

在“灯棚杀驿”一剧中，金兰红饰吴承恩，花女子饰家嫂王夫人。“换子”后，吴承恩回府把女孩递给家嫂，王夫人抱住孩子，亲昵地一摸，发现孩子小鸡鸡没有了，二人立即惊得目瞪口呆。究竟他们是怎么个演法，我没见过，但听祁顺说：当时观众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忘了演员是在做戏，也忘了他们是在看戏。二位名伶的表情、身段、做戏真是演绝了。后来祁顺也多次看过其他艺人演这出戏，但都没有金兰红和花女子那么打动人心。

最后一天是“宁武关”，金兰红饰周玉戟。在这出戏里，金兰

红有几手绝招，就是手中的大枪和马鞭，头上的箭彩，在下关和母亲难舍难离的表情和身段，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顺便说一说，金兰红是北路梆子的“北路派”，和“小南路”的演法不一样。“北路派”动作舒展大方，锣鼓点子规范严谨，“小南路派”动作俏丽花梢，锣鼓点子显得红火热闹。

据说金兰红有一次到崞县和当地有名的十八红打对台，就栽给了十八红。十八红名叫赵金虎，戏路子和金兰红差不多，也是马鞭捎子髻口抓人。“走边”一折，都是金兰红和十八红的拿手剧目。十八红的动作，就明显地比金兰红花梢。他们二人的动作特点，名老艺人陈宝山曾给我作过示范。

我母亲当姑娘时，在家乡看过十八红的“宁武关”。当时老天正下大雨，但观众却一个都不走，被十八红精湛的捎子功吸引住了。

内行认为，从艺术和名望上看，金兰红要高于十八红。

金兰红逝世以后，后来西口外还出现了乔三红（名青衣猩猩血的丈夫），四喜红（现在丰镇艺校看大门，姓王，年约七十四、五岁）能演宁武关一类的重头戏。

这年阴历九月，大同智家堡要唱谢茬戏，请金兰红所在的戏班去唱。那时枯瘦如柴、有严重鸦片嗜好的金兰红，由于经常咳嗽气短，已发展到咳血。本不打算登台，但戏迷们一致要求：“那怕金兰红在台上站一站也好。”他只好答应这种盛情难却的请求。于是，智家堡的人用轿车把他接去，他和年方二十八岁的花女子唱了一出“风仪亭”，金兰红反串董卓，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

回去后他的病情日趋严重，终于在旧历十月初二死在自己院

中，享年五十五岁。他死后眼睛睁得很大，小腹深深地凹陷下去，胸脯挺的老高，遍身发黄。头上仍留一条小辫子。从现代医学观点看，他可能死于肺心病，但也不排除肺癌。

死后丧事很排场。红松棺材，柏木堵头子，里面用黄腊和松香打过，再贴上黄绸里子。外面用黄缎里子，红缎面子套棺，两班鼓匠吹鼓，三十二人抬扛，把灵柩寄在大同西门外白音寺达数年之久，后埋葬在七里村。因为当时有个说法，鸦片烟瘾越重的人骨头越值钱，因怕有人盗骨，故尔寄放白音寺。

金兰红平素是个很古板的人，头上留着清王朝遗留下来的一条小辫子，脚上穿一对双鼻梁鞋或礼服呢鞋，冬天戴一顶风帽，穿一件狐皮大氅。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癯。他从来瞧不起唱戏这一行，也不希望儿女们学这一行，甚致也不让儿媳妇看他的戏。他说：“公公在台上冲住北风灰嚎哩，儿媳妇在台下有甚看头哩”。

金兰红生前唯一的一张“芦花计”剧照，被其儿媳在“文革”中自动烧毁。从此影息神消，没有留下一点表演资料。但最近呼市晋剧团的李长礼和我说，他的二哥李长义（大同艺校琴师）家中还有一张金兰红、锁柱黑、车馆红以及一位不悉何人的四人合影的照片。另外，在花女子嫂嫂祁秀英家中有花女子的便装照片，在花女子的养女李香兰（大同艺校工作）家中有一幅花女子饰“梅降雪”的大照片，现在都还保留着。建议有关部门应按文物复制保存，以纪念这两位造诣很深的一代名伶。

誉满绥包晋北、文武双全的花女子

花女子是位有高度成就的表演艺术家。在西口外和晋北一

带，花女子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她的祖籍是山西省定襄县芳兰镇人。祖父薄甲，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抬轿夫；父亲薄海云，是纸匠兼磨刀匠。父亲迁到山西右玉县成家后，母亲王氏生下二男一女，长子薄元小，是剃头匠，三十六岁时亡去；次子薄二里，大名薄德，在戏班任拉前场、跟包、管衣箱等职。一九六一年病故；老三薄花女，一九〇六年生，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花女子。

因为家贫，她小时候曾写给锁柱黑学戏。一年以后，家里人去看她，不忍叫她再过艰难的艺术生活，便将她接回；一年后，恰巧北路梆子青衣泰斗李三元在右玉县玄帝庙前唱戏，就把薄花女写给李三元学戏。三元生有一子，名叫富洪。这李三元和刘明山弟兄的父亲刘德荣还有这么点微妙的关系：明山父亲的哥哥刘德堂病故后，刘德堂的女人就嫁给了李三元，这就是富洪之母，花女子的婆母。

后来小小的花女子就成了富洪的童养媳，改名李桂林。但一直和老实巴脚的富洪没有爱情。

不知在什么时候，花女子和比她大两岁的腊玲子高凤玲参加了金兰红所在的戏班，从此和这位须生泰斗开始了多年的合作。在频繁的演出生涯中，渐渐地她和这位比她年长二十八岁的名伶产生了爱情。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多年。花女子所生一子名叫小七子，神智不全。

金兰红的很多好戏均被花女子继承下来。她是舞台上的多面手，红黑生旦，样样出色。时人有“美貌天仙的腊玲子，文武双全的花女子”的美誉。

花女子在“坐楼杀院”中能演宋公明，也能演阎惜姣；在“二进宫”中她能演黑头应工的徐延昭，抬手动脚都是大花脸的

规范动作。当年排演二十四本“白蛇传”和二十二本“二度梅”，白天请人在家中念戏词，晚上就能登台演出。我只看过她一场戏，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呼市晋剧一团演出“白蛇传”，那时的我仅仅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是爱听爱看山西梆子。记得前面“盗草”是任翠凤主演，“断桥”一折是苏玉兰、武仙梅、李金蝉主演，“压发”一折是花女子、赵金瑞和凤凰旦。

解放前，花女子一直在绥远一带唱戏。在呼市演出多在财神庙戏园。一九四九年返回大同，历任大同市晋剧团副团长，剧团工会主席，市人民代表、妇联主任等职务，

一九五三年，花女子回到呼市，参加了呼市晋剧一团。那时她的份子和任翠凤一样多。

在“红梅阁”一剧中，她除了拿手的翎子功外，还有一手跷子功。“闹鬼”一折中，花女子饰鬼魂慧娘，凤凰旦饰 傑英，赵金瑞饰裴生。花女子在这场戏中有蹲下耍水袖连踢小飞脚的绝技，观众场场爆满，赞不绝口。

一九五五年底，花女子和薄二旦参加了丰镇北路梆子剧团。

花女子唱戏时，右手总拿块手帕，掩盖她的六指缺陷。据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对我讲，她的父亲也是六指。这可能是遗传的缘故。

花女子精神不正常已有多多年，经常一个人口中絮絮叨叨，但在台上绝不露相。晚年时找了一位比她小十余岁的旅馆服务员，而秉性忠厚的李富洪一直居住在大同自己院中。一九五八年，花女子因精神病、心脏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一直在呼市大北巷二号自己家中养病，由其嫂祁秀英和两个侄儿薄忠祥、薄忠义服

侍。同年小电灯贾桂林来呼市演出，拜访了她，并应邀为该剧团排演了“二度梅”中“喜台”的一场戏。

五九年花女子病危，其嫂祁秀英和侄儿薄忠祥把她送到大同市人民医院治疗。在这之前，因她精神不正常，在兄嫂的主持下和那个旅馆服务员离了婚。四月二日，花女子不幸去世，由兄嫂和她的养女李香兰（小名拽弟子）一起送到大同市城南的七星屯安葬。当时附近的戏剧爱好者，街坊邻里送了不少幛子，大同市人民政府、大同市妇联、大同市晋剧团等单位送了花圈挽联，沉痛悼念这位誉满晋北、内蒙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

也有人说花女子死后没人关照，金兰红的儿子赵佛把她和金兰红合葬在一起，经我多方调查，绝无此事。

著名坤伶腊玲子

比花女子大两岁的腊玲子名叫高凤玲，生于一九〇四年，属龙。她母亲是位领戏的内行，过门师傅是人称“二先生”的张进才，姨夫就是大名鼎鼎的杏娃黑。山西二州五县一带有“看了腊玲子玉虎坠，三夜两夜不瞌睡，典上房，卖上地，也得再看腊玲儿的玉虎坠”的顺口溜。腊玲子扮相十分俊美，口里人另有“腊玲凭浪，花女凭唱”的说法。腊玲子的拿手戏还有“烤火盆”、“万花船”、“卖人鱼”、“走山”等。腊玲子从小缠足，演“走山”不用踩跷，别是一种天然风韵，走园场一步一颠，十分吸引观众。

腊玲子于一九四六年病故。她死时正值打仗围城，棺材出不去，后来就埋在大同城南的城墙下，年仅四十三岁。所生一女工

马旦，四六年以前死于难产，所生一男叫张文明，小名金元汉，解放后在大同报社工作，现仍健在，已退休。

前辈名伶玉石娃娃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玉石娃娃这个人。玉石根子也确有其人，但影响不及玉石娃娃那么大。最近两年，我访问了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又查阅了一些资料，结果查出了三个玉石娃娃。张家口早期的中路梆子艺人，有个艺名叫玉娃娃的冯宝山，比他稍后，有个刘玉富艺名也叫玉石娃娃。这刘玉富教出了两个著名的坤伶，这就是筱金梅和筱金枝。她们二人曾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过“打金枝”和“双头驴”的唱片。还有一个女徒弟是学须生的，取名富艳庭，后来嫁给小吉仙张宝魁，这就是以后著名的“赛果子”张美琴。

我现在所说的玉石娃娃，正是刘映元先生所指的那个。这个玉石娃娃是繁峙人，班辈要早于金兰红，可能和要命旦刘德荣同时。

一九一五年阴历四月二十九日，山西定襄县上大林村老爷庙前唱玉石娃娃的戏。那年我的姥姥刘玉环是这个村的年青媳妇，约二十四五岁。我的父亲就是这一年这一天生的，所以时间相当准确。据姥姥回忆，当年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争睹玉石娃娃的风采，那高亢激越的音乐与唱腔，声传数里之遥。当年看过这场戏的人差不多都死光了，谁也说不清是唱的什么戏。据姥姥讲，当年她看到的玉石娃娃，就是个老汉的模样了。

名艺人十七生陈宝山在十来岁时看过玉石娃娃的戏。还有一位年过八旬的姓兰的老人也见过玉石娃娃。

据他们讲，玉石娃娃是个正工青衣角色，细高个子，长型脸，脸上有些小麻子。他们所看到玉石娃娃的年代，当是六十年前。那时，当地的戏迷们就叫他“灰老人”。他经常骑着个小毛驴赶场，使用的水袖是用白布做的，鬓牙子也是那种老样式的，前额上的鬓牙子呈半圆型，现在看起来相当难看。

玉石娃娃的“采桑”和“三上轿”唱得特别好。有一个忻州票友说他小时在忻州玉皇庙看过玉石娃娃的“采桑”。他出场后做采桑的动作，身子一颤，用手擦擦眼皮，台下就喝彩。陈宝山给我学了一次玉石娃娃的腔调，那腔调听起来和现在的北路梆子大相径庭：既不象刘玉山、水上漂，更不象毛毛旦，而是一种和秧歌、道情之类很接近的弯调。玉石娃娃大约故于三十年代，是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北路梆子正旦演员（后世叫青衣）。

著名小旦艺人毛毛旦的晚年遭遇

西口外的老年观众对毛毛旦并不陌生。由于唱片的传播，很多人都能学一学毛毛旦的腔调。很多戏迷都听过他的“采柴”、“二度梅”、“起解”、“六月雪”、“法门寺”等唱段。其风格凄凉哀怨，花梢俏丽，“二音”尤为出色。后世的名青衣王爱爱就从他的唱腔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如她在“算粮”一折中“二爹娘且莫要吵吵嚷嚷”的五花腔，就是毛毛旦的旋律。甚至京剧名家程砚秋，生前在家中也常听毛毛旦的唱片，从中吸取精髓。

毛毛旦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后期很红的小旦艺人。当时有“看了毛毛旦、三天三夜不吃饭”的说法。他是纯粹的中路梆子艺人。

毛毛旦本名叫王云山，是山西汾阳县冀村人，和现在太原

的著名花旦田桂兰是同乡。他自幼家贫，小时在“冀村娃娃班”学了戏，启蒙老师艺名叫九成旦。成名后，曾和田桂子（王田桂）、盖天红（王步云）等名家在太原锦梨园、双梨园担任主演，专工小旦。

三十年代以后，大批坤伶登上晋剧舞台，排挤了男旦的地位，再加上东口鸦片烟的吸引，他在晚年时就去了张家口。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住在赵步桥的班中。这赵步桥是位三花脸艺人，和名净王正魁是师兄弟。

张家口人十分喜爱山西梆子，加上唱片的宣传，毛毛旦的名声不径而走，所以他到张家口能哄动一时，绝不是偶然的。

这毛毛旦逢人自称“五十八岁”，但看上去皱纹满面，又黑又瘦，足有七十开外。这也许是因为嗜好（吸食鸦片）累探，面色不好看的缘故。他随身带的东西就是一个小园笼，里面放着一付扮戏用的大头和一个绒球，那个肮脏的程度，仿佛是从垃圾堆中捡来的。

有一次在张家口南营坊唱“二度梅”春合一场，毛毛旦扮演年青美貌的陈杏媛，出台后，在“轿内”唱介板：“陈杏媛坐车孽用目观瞧”一句，真是韵味醇厚，神完气足，声音未落，台下彩声四起。接唱“青的山绿的水难画难描”一句时，一露那张皱纹堆叠、又老又丑的脸时，台下哄堂大笑，前台的小孩子吓得哭起来。这种场面，如是现在的年青人，是绝对接受不了的，就是当年的观众，也是坐不终席了。

不过，老艺人毕竟有他的独到之处。如他演“六月雪”的蔡婆一角，就与众不同。在监斩窦娥时，蔡婆去给窦娥送行，一般演员只走一圈园场，而毛毛旦要走好几圈，表示路途遥远。到了法场，听见窦娥说话，大意是：“我不是她的女儿，若是她的女

儿，恐怕早就来了。”这时的蔡婆心情受到很大的委屈，又心痛儿媳。在这百感交加的情况下，毛毛旦双眼对住，打脆头浑身哆嗦，接着扑倒在地，左一扑、右一扑、一连四五次，表现了在特定环境中老年人的复杂心情，然后用跪步膝行到窦娥面前，后来听说水上漂唱这出戏时也是如此演法。很可能是受到他的启发。

毛毛旦后来被赵步桥踢出来，不管他的生活。他连卷铺盖都没有，白天给伙房打杂，挣口干饭，晚上有时睡在炉炕边。连下夜的南县老汉也骂他：“这是损着了吆！”

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毛旦穷愁潦倒而死。那时八路军已进入张家口，在有关组织的主持下，梨园同人给他弄了一口薄棺，草草埋葬。

盖天红、卢三红、十六红、果子红轶事

三、四十年代的红伶盖天红，本名王步云，忻县子洪口磨子村人，本村人叫他磨子红。此人天生一付天刚音的嗓子，传世唱片有“哭灵”、“下河东”、“斩子交印”以及和丁巧云合灌的“四郎探母”唱片。他功架不行，戏也不多，就是唱腔拿人。他的唱腔雄浑古朴，高音嘹亮而不尖细，低音沉着娓娓动听，落音好用“呀哇哇”。“西口菊部旧闻”提到学唱盖天红的二迷糊，此人叫傅世才，已有七十三四岁，原是托运公司工人，已退休在家。据他和我讲，盖天红来归绥市唱戏，当时他才二十来岁。那时盖天红接近五十来岁的光景。盖天红到大西街澡堂洗澡，恰好二迷糊也在。年青人好起哄，别人一串鞭，他就放开嗓子学起了“盖腔”。盖天红听了他的唱，一口咬定他是南县人，可见他学

得很象。

金兰红去世之后，常和花女子配戏的就是卢三红。当年有“三班并一班，顶不住卢三红的水关”的说法。但卢三红有一年到山西唱戏，却栽了跟头。原因是因为他的路风不对口里人的胃口。他脖子有些歪，扮相本来就不雅。唱“斩子”时的道白、台步、口里人也认为出格，总之是看不上他。当地有些人不叫他卢三红，干脆叫他“炉渣灰”。

要说唱工戏，口里人最捧十六红焦玉生。他一条胳膊是个瘸胳膊，人们就叫他胳膊十六红。他的功架不行，要说唱功戏，谁也唱不过他。丁果仙在“空城计”里猛想起一句后面的拖腔，就是十六红的弯调，丁老略加变化，就成了很受听的中路梆子的腔调。但内行人能听出来，这一句有明显的北路风味。

比盖天红小一辈的丁果仙，是公认的晋剧艺坛巨擘。关于她的艺术和生平，一定有人专门著述，我只略略谈谈她的部分趣闻轶事。

她年轻时就出了名。当时人们说：“男的不如女的，盖天红不如果子”。“兰兰不如果果”。兰兰是指她的师姐丁巧云。

那时她常演的一出戏就是“花子拾金”。大意是一个叫花子上街游逛，唱了一段“表刘刘”，突然被一块东西拌倒，拿起来一看，是一块黄金。于是花子就拿了黄金走进一座庙内，高兴地唱起来。剧情就这么简单，但只要她唱这出戏，必定场场满座。原因是丁果仙扮演的花子，要学好几个名老艺人的精彩唱段。那时这些老艺人去世未远，在观众中还有很深刻的印象。那花子进了庙，口称“田桂”娘娘，毛毛旦姑姑，三儿生伯伯，盖蒲州姨姨，然后一个一个地学唱。我听过百代公司录制的丁果仙的表刘刘，表圣贤、反串捡柴的唱片，我最欣赏她的反串“捡柴”，学

毛毛旦学绝了。唯一不象的，就是噪音。

誉满山西、塞北的花旦大师水上漂

水上漂本名王玉山，小名叫二明子。他是晋剧艺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水上漂是山西五台常家滩人，早年卖到张怀科班学艺，启蒙老师艺名叫正堂旦。他出科后，并不出众。那时人们说：“二明旦，没人看”。当时正是夺庆旦李子健的极盛时期。后来他就拜李子健为师，长期给李子健串丫环，终于把李子健的许多拿手好戏都拿过来，集青衣、小旦、刀马、彩旦、闺秀旦于一身。噪音不如李子健尖脆，但扮相活亮，台步轻盈，做戏细腻，这都是超过李子健的地方。他的唱工可以说是晋剧花旦中的“麒派”，韵味醇厚，越听越好听。他的台步功底，越过京剧四大名旦中的任何一位。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名声和影响不亚于丁果仙的艺术大师竟没有多少东西传下来。据说他的女儿王巧云也能演“百花点将”，但舞台上的效果不能和乃父相比。一九五六年我在呼市红色剧场看过他和舍命红（邓友山）合演的“凤台关”，台步轻盈潇洒，人们都伸长脖子看他的脚，想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在大观园看过他主演的“黛玉葬花”，给我的印象相当深。从葬花始到黛玉死，他并没有发挥走园场的绝技，但通过他极有分寸的表演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眼神，把这位哀艳清高的女性演活了！当黛玉得知宝玉被贾政痛打的消息时，那种既心痛宝玉、又碍于封建的伦理道德的束缚，复杂、矛盾、柔肠寸断的心情，通过他精湛的演技，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宝钗和宝玉完婚时，黛玉正在奄奄一息，水上漂用呆眼、

定眼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精神状态。当他招呼幻觉中的宝玉时，我注意到台下好多人在拿手帕擦泪。

二州五县一带有“五台出了三件宝，赵戴文、阎锡山、水上漂。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说法。据说有一次赵戴文看二明旦的戏，那二明旦在戏台上如同行云流水，仿佛微风吹动着一片柳叶，他不由得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唧唧，真个象水上漂的也似的”。水上漂这一艺名就是从这儿来的。

一九七〇年，我到包头市出差，特意到十六红冯金泉家中打听水上漂的情况。得知他在“文革”中受尽非人的折磨。那时把他关在牛棚里，每天只给粗粮吃。他有高血压病，早上跑步，跑着跑着就翻翻白眼，停顿了一下，后面的红卫兵就打鞭子。背不会老三篇也要挨打。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带着一身绝技，满腔怨恨，愤愤地离开了人世。一代宗师，就此香消玉殒。年仅五十九岁。痛哉！惜哉！恨哉！

著名女须生三女红轶事

三女红原籍浑源县，自幼家贫，父亲宋荣，是个卖饼子的，母亲谭氏。宋荣膝下无儿，生有三女。大女儿一辈子就是个家庭妇女，二女儿叫宋翠芬，三女儿叫宋玉芬。至于三女红的学艺经过和她的师承，知人甚少。

三女红在十八岁时招了女婿，名叫李松山。这李松山是戏班承事的，艺名叫十八红，祁州北照村人。他要比三女红大十八岁。李松山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阴历）病故。后来三女红住了亢二的戏班。亢二为了拢住这颗摇钱树，对三女红加倍照顾。后来三

女红就改嫁亢二，亢二那时已有两房女人。

三女红的二姐为宋翠芬，唱腔咬人，台上演戏时有随心情的
好坏而忽冷忽热的毛病，戏班的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二软
灰”。

宋翠芬的前夫正是北路梆子名小生魏林。魏林乳名来印，艺
名叫“鱼儿生”。鱼儿生是山西大营镇黄骆驼戏班的娃娃，老师
正是花女子的公爹李三元。鱼儿生有一手独特的翎子功，后来传
给十七生陈宝山，而陈宝山又传给十一生郭风英，郭又传给其儿
媳郭彩萍，可谓后继有人。

鱼儿生谢世后，宋翠芬改嫁了一位国民党时代的科长，名叫
王文林，蒙族，后来举家迁到召河，从此谢绝舞台生活，过着清
贫的生活。一九五五年，宋翠芬看望三妹宋玉芬，曾在大观园演
了一场“走山”，但她的动作十分小气，当时的内行们就看不
惯。

一九六〇年冬天，宋玉芬特地坐汽车去探望这个分别多年的
二姐，当年名噪一时的二女子住的是茅庵草舍，已成为一名极普
通的农妇。二人见面后，不由得唏嘘一阵，回首往事，感慨万
千。

三女红把她独特的北路唱法和中路梆子的丝弦和谐地融为一
体，戏迷们十分欣赏。署名“仿宋”的一篇文章中说她“唱腔高
亢激越，表演舒展大方，潇洒自如，靴子功别具特色，深受同行
和戏迷的称道。”这话很有见地。

三女红能戏甚多，擅长纱帽戏。如“调寇”、“困雪山”、
“芦花计”、“三疑计”、“回龙阁”、“斩子”、“九件
衣”、“打金枝”等。十八岁去包头唱戏，名声大噪。“芦花
计”里的那一句“父的儿哭一声父害心疼”的唱段，声情并茂。

催人泪下。

三女红演戏从不耍特技动作（例如耍纱帽翅子一类），也不靠光卖力气取胜（内行叫“洒狗血”）。不管台下坐的是达官贵人，还是一般观众；不管台下人多还是人少，始终是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她做戏演的是戏里的“人物”，细腻、逼真。有时，秋天到帘外演出，别人劝她穿上棉裤吧，小心着凉。可她坚持不穿，只在绒裤上套上彩裤，说：“到了台上就不冷了。”足见她对艺术多么认真。

有一次，她的女儿小梅梅陪她唱“杀楼”，有一个动作没掌握好尺寸，她当着观众就踢了她一脚。那时的观众认为这是“人前教子”，很理解她的心情。

一九六〇年，她随团到太原演出，受到了果仙的高度赞赏。

使人奇怪的是，她从不早起，也不练功，一到台上就有戏，嗓子也从来不坏。

她是个出名的好老人，一辈子没吵过架。平时生活很不讲究，但爱喝好茶，抽好烟。冬天“大方”，夏天“龙井”，抽烟也只抽“牡丹”、“中华”。

宋玉芬是属兔的，照此推算，她当生于一九一四年旧历五月初七。

一九六二年，应水上漂王玉山的邀请，宋玉芬去了包头市晋剧团。一九六五年返回呼市。不久之后，不知什么缘故，晋剧团普遍下工资，每月只给老人发四十五元的生活费。在文化大革命中，老人受到株连和惊吓，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因患肺脑综合症而去世，后来安葬在厂汗板村。

三女红的女儿小梅梅

小梅梅名叫亢金锐，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土左旗察素齐镇。因为家贫，父母将她送给名伶三女红做养女。三女红非常疼爱她。在她开始学戏时，先是学的须生。后来三女红说：“我娃的脸膛长得这么好看，学唱旦哇。不用象妈一样，一出台就灰嚎。”

亢金锐师承“金斗旦”、“顾老旦”、孟长云，天资聪明，进步很快。十岁时，曾和水上漂之女王巧云在包头表演“小放牛”的牧童，“秦香莲”的春哥，“凤仪亭”的小舞姬，“正德戏凤”中的正德，“杀庙”中的韩琦，“王允赐环”中的王允等。表演大方洒脱，受到大家的欢迎。

解放后，她先后在呼和浩特市新蒙剧社、共和剧社、晋剧二团、总团，专工花旦，成为市晋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

小梅梅虚心好学，教学生不保守，也不固步自封。只要她去剧场看戏，不管是多么不吸引人的戏，她也要从头看到尾，学习人家的长处。比如她的云手大方潇洒，就是因为吸收了京剧和越剧的精华。一九七九年康翠玲因病不能登台，小梅梅主演了“陈三两爬堂”。在这场戏中，她大胆启用了园号和黑管等西乐，借以渲染气氛，收到较好的剧场效果，并获自治区专业剧团会演演员一等奖。

她向兄弟剧种学习了很多精彩动作，如“打神告庙”中的耍水袖，“李慧娘”中的绸子舞，“花打朝”中的小碎步，“杀宫”中的女捎子功的表演，均赢得观众的好评。

她历任剧团艺委会副主任、主任、副团长等职，曾被评为呼

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呼市、内蒙两级团代会，曾选为两级第三届、第四届青联委员，担任市青联副秘书长，内蒙青联常委。一九六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今，年过五旬的亢金锐仍壮心不已，探索艺术的道路，甚至还要向陈宝山老艺人讨教翎子功，的确难能可贵。

名青衣方月英和前辈须生说书红

四十年代末期，说书红高文翰的徒弟牛桂英、刘俊英、方月英等名角众星捧月般地陪水上漂在北京唱“貂蝉”。那时的方月英才十几岁，她是说书红的关门弟子，后来成长为山西梆子著名青衣。

一九三一年腊月，方月英出生在回民区后沙滩一家贫苦的国民家中。生父叫马二各半。旧社会有几句顺口溜：“新城道能挤能下（白家），马莲滩能宰能杀（麻家），后沙滩手背迎下。”这顺口溜的意思是：新城道养奶牛的多，马莲滩的屠户多，后沙滩的讨吃子多。

还有几句顺口溜，也一并抄录如下，供研究地方志的同志参考：“麻家的钱，好要多半年，磨烂你十双袜子九对鞋；进来自家的人，没闲人，进来个鬼，也得担担水。”

马二各半养活不了闺女，便把她抱在人市上，被汉民方老二买去，后又送给他的侄儿方正。方正那时在旧城圪料街开个剃头铺，平素好打坐腔，唱“蒙古曲儿”（就是解放后的“二人台”）。方月英九岁时，方正就把她写给说书红学了戏。这说书红乃是中路梆子一代宗师，唱戏极为认真讲究。如青衣演员患感冒咳嗽时，他就不许唱“打金枝”，但可以唱“明公断。”他认为

沈后是国母，保养条件那么好，是不会轻易咳嗽的。而秦香莲是贫妇，为寻夫跋涉千山万水，倍受风霜之苦，伤风咳嗽是有道理的。他不许弟子们吃瓜籽和花生，却提倡吃大豆。他认为嗑瓜子嘴皮子易松，吃花生易上火，而吃大豆牙关发紧，可以锻炼咬字。

说书红年轻时嗓音非常好，那时他的艺名叫“棒槌红”。他常和毛毛旦在一起配戏，这毛毛旦有严重的鸦片嗜好，平素不修边幅，又懒又脏。说书红是个烟酒不沾的人，身体也棒，非常看不惯毛毛旦，曾经打骂过他。毛毛旦是种阴柔的女人性格，对说书红既怕又嫉妒，伺机报复。有一次，他请说书红吃饭，饭里下上牛耳屎，把说书红的嗓子弄哑。说书红后来气得要拿镰刀割毛毛旦的下嘴唇。这个说法不知是否确实，反正他的弟子们都知道。很多戏迷传说牛耳屎能坏嗓，不知有何根据，待考。

说书红嗓败后，根据自身的条件，用说唱结合的形式，另闯了一条路子。他的能戏特别多，至今七十来岁的老观众对他的“马鞍山”还津津乐道。

他的剧本也很特殊，都是手抄的。剧本上别的行当的唱词都有，唯独没有须生的唱词，须生的唱词都在他肚子里装着，这样，别人即使拿到了他的本子，也没法唱。

说书红晚年收了个过门徒弟，这就是以后的须生泰斗丁果仙。学艺后，按照梨园行的规矩，说书红按三七开一直抽了丁果仙三年票。“日月图”一剧据说就是说书红传授的。丁果仙脍炙人口的“空城计”，其中有一“猛想起在山前修真养性”的唱段，一般都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我怀疑丁老唱的正是说书红的路子。说书红嫡传弟子中唯一的女须生叫郝翠英，后来嫁给山西第一琴师刘柱。刘柱年轻时给毛毛旦、说书红、三儿生等

都操过琴，从二十三岁起，就一直给丁果仙操琴，至今已年近古稀，是位桃李满园，造诣极深的琴师。

说书红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携同高爱琴（他的亲生女儿，生角）、方月英、王丑旦（男）、陈林山到石家庄新升平剧场演出，常演“马鞍山”、“三公堂”、“清风亭”、“女中孝”、“双罗衫”等戏。那时十五岁的方月英就很引人注目。当地人不喜欢山西梆子，但听了方月英的戏后，则说：“那简直是一个字一个字往耳朵里面送。”

一九四六年秋天，说书红病故于石家庄，终年七十二岁（属鼠）。一九五二年春天，全体徒弟们到石家庄把他的遗骨起回葬到原籍山西太谷。

方月英成名很早，在山西晋剧界和观众中名声很高。她做戏大方工稳，唱腔甜美动听，曾和丁果仙、刘宝山等著名艺人长期合作。她家庭的入口特别多（丈夫尹玉山的前房就有八个孩子，她本人后来也生下四男四女），全靠她一人挣钱养家。她曾说过，“他们家的耗子也吃我。”至于她和尹玉山的结合，有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背景，没有必要再去探讨了。总之，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哪里给的份子大，她就去哪里唱戏。在阳泉市搞“抽票”唱戏，她一个月曾挣过三千多元。总之，她没在一个地方长期呆过。

一九五一年，张家口地区的花脸蔡有山、青衣刘仙梅来归绥市演出，营业不好，困在了归绥。当时醒民剧社和新绥剧社为了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和他们合作演出。一天六场戏。白天三个“打金枝”，是从金枝女上场始到劝官止；晚上三个“明公断”，是从“大堂见皇姑”起到“侧美”止。当时的花旦康翠玲，青衣方月英、任翠凤、刘仙梅、花脸蔡有山、杨胜鹏、王治安轮番登场献艺。

文武场面也轮换了六次。杨胜鹏和任翠凤唱完“见皇姑”，已是午夜十二点以后了。那时，观众还不走，要看压轴子的方月英和凤凰旦。散戏后，台下的观众说：“这戏才硬哩。”就这样帮助蔡有山所在的剧团度过了难关。

一九六四年，因为各种原因，年方三十五岁的方月英脱离了舞台生活，在一家旅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她的唱腔艺术和王爱爱很不相同，用词也有差异。如“劝宫”里沈后的一段唱，王爱爱的唱词是：“常言道当面教训子，背地里无人再教妻”。方月英则唱为“常言道当面教训子，背地里无人再劝妻。”一个劝字，我觉得更为妥贴。

现在张家口电台还经常播放方月英的录音，建议有关部门把这部分录音搞回来，对于广大晋剧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塞北名青衣任翠凤苏玉兰轶事

西口外登台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青衣艺人首推任翠凤。她的曾祖父是个精巧的瓦匠，祖父任玉是银匠，父亲任喜是早期的铁路工人。他们的原籍是山西太原市。任喜失业后，靠磨豆腐维持生活。一九二七年阴历四月，任翠凤出生在归绥旧城剪子巷。八个月后，随父迁到朝阳巷。

翠凤长到六、七岁时，常和小伙伴到大西街同和园看戏。那时戏班的主要艺人是须生黄月琴（张家口人），青衣小月菇。有一次，戏班演“明公断”，正好缺个娃娃生，戏班有个人就问小翠凤，敢不敢上去演。这小翠凤从小就是个机灵鬼，胆子也大，眨眨眼说：“敢！”原来这出戏她早就看熟了，上了台就模

仿春妹的动作。“杀庙”一折，小翠凤跪在地下，双手高举，不断颤抖，确实那么一回事。从此，小翠凤就随戏班的太平老旦学了戏，到十二岁时，就能唱成本大套的“打金枝”了。那时她演沈后，还得由检场的人抱在椅子上。

到十六、七岁时，翠凤已出落成大姑娘了。那时日寇汉奸到处横行霸道，就连他们的马伕也经常欺侮艺人。人们最痛恨的还有“毗牙狗”，这是给汉奸翻译起的外号。他们身为中国人，还到处狗仗人势地欺负中国人。

那时的小翠凤在同和园唱完戏，就把锅底黑和鼻涕一抹一脸，由父亲护送回家。到十八岁时，因不甘忍受这些衣冠禽兽的欺凌，嫁给丰镇的一个二婚男人叫王成德，从此偃旗息鼓，当了一名家庭妇女。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在别人的鼓动下，翠凤又再度出山，一唱而红。日伪时，丰镇戏园的票价是两毛，当时任翠凤来丰演出，票价涨到两毛五分。当时人们给她送了个外号，叫“两毛五”。任翠凤再度登台后，在街上还经常听人们说道：“走，看两毛五的戏格来”。这个时期，她除唱传统戏之外，也唱从老解放区传过来的新戏，如“兄妹开荒”、“人头蛇”、“新九件衣”、“十二把镰刀”等。

不久，她回到归绥市，在当时的大观园任主演。那时大观园的班主是杨再山和康翠玲的母亲金玉玺。那时大观园的票价是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一角五分到两角）

后来，任翠凤因故从大观园退出，以她和三女红为主组织戏班在大召内搭蓆棚子唱戏。这个期间由大同来了杨胜鹏和王治安师弟兄，后来又来了十六红冯金泉、杨桂珍夫妇，领戏的叫刘玉文。当时的票价是五百元（旧币），用竹牌子顶票，观众相当

踊跃。这个班的性质是“共和破锣”。“共和破锣”是个术语，指没有班主，或只是名义上有个班主，挣了钱当天就按股子分光。戏班对面就是大光明电影院，数月后，戏班把电影院挤塌，一九五一年戏班进了电影院，后来更名为民众剧场，戏班起了个名字，就叫醒民剧社。这个期间戏班又来了旦角苏玉兰，生角赵金瑞，唱京剧出身武打艺人苏景云，随后又来了因财神庙田文的戏班散伙出来的艺人八岁红常艳春。

上文所提到的几位青衣艺人，各有特色。苏玉兰工稳，任翠凤明快，方月英大方，在艺术上绝不雷同。任翠凤的快流水板，堪称一绝。她唱“回龙阁”中“猛想起二月二龙抬头，梳洗打扮上彩楼”一段，还有“东宫扫雪”的大段流水板，字正腔圆，犹如断线珍珠，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

一九五〇年，全国文艺工作会议召开，任翠凤作为归绥市的代表，和文化局另一名同志赴京参加会议。席间周恩来总理曾向她敬酒。任翠凤同志思绪万千，想到旧社会我是被人看不起的“戏子”，新社会周恩来总理给我敬酒，真是两重天呀！

一九五一年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她和三女红作为归绥市的代表，赴京参加观摩演出。宴会席间邓颖超同志给她们敬了酒。

一九五九年包钢一号高炉剪彩，任翠凤等给周总理表演了“打金枝”。演毕，周总理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和任翠凤握手时说：“我好象见过你。你是和丁果仙、牛桂英唱的一样的。”时隔这么多年，总理还记得一个艺人，这件事使任翠凤同志激动不已，终身难忘。

至于苏玉兰，是另一位颇有名气的青衣艺人，扮相秀美，做戏认真。她的父亲是一个西菜园的菜农，她的舅舅姓杨，人们叫

他”瞎巨才”。苏玉兰从小爱看戏，后来就和舅舅学了艺。舅舅是个三花脸艺人，给苏玉兰请了韩占魁（青衣）、毛眼十六红，还有一位不知何名的青衣艺人，先后教苏玉兰学戏。舅舅对外甥女很严格，苏玉兰在十一岁时就能唱“捡柴”、“杀庙”、“赐环”等戏。十六岁在同和园一唱而红，十七、八岁时在大同北园子和冯金泉、凤凰旦、小桂兰、玉眼黑、六周旦合作演出。当时任翠凤在大同市南园子和著名旦角燕彩云合作。

苏玉兰是个十分老实厚道的人，她母亲杨氏，控制着她的经济命脉。成名之后，便受到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怀好意的捧场。

苏玉兰于一九五九年调入内蒙艺校任教。从此以后，她就极少在舞台上露面了，那时她才三十二岁。

苏玉兰的舅舅瞎巨才故于一九五七年，享年六十六岁。母亲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逝世，享年七十岁。

名伶十六红、李树琴、筱桂香及其他

醒民剧社后来改名为呼市晋剧一团，有四个唱须生的，就是十六红冯金泉，八岁红常艳春，小金红武文斌，还有一个北路梆子出身的六旬开外的名叫武占元的“大头十六红”。观众叫他“猪头十六红。”大头十六红年轻时和花女子、金兰红曾同台演出，也是一流的好角；但五十年代已是“人老珠黄不值钱”的时候了。他的唱腔是用背拱音，风格很象九岁红高玉贵。我看过他演的“斩子”中的八王，动作的确细腻传神，懂戏的老汉们频频称道。那时他已六十开外，剧团人才济济，轮不到他唱重码戏，以后他只配演家人、院公一类人物。文革前逝世时，年已七十多岁。

另一个十六红，正是冯金泉，代县人，麻子红的徒弟。他和口里著名的胳膊十六红没有什么关系。他也是北路梆子出身，肚里戏多，捎子功、髯口功很过硬。他的“四郎探母”、“五雷阵”、“杀官”、“杀楼”、“水淹七军”、“古城会”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把子功也好，能演“三盗九龙杯”的黄三太。演“五雷阵”，他扮孙膜，除了身上的幡子外，头上能用一丈左右的纸幡。一九五六年，他去了包头，和水上漂合作多年。一九八〇年，他随团来呼市在华建礼堂演出“探母”，功夫还那么好。

五十年代初，财神庙戏园里唱戏的主角是小桂香，一目失明的玉眼黑，八岁红等。散班后，小桂香去了山西雁北地区，后来成为雁北专区剧团的头路演员。

一九六四年，雁北专区晋剧团来呼演出，主演就是须生李树琴、青衣小桂香、花脸张振兴。小桂香的青衣、老旦戏都很出色。这年秋天我在财神庙街的共和剧场看了李树琴的“斩黄袍”，李树琴和小桂香合演的“牧羊圈”，张振兴的“古城会”，后来又在民众剧场看了张振兴的“走麦城”。“牧羊圈”一剧，李树琴饰朱春登，小桂香饰赵锦堂。李树琴那身躯修长，下颌丰满，扮相十分排场，面部表情丰富，天生一副云遮月的嗓音，唱腔有十足的丁派味道。翻高时有股炸音，十分动听。当她唱“朱春登……”一句四股眼时，台下的人都安静下来，静悄悄地听。表现朱春登思念老母爱妻的心情时，李树琴充分用了翅子功的特技，左动右静，右动左静，左右一齐动，使观众如醉如痴，赞叹不已。

张振兴的“走麦城”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关公戏和京剧名家李万春的路子不一样。我感到李万春的关公戏是写意多于写实，张振兴的关公戏是写实多于写意。他的昆曲唱腔味道很纯正，做戏勇而不猛，含而不露，底功十分出色。表现关羽中了陷

井，马失前蹄时，他用放七叉的动作，站起又摔倒，反复数次，全场报以极热烈的掌声。

小桂香的哥哥叫李永昌，职业是油工，现仍在小西街居住。

女须生八岁红轶事

青城另一位成名的须生艺人八岁红，本名常艳春。一九二五年出生于距大同市四十华里的贫苦农民家庭。一九八五年呼市晚报记者张沛人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晋剧名角八岁红”。

文章说：“常艳春原名张福喜。因为家贫，一年四季吃不上一顿饱饭。家徒四壁，衣不遮体。经常到田野里挖野菜，或者到大户人家的粪堆上拣些鸡蛋壳，炒黄了碾成面充饥。一天，父亲领她到平旺看戏，到戏班的伙房讨饭。一位姓常的艺名叫自来香的艺人给她吃饭后，就和她父亲商量，要买下她学戏。尽管父女哭得难舍难分，七岁的小福喜还是被卖到戏班学戏，并改名“兰花”。

据我所知，这自来香按辈份是八岁红的师姐。“兰花”的师傅艺名叫“心灵儿红”，当时已有六十多岁，真实名字连常艳春也不知道。

小兰花学戏吃了不少苦头。由于勤学苦练，不久之后就能登台演半个小时的折子戏，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她“八岁红”。从此以后便作为她的艺名，一直沿用下来。

八岁红的戏路很宽，文戏武戏都能来，所演的“打金枝”、“薛刚反唐”、“杀楼”、“三疑计”、“金水桥”都很出色。她的打金枝，其唱腔、唱词和丁果仙有很大区别。

常艳春同志和我谈过，现在的生活和旧社会是不能比的。旧社会她曾染上吸毒嗜好，挣多少钱也得抽光。解放后政府把他

（她）们收到戒烟所，彻底根治了这种不良恶习。不然的话，几条命也送进去了。

那时的“共和破锣”班的演员收入差别很大。如任翠凤一天收入七万块（旧币），而常艳春一天是三万五，凤凰旦略高于杨胜鹏，一天也不过两三万。而打板的祁顺，更少得可怜，二天才挣七千元，连给孩子打牛奶钱也不够。

我所知道的全才艺人凤凰旦

凤凰旦本名王治安，小名叫关根子，生于一九一四年，是张家口黄德胜科班第一期的学生。父母是张家口地区的农民，因为家穷，怕他饿死，在他很小时就送入科班打了戏。黄德胜科班很特别，请的教师除山西梆子艺人外，还有河北梆子、京剧艺人，文武场面对河北梆子、京剧也有造诣，往往上午拉山西梆子，下午就能拉二簧。这王治安天资聪明，练功也刻苦，刀马旦、武生、花脸都学，内行叫几门抱。他的跷工也特别好，有一次唱堂会，他踩着跷子从三张高桌上斜翻下来，全场喝彩，赠艺名“凤凰旦”。

一九五〇年他和师弟杨胜鹏来到归绥市，改唱花脸，成了晋剧一团的台柱。一九五七年调到内蒙艺校任教。他的嗓音发沙，音量不大，但韵味很足。

在“百花园”和“凤台关”两个戏中，他均扮演刀马旦，扮相十分俊美，一双眼睛流盼自如，十分有神彩，身上看不到一丝花脸的痕迹。

“古城会”一折，凤凰旦饰关羽，“战宛城”、“华容道”，他饰曹操，做戏逼真而风趣，观众十分爱看。他的关公

戏，得益于京剧出身的白俊英。凤凰旦在北京时，曾和李万春、叶盛章等名家同台演出。

塞外名净杨胜鹏

我和杨老交往数年，无话不谈，故而了解比较透彻。他于一九一九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保岱村，幼时家中十分贫苦。生父姓阎，他的小名叫观生。观生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当时他的哥哥远离家乡下煤窑，已成家另过，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观生就靠他童养媳出身的母亲有一顿没一顿地苦捱时光。这年腊月三十日早上，母亲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苦难的生活，亲了亲正在熟睡的观生，悄悄走到井旁打算跳井，爬到井口上时，又不放心地回头望了望观生：“我死了，娃娃怎活呀？”正在犹豫不定，小观生却在睡梦中摸不到娘的奶头，小小的心灵里仿佛预感到什么不祥之兆，便光着身子跑出来，看到娘在井口上爬着，他边哭边喊：“娘，你别跳！”母亲抱住观生，连声说：“娘舍不下我娃，娘舍不下我娃！”母子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后来，母亲给大户人家上锅，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就是艺名叫刀劈生的河北梆子名武生杨吉庆。杨吉庆膝下无子女，于是观生就改姓了杨。

杨吉庆培养出梨园界三位出色的人物。这就是北路梆子小狮子黑董福，凤凰旦王治安和杨胜鹏。董福前几年和小电灯、李万林等合拍了电影“金水桥”，董福饰程咬金。董福和杨胜鹏一直互闻其名，但从未谋面。八五年董福患癌症逝世后，杨胜鹏恰好去了山西忻县，参加了追悼会。

观生十二岁时，杨吉庆把他领到黄德胜科班学戏。进科班之

后，给观生换了一身新衣服。科班生活不错，每天吃的是莜面窝窝和黑豆芽、白菜、小米干饭之类。逢年过节或碰到喜庆日子，则要吃白面蒸馍和猪、羊肉烩菜。这对观生来说，真是天堂般的生活。

观生学戏可出奇地笨，学东西特别慢，不知是谁给了他一个难听的外号，叫“片不开”，教师们谁也不愿意教他。

杨吉庆也为笨儿子发了愁。一天，他将观生叫到跟前说：“现在你什么也甭学，天天给我耗腿，练杠子。”观生很听话，一个人蒙头苦练起来。杨吉庆有空就给他说一说戏，教他道白，起霸的身段。一年过去了，教师们也看到这孩子身上有点样子了。

谁知不久之后，杨吉庆身患重病去世，小观生呼天抢地地痛哭，大家看到孩子可怜，又想到刀劈生为人义气，众人开始关心起他来，

名旦八百银外号戏婆子，他手把手地教会观生“古城会”里的蔡阳一角，这是观生的开蒙戏。

马武黑赵科甲（有的书上写赵克家，一八八五——一九五七），教了观生“取洛阳”和“定军山”。教观生“过巴州”时有句唱腔：“手拉手进营门”，观生怎么也学不会，他就拆开半句半句地教，什么时候学会了，再往一处合。观生反应虽慢，但只要学会了，便永不忘记。

有一天，戏班要演出“古城会”，恰好饰蔡阳的师兄不在，观生便自告奋勇要演蔡阳。这个戏他私下不知练过多少遍了，但就是从未登过台。这一天观生扮好蔡阳还未上场，教师们和没事的师兄弟甚至伙伴、马佚就挤了一后台，要看“片不开”的戏。胜鹏也真卯上了，嗓子也特别冲，道白、起霸、抹架子、舞刀花，尺寸掌握得特别好，台下反应很热烈。散戏后，受到教师

和人员的一致好评。

六年后，观生长成大后生了，就正式用了入科后取的大号——胜鹏。和张胜林、侯胜忠、郝胜奎、李胜和等师兄弟一同出了科。

接着他搭了丰镇王魁的戏班。班内有须生董福燕艺名叫皮条红，花脸吴德泰，旦角孙海林。吴德泰教了胜鹏一些文戏，如司马懿、魏虎等一类角色。

接着他又搭兴和赵麻子的班，须生韩华亭，有意栽培胜鹏，和他配演了“黄沙岭”、“天门阵”、“八义图”等。还有老旦陈玉亭，艺名金旦子，也是黄德胜科班出来的，常给他拍尺寸、哼唱腔。

后来他在怀安搭过韩广俊的班，在天镇搭过地地旦的班，接触了许多角儿，如九岁红崔德旺、金龙黑贾玉龄，须生马吉瑞。还和名须生阎三关、孟玉贵配过戏。在天镇演“战洛阳”，阎三关饰徐茂公，胜鹏饰尉迟敬德。阎三关看到胜鹏身段讲究，唱腔较弱，于是每天帮他练唱腔。胜鹏获益非浅。

民国二十九年，胜鹏结识了五月仙刘明山，住进了刘家班。

这刘明山是清末名伶要命旦（刘德荣、也叫云遮月）的长子。要命旦四十多岁时亡故，刘明山和刘宝山弟兄四人到了张家口。当时大兴园的班主、刘德荣的结义弟兄艺名叫“天鹅”的王天恩收留了他们。后来四弟兄都成为晋剧界举足轻重的名伶。这是题外之谈。

杨胜鹏和这个梨园世家进行了较为长期的合作，对他的艺术、名望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十年代中期，他已出名了，人称“小马武黑”。大约是四

六年到四九年左右，他和郭凤英（十一生）、刘宝山（十二红）、杨丹卿（小桂桃）、崔德旺（九岁红）、张宝魁（小吉仙）、刘玉山（六月仙）、马秋仙（小果子）、小桂芬、小金枝、小月楼、刘仙梅、张胜林等到北京、天津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一九四九年阴历八月十六，著名的夺庆旦李子健先生因患“绞肠痧”死于北京。他的爱子李世芳，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于一九四七年逝世后，所用的行头卖给了方月英。

在天津演出时，戏班住在交通旅馆。在“凤仪亭”一剧中，胜鹏扮演董卓，深刻地刻划了这位狂妄好色的奸雄嘴脸。

“捉放曹”一折，他和刘宝山配戏，他饰曹操，刘宝山饰陈宫。每个动作，每句台词，每个眼神都极为讲究，一连多日屡演不衰。

在北京演出时，尚小云、侯喜瑞、袁世海、李万春等都看了他们的演出。

侯喜瑞是清代名净黄三（黄润甫）的关门弟子，个子不高，功架却极为漂亮。他对胜鹏说：“咱们花脸的身段做出来要比花旦的还要好看。”那时候在北京，一个“连环套”屡演不衰，原因就是名家所演，各有特点，绝不雷同。北京人要听郝寿臣（袁世海的老师）的念白，看侯喜瑞的工架，欣赏金少山的气势。

袁世海给胜鹏指点“刘唐下书”和“战宛城”的动作，使胜鹏受到很大教益。

这个时期，胜鹏和刘明山之女刘玉婵的恋爱关系受到挫折，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胜鹏离开了刘家班。一九五〇年，他由大同来到归绥市安家落户，把大半生精力献给了青城艺坛。

他的艺术修养通过实践，不断改革。我在六十年代听他的唱腔就觉得和五十年代有很大的区别。五十年代初期，他的唱腔后

半句往往用背拱音挑起，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就不这样唱了。他的唱腔里揉合了刘宝山的须生唱法，巧妙地用在包龙图这一艺术形象上取得很大成功。他的演唱风格，粗犷豪放，讲究字正腔直，以情带声。

他的工架稳重、凝炼、威猛、大方。这要归功于杨吉庆的教子有方和马武黑的严格教导。晋剧花脸的旧演法是动作大、棱角分明；用一个“方”字可以概括。而杨胜鹏的工架则是十足的京剧气派，处处给人一种圆熟、饱满的感觉。他经常和师兄王治安对把子，互相切磋，因此把子功也很有功底。他在张家口时，唱工戏唱不过金铃黑郭寿山，他就扬长避短，以工架戏，武打戏取胜。他和我私下谈过，使他最佩服的花脸艺人，一个是京剧界的金少山，一个是晋剧界的张玉玺。在他二十来岁时，曾见过张玉玺一面，这使我感到很大兴趣。不久之后，我抽时间访问了曾和张玉玺同台演出过的名伶十七生陈宝山。

著名小生十七生

署名“黎因仿”的一篇文章曾介绍十七生的生平和艺术。文章说：“十七生本名陈宝山。一九一六年出生在山西灵丘。九岁丧母，为了糊口。父亲将他送到本县的戏班打了戏。他的老师孙穆林（艺名盖天红）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须生。由于陈宝山学艺刻苦，很受老师的器重，十一岁就随老师登台演出，饰娃娃生。在“狸猫换太子”一剧中，他扮演陈琳。由于槐花儿及甩发表演认真，受到师长和观众的好评。

一九三一年，他随剧团在山西五台演出，和当地剧团唱开了对台戏。他被鱼儿生（魏林）的精彩演技所吸引，很想拜师学艺。

鱼儿生也对陈宝山的表演很喜爱。鱼儿生的翎子功超过花女子李桂林。“下水牢”是他的拿手戏，“伐子都”亦为人们称道。扮演“三娘教子”中的薛英哥，完全是个调皮儿童，观众感觉不出是成人表演……。”

总之，陈宝山把鱼儿生的一些绝技都拿了过来。“黎园仿”的文章中写道：

“在‘小宴’折子戏中，他扮演吕布。在翎子功的表演中，采用了转、正、侧、点、掏、抖、甩、弹、站、弯、直、缓、急的十三字动作，把吕布这个好色之徒表演得维妙维肖。一九五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戏曲会演时，他和三女红，小梅梅（亢金锐）、王静卿合演的‘小宴’，均获得表演奖。

“在‘双合印’一剧的‘下水牢’折子戏中，他扮演董洪。水牢内上有利刃、下又水漫过胸，既不能站，又不能坐。在这样特定环境中，十七生采用骑马蹲裆的架式，以甩发（捎子功）的技巧表演出剧中人的困境。只见他左推水、右甩发，右推水、左甩发，正面推水，左右甩十字花。这段表演长达半小时，深受戏迷们赏识。

“十七生曾和水上漂、三女红、二女子等名角搭班儿，在包头和呼市的同乐园、大观园等处演出。解放后，曾任呼市晋剧团二团副团长。一九五七年，调到内蒙古艺术学校任教。”

以上是黎园仿的一段文章。十七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和株连。

今年八月份，我去他家说明来意后，他和爱人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我。我们围绕着山西梆子不拘一格，海阔天空地慢谈起来。

从他本人，谈到山西梆子的好多名伶轶事。他的第一个爱人艺名油梨旦。离异后，又找了个爱人就是以后著名的小果子红

冀素梅。“西口菊部旧闻”也曾提到小果子红的概况，有些说法不确，应予更正。

“小果子红”冀素梅

冀素梅的年龄和康翠玲相仿。她的父亲是山西买卖人，老家在山西寿阳县冀家挠。冀素梅是大太太生的。她出生于萨县东沙尔沁（公积板），小名叫小花女子，和花女子李桂林没有什么关系。她的须生戏是和艺名叫白果子的女须生学的。后来她还学过盖天红（王步云）的唱法。她的嗓音既脆又亮，十分好听。所演的“困雪山”、“空城计”、“斩子”、“芦花计”、“麒麟山”，很抓人。我在八九岁时最爱听他的戏。她的戏不多，论功架和肚宽不如八岁红常艳春，就是一副天刚音的好嗓子拿人。一九五三年，她因故到了阳泉市，一九五四年一月，和陈宝山离了婚。

一九八五年六月份，她随怀仁县晋剧团来到呼市郊区演出。我已三十二年没看过她的戏了。在六月的一天，我赶到沟子板看了她的“芦花计”。年近花甲的小果子红并不显老，嗓音还是那么甜美。有些唱词和太原小果子马秋仙不太一样。例如：马秋仙的唱词是：“腊月里数九天，雪花儿空中旋”，冀素梅的唱词是：“腊月里天气冷，滴水冻成冰。”做戏时的动作也不太一样。

一九五八年，冀素梅曾灌录“斩子”唱片。

小十三旦郭占鳌及其他

陈宝山还和我谈到当年在山西北部的好几个名伶，如早期的玉石娃娃、两股风，再以后的郭占鳌、露水珠子张林等。

两股风是著名青衣韩金凤的哥哥，其班辈可能和要命旦差不多。刘明山的唱腔受他的影响很大。更详细的情况，陈宝山也说不来。

小十三旦郭占鳌，人生得十分俊俏，扮出戏来相当活亮。有个笑活说道：十三旦在原平镇唱戏时，当地妇女十分入迷。有个青年女人到店铺里买东西时，店主人问她“买甚呀？”她信口回答：“买十三旦”。

抗战期间，小十三旦被日寇惨杀于忻县牛村。

还有一个叫任玉珍的坤伶，艺名也叫十三旦，曾在百代唱片公司灌过“坐楼杀院”中“动不动”的唱段。

名震晋北、京都的狮子黑张玉玺轶事

提到狮子黑张玉玺时，陈老眼中发出异样的光彩。他说狮子黑张玉玺在艺术上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有一次，二十来岁的陈宝山和张玉玺演“匕首剑”，陈宝山饰秦王，临上场前他非常紧张拘束，总怕演不好，对不住这位老前辈。比他大将近三十岁的张玉玺安慰并鼓励他：“娃子，不要怕，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演“抱塔柱”，张玉玺饰纣王，一出台，那功架和气势，就使人重而生畏，不寒而栗。

一九三九年，张玉玺到包头演出后，和一千红、彦章黑（萧亮）、牛头黑、夺庆旦（李子健）、金二黑（王正魁）、九岁红（女、姓任，灌过“伐东吴”唱片）、李子健的妻子李翠芬（小旦）、和归绥市茂盛班（班主亢二、大名喜成，其兄长亢仁山是归绥县县长）的三女红、小玉凤、十七生（陈宝山）、三娃黑（白云）联合组班，到北京演出。

当时在华北戏园演出，下处在纱帽胡同。演了一段时间后，金少山和马连良亲自来点戏。金少山、程砚秋、马连良都知道张玉玺和李子健的艺术，金少山特地点了张玉玺的“匕首剑”，马连良点了李子健的“串龙珠”。

那时旧历三月的一天。开戏后，帽戏是“玉堂春”，由三女红、小玉凤、十七生主演。第二个戏是“拾玉镯”，由李子健和他的女儿李碧兰、高玉梅主演，大轴子是张玉玺的“匕首剑”。

这张玉玺中等身材，浓眉下的一双大环眼炯炯有神。一望而知是个有神彩的艺人。

王正魁扮演的秦舞阳登场后，紧接着在紧密的锣鼓声中，张玉玺扮的荆柯登场。

这荆柯一角是破花脸，双眼打成三角型，头戴黑扎巾，黑箭袖、黑压耳毫毛，脚着五寸厚的靴子，身背图卷、内藏匕首。一路趟马的动作，干净利落，造型优美，象磁铁一般把观众紧紧吸引住。其二目如电，咄咄逼人，充分表现出荆柯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勇猛、慷慨、视死如归的精神。当时马连良、金少山、程砚秋等人都在包厢上看戏。这以后，由金少山出资，以张玉玺的荆柯头象做为广告，在报纸上连登了一年之久。

这位当年在北京人称“金霸王”、“铁罗汉”，把黄金荣、杜月笙全都不放在眼中的十全大净金少山，他捧过谁？所以金少山的这个行动，是很不容易的；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署名“士敏”的一篇文章中曾细致地描写张玉玺的趟马动作，文章说：

“‘金沙滩’里，韩昌（张玉玺饰）披着斗篷上马时，先用手摇了摇马鞍，抓住缰绳，认蹬翻身，骑在马上。然后翻了三个大转身，表现了蒙古马的野性。接着，身子在马上摇了摇，大鞭子一抖，亮相，三步转身，马鞭一甩，做出种种优美身段”。

“演‘黄沙岭’闻太师的趟马，出了大帐往当中一站，将八个把子看成千军万马，先从远处瞧，再朝近处瞧，一点一点挨着瞧，四面八方都要瞧到，见安排的一切妥当，命人牵过马来，左一望，右一望然后上马”。

“因何二者趟马动作不同？这是因为：那韩昌是野心勃勃慷慨武将，一心要吞并大宋江山，此时正是猖狂不可一世之际。而闻太师是年迈的朝中元老，久经沙场，此次乃边关得胜回朝。所以，虽然同是趟马，由于人物身份、性格、处境不同，演起来就大不一样”。

七八天后，戏班搬到华乐剧院演出。李子健主演“串龙珠”，那一天金少山没有去。当时李子健饰花婆，三女红饰徐达，十七生饰花云，三娃黑饰郭光青，小玉凤饰白氏（内行叫剃眼旦），花女子饰含嫣（内行叫剃手旦）。

后来，花女子和三女红还给程砚秋等人介绍了山西梆子“南天门”。

名伶轶事补遗

山西梆子戏迷们有很多串话，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对名伶的喜爱。如：“腊玲、玉梅子；福鱼儿，花女子”、“听了仙娃咳咳咳，不吃猪肉和蒜苔；”“宁可跑的丢了鞋，也不能误了程玉英的咳咳咳，”“听了方月英，走路也脚轻，睡觉也歇心”。

旧社会吃“张口饭”不容易，除了演出，事事都得操心。就这样，有时也防不住坏人的明抢暗算。

抗战期间，陈宝山和花女子有一次到萨县大岱唱戏，散戏回到下处，被当地土匪闯进家，把花女子的行头抢了个精光。

有一次在大同唱“翠屏山”，十七生演和尚，花女子演潘巧云，“和尚”被杀后，陈宝山下场洗脸，突然有人告诉他，小七子被抓走了。当时花女子还未下台，好不容易等她唱完，说明情况，赶快去营救。原来，花女子的这个楞儿子黑夜到戏班，路过一个日本人办公的地方，往里张望了几眼，日本人产生怀疑，把他抓去审问。他是个神志不全的人，怎能解释清楚？结果被日本人放在凳子上灌了一气凉水。后来，花女子和戏班的人几经交涉，才算保出来。

还有一位著名的花脸艺人锁柱黑，班辈和金兰红差不多。自幼家贫，十七岁时在大同朱文科班学艺。个子很高，嗓音冲，不用背拱音。他任主演时，安秉琪（艺名亚八百，也叫梅花黑）给他拉二套。他的情况我了解的很少。只知道他在一九五〇年来过归绥市，和女儿李凤仙唱了一出“鸡架山”，年过七旬的锁住黑饰程咬金。李凤仙的丈夫叫陈连升是河北梆子出身的武花脸艺人。

他们的儿女中有两个女儿现在是呼市晋剧团的主演，就是陈艳秋（青衣）和陈改梅（刀马旦、小生）。

当年和张玉玺在北京演出的人健在的只有大同的王正魁，呼市的陈宝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回首往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当前戏剧界江河日下，固然有各种原因，但主要还是跟不上生活的拍节。当年被封建士大夫视之为下里巴人的梆子戏，以它特有的急管繁弦的音乐和慷慨激昂的表演，在祖国的戏剧园地占有了重要的一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到了现代，戏剧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的冲击，失去了一大批青年观众。如何把戏剧事业振兴起来，开创一个繁荣的中兴局面，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一九八五年九月）

回忆晋剧名伶水上漂

刘 明 山

驰名塞上的晋剧名伶、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水上漂，原名王玉山，山西五台县豆村人，乳名二明，故又名二明旦。水上漂的父兄皆为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他在九岁时即离开家乡到山西崞县投奔文友班主的戏班学戏，拜正堂旦和放羊旦为师。水上漂从小才华出众，聪明过人。师傅传授给他的“梦鸳鸯”、“梅降雪”、“梵王宫”等戏，他很快便能掌握，并能把“三皇姑”、“狐狸精”等人物形象，维妙维肖地表演出来。水上漂出师以后，便跟随文友班主的戏班，到代州城、阳明堡、崞县、原平镇、繁峙、五台等地演出，因他在戏剧舞台上装扮女性飘逸如仙，走起碎步轻捷似漂，把青衣、旦角的艺术魅力，表演的十分传神，所以广大群众便给他送了个“水上漂”的艺名。在晋北的二州、五县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看了二明旦，三天不吃饭”，又说：“五台出了两件宝，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水上漂。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也不叫水上漂不唱了”。可见水上漂在广大群众中所享有的声誉了。

民国二十二年，我正在故乡山西忻县紫雁村演出。水上漂跟随文友班主的戏班在忻县牛窰村演出。两村相距有十多里路。那年我三十五岁，他刚二十四岁。他虽在艺坛上早已崭露头角，但仍然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他为了向我学习，在演出之余，不顾天

气炎热，甘愿步行十多里从牛窖村赶到紫雁来看我的戏。他上午刚演完“杀官”，专门赶来看我与太平红合演的“青风亭”。

那个村中的“写头”叫李英怀，他与水上漂认识。通过李英怀的介绍，水上漂跑到后台来找我拜师。他一见面，就给我磕了一头，并笑着对我说：“千里求师，我是专门来向大老板学习来了！”我说：“不必客气，我们还是以师兄弟相称吧！”从此我们便结为知己。那天社首韩谦和特意把我们叫到他的家中去吃饭，另外还请了忻县商务会会长杨焕章。席间，韩谦和与杨焕章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山西梆子里公认的四大名旦是：张宝魁（艺名筱吉仙，筱桂桃之师傅）、刘明山、李子健、水上漂。我们都说：“那太担当不起了。”吃完午饭后，水上漂还准备回牛窖演出。韩谦和说：“王老师太辛苦了。下午还是留下再看看五月仙师傅的戏吧！”于是他便拿起笔来给牛窖村的社首写了一信，托人送去，把水上漂挽留下来了。下午，水上漂又在紫雁村看了“六月雪”。在这个剧中，我弟玉山扮窦娥，我装蔡婆，太平红装窦天章。他看完戏以后，对我更加佩服，再三表示一定要拜我为师。晚上，他又赶回牛窖去演戏。从此我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民国二十三年冬天，我到归绥参加了忻县人王太和领的大观园的戏班。后来这个戏班由我领着到了包头“魁华舞台”演出。为了助长剧团的声威，王太和便从山西请去了水上漂，另外还请了三女红宋玉凤（左云人）、三女红的姐姐（青衣）和她丈夫鱼儿生。鱼儿生小名双印（左云人）。戏班中生、旦、净、末、丑角色十分齐全。我们在包头演出了“凤仪亭”、“黄鹤楼”、“董红下水”、“梅降雪”等戏。在“董红下水”中，鱼儿生装董红、水上漂装丫环。在“梅降雪”中鱼儿生装林孝贤，

水上漂装狐狸精。鱼儿生擅长表演翎子功。水上漂作派、唱腔均很叫座。他装狐狸精，两只脚上绑着跷子，站在高桌上的印盒上面，一气唱几十句乱弹，达半个小时之久，纹丝不动。唱完后，一个箭步从高桌上跃下，然后摆起水袖，潇洒如仙地退下场去，台下雷鸣般的掌声，高昂的叫好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三女红演的是“刘备哭灵”，也颇受观众好评。

那时我与水上漂均住在包头平康里开过窑子的得胜班的院子里，每天朝夕相处，友谊日益深厚。水上漂演出时给他拉胡琴的是忻县南关人“五魔鬼”。五魔鬼本姓王，其父是开鼓房的，他小名叫磨菇。因他的胡琴拉得颇有魔力，群众便取了王磨菇之谐音，取绰号为“五魔鬼”。他爱抽大烟，以后又到大同给十三旦、占鳌子、十三旦之师傅二奴旦去拉胡琴。水上漂在包头市还演出了“坐楼杀惜”、“杀狗”、“梦鸳鸯”、“梵王宫”等戏，轰动了整个包头城，几乎形成了“满城争说水上漂，人人喜看二明旦”的动人局面。因为在包头的二州五县的人很多，所以看水上漂的戏是很合乎口味的，戏一直演到年底。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在包头住了李永盛的戏班。三月间，在萨县陶思浩村演出，那里落户的晋北二州五县人很多。他们都喜欢看反串戏。在那里我与水上漂合演了反串戏《辕门斩子》。在这个剧中，我演八王千岁，水上漂扮六郎，李子健装木瓜，凤凰旦王治安扮穆桂英（王治安是张家口地区下花园人，小名官根子）。戏演完以后给了我们很多赏钱。那一年的八月，我们的剧团在包头东街财神庙进行演出。那时包头市的剧坛上也很盛行反串戏的演出。有一次我与水上漂、李子健同台演出了反串戏“坐楼杀惜”。我演前半段的宋江，丢招文袋以后的后半段的宋江由李子健演出，我们都是青衣扮须生，所以很受观众的欢迎。

水上漂演闹惜娇。演完戏后，庙会上还特意每人多给了我们十元钱，以示奖赏。

水上漂在包头演完戏后，便又去归绥住了王太和的班子。王太和字茂三，山西忻口人，父名王心宽，从小以种果木园子为生。兄弟共三人，长兄少亡，二兄名王中和，是归绥的商人。王太和从小跟随父亲在家乡种菜园子。有一次随其父在菜园子浇水，因他没有好好看水，把菜畦子炸了水。他父亲一气之下把王太和揍了一顿。王太和人小心大，他一怒之下便不辞而别，跑到了归绥寻找其本家同和园戏班的班主王录。经王录介绍王太和也住了这个戏班，后来又去了一个姓关的旗人所开的燕美园。先打杂，后来熬成了领戏的。民国十六年与归绥小东街一个北京姓兰的旗人合伙盖了大观园。王太和经过几十年奔波终于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大名鼎鼎的王班主。我和水上漂来到大观园演出，更壮大了大观园戏班的阵容。当时在那里演出的演员有金兰红、鱼儿生、花女子、三女红、宋玉凤、金金魁、张三和、太平红、狗狗生、宏宝珍、杨根新、吴润花、一声雷社占魁，还有黄得胜的弟子王治安、凤凰旦、丑角孟常荣、青衣武金堂和我。水上漂曾在五台住过屈大阳的戏班，也在崞县住过张根银的戏班，在大同还住过张胡子的戏班。这些戏班都争取名角给他们演出，都纷纷来信请水上漂回去。水上漂很重友情、讲义气，这些剧团的邀请他都谢绝了。情愿留在我的戏班中，和我同台演出，以便互相砥砺，共同学习。我们与水上漂在大观园合演过“二堂献杯”，我扮田夫人，水上漂装渔家女，七百生的徒弟高福海装田玉川，颇受观众好评。水上漂在大观园还演出了他师傅正堂旦亲自传授给他的“吕洞宾戏牡丹”。他扮演牡丹，把人物表现得十分传神。此外我们还合演过“李延贵卖水”，他装小丫环，我扮黄桂

英，彼此配合得很好。那时我一天的工钱是四块钱，王太和主张水上漂的工钱不能超过我，我为了奖掖后起之秀，力争一天给他五块工钱，最后王太和采纳了我的意见。在戏班里老十六红焦生玉一天六块工钱，十三旦占鳌子，一天四块工钱，刘宝山一天六块，刘玉山一天两块半工钱。水上漂一天的工钱可以列到中上等水平了。水上漂在归绥演“杀狗”装焦氏，与高福海（齐白生弟子）同演“梅降雪”，与张竹林（丁果仙之开门师傅）同演“杀楼”。当宋江孤注一掷手举钢刀向阎婆惜砍去时，水上漂一口喷彩、鲜血淋漓，使悲剧的气氛显得更加浓厚，台下掌声不绝于耳。此外在这里水上漂还演了他的师傅正堂旦所传授给他的拿手戏“二度梅”、“梦鸳鸯”等，技艺均显示出炉火纯青的功夫。那时水上漂的唱腔已改为中路梆子，跟他拉胡琴的是榆次人曹廷俊，其技术比起五魔鬼来就大有逊色了。

在归绥演了一段，我和水上漂又一块去毕克齐、察素齐一带的农村中去演出。戏班由赌头从大观园包出，边演边放赌。当时包戏的，我记得有毕克齐的大乡绅谢玉塔，还有一个驻军在察素齐的山西忻口人阎锡山军队里的一个营长。我们在那里演出时，也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民国二十五年水上漂又去包头住了河北保定人李永胜的班子。演戏的地点还在“魁华舞台”。李永胜是河北梆子演员。其弟李永太是演三花脸的。他们兄弟二人，从民国七、八年即到了包头演出。在这个剧团演出的，当时还有花脸票友铜匠黑（包头人）、三花脸田玉子、高福海、小十二红（小名叫争气，包头人）、元元生的徒弟老十二红（张家口人），此外还有李永太的外甥女小金娃、小银娃（花旦）。这个剧团除了在包头演出外，还去固阳、麻池、磴口等地转营子演出。以后水上漂又离开包头

回到了大同，住了张胡子的戏班。那时跟随水上漂整天给他打水、送饭、搬行李的一个老汉名叫陈三，五台人，与我父刘法荣认识。后来陈三一直老死在大同，水上漂把他安葬了。跟随水上漂拉胡琴的又换成了山西原平人李海明，小名叫金柱，其父兄皆为著名的吹鼓手。李海明一直跟随水上漂到一九五二年。后来又跟我到了山西平定，住了候德全的戏班子。李海明的女人是包头剧团的名演员武仙梅。李海明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上、下路调都很熟悉。他培养的徒弟很多。如山西寿阳县曾当过清代帝王师的齐俊藻的重孙齐运兵和范淑琴、筱金兰等人，经他精心栽培，以后都是雁北戏校乐队的骨干。张××还当了雁北戏校的校长。

过了不久，包头的西北影剧社又把水上漂请去，同去的还有小电灯贾桂林。他们和十六红一天都赚十五块工钱。小电灯还去我家中吃过酸菜辣椒蘸莜面。这个剧团一张票卖六毛钱，一场能卖一千三百张票，几乎是场场满座。这次是由狮子黑张玉玺接他们来的，他们在西北影剧社共演了一个多月。水上漂、小电灯与十六红合演过“芦花记”、“杀楼”、“南天门”、“北天门”等戏。他们扮演的阎婆惜、阎发仁妻、曹玉莲、杨四郎之妻孟金榜等人物形象，均呈现出两峰对峙、各显风流之妙，颇受群众欢迎。西北影剧社的经理是内蒙萨县人范君山。范君山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曾助纣为虐，破坏过乌兰夫、王若飞等同志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这一年我从包头到了五原去演出。水上漂到了代县、大同、五台、忻县、崞县一带演出，二人遂告分手。彼此只有书信往来，再未见面。

一九四六年我在张家口市裕民大戏院演出，水上漂在包头住了鄂友三的军队剧团。一九四七年我又从包头把他接到张家口市，在庆乐戏院（旧院）演出。一天的工钱是三十元。十月间，我又把水上漂请到上堡中正堂演出。水上漂还带着他的养女王巧云。在张家口他会见了晋剧大师李子健。他向李子健学习了“百花点将”、“凤台关”、“烈火旗”等刀抹戏，还学习了颇有生活情趣的地方小戏“王婆骂鸡”。之后，水上漂的表演技艺便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在中正堂，还请来小磨菇、喜彩莲演出过。两班合演，一天工资一百三十元，结果由于花销太大，共亏损一千多元。没办法，以后李子健通过关系向牛桂英的男人吴立伟（住银号的）借了一千元的外债，才还清了债。前后给水上漂的工资即达六百元。

以后蔡友三与水上漂又到了赵步桥的戏班，并到北市东安市场吉祥大戏院演出。

他演出的“红娘”和我教给他的“拾万金”、“算粮”、“明公断”等戏，获得了北平观众的好评。为了给水上漂捧场，李子健还请上荀慧生、尚小云等戏剧大师们去看他的戏。据说荀慧生、尚小云还亲自去给水上漂化妆，这就使水上漂的身价更增加了十倍，并在中国的戏剧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以后水上漂从北京又回到包头，并曾到山东的济南演出过。

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我去包头演出时，又与水上漂见了面。我们一块演出的有十三红周成贵、宋玉凤、舍命红邓友三、水上漂和其女儿王巧云，二兰兰也在那里演出。我弟刘宝山也去了，一天的工资是三十元。当时刚刚解放，群众生活比较艰苦，但观众还是很踊跃的。

我与范君山、刘宝山、王玉山（即水上漂）、邓友三经过商量，便在包头成立了一个“五山学校”，我与邓友三、王玉山任学校的常委，范君山任正经理，刘宝山任副经理。由包头人张建勋任秘书。我们五人为了给学校筹集资金，搞了七天的义务演出。共卖票二千五百元，除了各项开支，还留下一千七百元。为了工作方便，还专门买了一个地盘。共招收学员二十七、八人。一九五二年，又将五山学校改为漠南学校。在学员中也培养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后在丰镇剧团演出的武生高云楼，在宣化演出的胡子生赵秀梅，包头剧团的青衣田桂兰等人，都是漠南学校的学生。

一九五二年水上漂又到了山西太原演出。接他去的是山西代州人姚发礼，其女人是名演员花艳君。这个剧团是姚发礼与张宝魁合办的。同水上漂一块去太原的还有武生郝盛魁等人。他们一天的工资都是四十块钱。在太原水上漂演的打炮戏是“西厢记”，他装红娘，其女王巧云扮莺莺，一下红遍了太原。老乡们都交口称赞说：“水上漂的功夫还是不减当年啊！”

一九五六年我去包头演出时，他随剧团到了陕坝。过了几天他还专门从陕坝请假到包头看望我。并在包头西北剧团的宿舍里设了丰盛的家宴来招待我。同去赴宴的还有我弟刘宝山、刘玉山、我女儿刘玉婵，还有马武黑、南定银等人。彼此都畅谈了别后的友情。

一九五四年包头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专门给水上漂筹备庆祝舞台生活四十周年纪念。包头文化局一位蒙古族姓鲍的局长，还给我发来了邀请信。水上漂也给我来信，要我与他和李子健三人合照的照片。我因工作繁忙，未能前去致贺，只给他寄去了照片，并发去了贺信。此后就一直再未与他见面。

在十年浩劫中，水上漂也与我国千千万万杰出的文化战士一样，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九六八年腊月初八日，他在“牛棚”中被造反派们折磨而死。风流一世的晋剧名伶水上漂与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在同一天羽化而登仙，是巧合呢？还是命运使然呢？

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一九七九年的十二月间，包头市文化局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并为水上漂彻底平反。我因年老体弱未能前往参加追悼，只托我女婿王麟，代我与刘玉山、刘玉婵写了一封长信，以示悼念。我遥望西天，缅怀水上漂一生在舞台上所建树的功勋和生前与我们的友谊，不禁老泪纵横，五内俱焚。

水上漂的遗孀，现仍健在，已经年过古稀，在包头安度晚年。其子名王麟如，在包头市某学校当校长。其女二兰兰、养女王巧云皆为内蒙晋剧界的著名演员。老友王玉山未尽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每念及此，心中甚感宽慰。

为祖国的戏剧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水上漂，将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里。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谢江代笔）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作者 =

页数 = 2 5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